

1860年《北京条约》

[俄] A·布克斯盖夫登男爵著

俄中外交关系概要之一

1860年《北京条约》

〔俄〕A. 布克斯盖夫登男爵著
王瑾、李嘉谷、陶文钊合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注明原借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Баронъ А. Буксевденъ
РУССКІЙ КИТАЙ
Очерк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ъ сношеній Россіи
съ Китаемъ
1. ПЕКИНСКІЙ ДОГОВОРЪ
1860 г.
Портъ-Артуръ.
Изданіе книжнаго склада "Новый Край".
1902 г.

内部读物

1860年〈北京条约〉
〔俄〕А. Буксевденъ著
王瑾、李嘉谷、陶文钊合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850×1158毫米 1/32 5印张 121千字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南宁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37·349 定价：0.50元

出版说明

《1860年〈北京条约〉》原书出版于1902年，是拟议中的《俄罗斯中国（俄中外交关系概要）》丛书之一。作者布克斯盖夫登是当时俄国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尉官。

本书主要记述了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1859—1860年出使中国的有关情况。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沙俄就悍然违反《尼布楚条约》，一再侵入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地区。1854—1857年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又屡次派兵，以武力强占我黑龙江中、上游北岸和下游地区，并于1858年5月强迫清政府黑龙江将军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这样，沙俄一举侵吞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还强行规定乌苏里江以东的我国领土为中俄共管。与此同时，沙俄公使普提雅廷又与英、法、美三国紧密勾结，进行军事、外交讹诈，并于1858年6月抢先诱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

《璦琿条约》墨迹未干，沙俄侵略者便故伎重演，再一次使用“实际占领”，然后逼迫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的惯用手段，一面着手吞并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一面派遣伊格那提耶夫来华，逼迫清政府签订新的割地条约。

1859年6月至次年5月，沙俄侵华的爪牙伊格那提耶夫在北京大肆活动，胁迫清政府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割让给俄国，声言，如不遂所愿，中国就要冒同时对英、法、俄作战的危险。沙俄的这一讹诈未成，伊格那提耶夫便离京前往上海，参与英、法侵略者的

强盗勾当，积极充当帮凶。英、法联军进犯津、京时，他紧随联军北上，百般挑唆怂恿，积极出谋献策，为他们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和他们共同研究攻城计划，并将俄人私自测绘的北京地图交其使用。北京被英、法联军强占后，伊格那提耶夫又急忙赶到北京，伪装成“调停者”，帮助英、法侵略者展开对清政府的逼降活动。他把沙俄标榜为清政府的“公正保护者”，同时对清政府大肆恫吓，迫使其“立刻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使英、法侵略者得以迅速迫签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伊格那提耶夫一等英、法侵略军从北京撤走，便以沙俄“调停有功”为借口，迫不及待地向清政府勒索“斡旋”的“报酬”，并公然以武装侵略和叫回英、法侵略军相威胁，向中国提出了新的大量的领土要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早已被帝国主义的大炮吓破了胆，于1860年11月14日被迫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从此，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我国广大领土又落入了沙俄的魔爪之中。条约中还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中国境内的湖泊河山作为划界的标志。

本书记述了伊格那提耶夫的上述种种侵略活动。作者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为沙俄侵吞中国大片领土的罪行大肆讴歌，洋洋得意地把它称作是沙俄“外交活动中光辉的一页”；对伊格那提耶夫的两面三刀、软硬兼施、凶险狠毒的卑劣行径则竭力美化，为其树碑立传。本书充斥着“侵略有理，扩张有功”的谎言谬论，但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沙俄帝国主义掠夺成性的强盗嘴脸，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的某些侧面。

1974年10月

作者的话

几乎就在1900年中国发生事变之初,我幸运地获得了大量资料(外交部也存有此项资料),使我得以出版本书。

我十分清楚,作为我国外交活动中如此光辉一页的《北京条约》的历史,应由一位比我高明的作者来写才能胜任。但是,考虑到所报导的这些很少有人知道的事实都是有意义的,如能及时将其发表,或可弥补此项不足,因此我终于担负起了这项工作。

遗憾的是,本书出版比预期花了更多的时间,以致当全世界都紧张地注视着远东所发生的一切时,错过了这一最有利的时刻。造成如此出乎意料的延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工作条件不利。在当时条件下,必须在太平洋分舰队的船上边航行边工作;在如此紧张的时刻,周围所发生的事变显得特别错综复杂,也影响了各种非中心的任务。

基于上述情况,我衷心希望关心的读者对书中由于工作条件不利而造成的错误,予以谅解。

海军中尉 A·布克斯盖夫登男爵

原书出版前言

俄中外交关系概要第一部分包括俄国外交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时期，即以签订《北京条约》为结束的 1859 至 1860 年这一时期。今后，随着资料的逐渐充实，尚拟写一本关于 1900 年和 1901 年最近事变的著作，使本概要臻于完备。

全世界正以普遍紧张的心情注视着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我们希望现在出版的本概要的第一部分，能受到公众的注意。

出版者

1902 年 1 月 20 日于旅顺

目 次

第一章1

一、1858年普提雅廷伯爵签订《天津条约》。 二、1859年任命伊格那提耶夫将军赴中国筹办军务。 三、中国拒不接受俄国提供军械。伊格那提耶夫处境发生变化。 四、进入北京。开始谈判。中国当局宣布否认《璦琿条约》。 五、英国在大沽战败。美国公使华若翰受挫。 六、谈判中断三个月。俄国代表的尴尬处境。 七、外交部确认伊格那提耶夫的公使职衔。“德日基特号”驶抵北塘。 八、中国政府不放伊格那提耶夫出北京。伊格那提耶夫强行离京。

第二章40

一、伊格那提耶夫到达上海。结识英、法两国特使。冷淡的接待。伊格那提耶夫通告说明该使团的出使目的。 二、乘“斯维特拉纳号”赴日本及北直隶。英、法分舰队驶抵北塘。华若翰的难堪处境。 三、联军陆战队登陆。向俄国旗帜鸣放礼炮而引起的误会。 四、炮轰并占领大沽炮台。联军与中国当局开始谈判。 五、占领天津。伊格那提耶夫改乘“拉兹鲍伊尼克号”沿白河前往天津。 六、伊格那提耶夫的任务：博得敌对双方的信任，并充任双方的调停人。 七、谈判破裂。

第三章83

一、联军向通州进发。 二、联军与僧王军队冲突。英、法两国官员和翻译官被俘。 三、八里桥之役；任命恭亲王为新任全权大臣。联军之间的齟齬。清帝逃出京城。 四、决

定炮轰北京。中国当局释放俘虏并交还被虐杀的俘虏遗体。联军又一次发出最后通牒。 五、占领并抢劫海甸宫殿。落入英方手中的档案库和俄方文件。伊格那提耶夫的危险处境。 六、葛罗男爵希望伊格那提耶夫出任调停。离开通州进入北京。 七、中国当局请求出面调停。伊格那提耶夫接受请求。停止炮轰北京。联军向中国当局提出的最后通牒，在伊格那提耶夫促成下对此作出的答复。 八、和谈开始。联军与中国当局签订和约。 九、伊格那提耶夫就俄、中问题进行谈判。普鲁斯的突然来到。联军撤兵。英、法两国特使离去。 十、1860年11月2日签订的《北京条约》。阿穆尔边区和乌苏里边区并入俄国。

第一章

I

英国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取得通商方面的优惠待遇，同时也为了普遍加强对东方的影响，打算于1856年冬至1857年，联合法国（英法联盟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有所减弱，此时也需要加强）向中国派遣一支庞大的远征军。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通过驻伦敦的海军武官普提雅廷伯爵获悉此事。他看出英国人的企图是觊觎我们在太平洋的利益，在他的坚持下，任命普提雅廷为公使和觐见中国皇帝的全权使臣，以便向清政府^①要求享有与其他列强将取得的同等权利和优惠待遇，同时了结在阿穆尔^②和吉尔吉斯草原的边界问题。

普提雅廷是从陆路去中国的。他顺利地抵达了恰克图，而从该地继续前进时，却出乎意料遭到办事大臣（中国东部的行政长官）的阻挠，后者在未获得最高当局的允准时，坚决拒绝放他进京。于是他向北京理藩院写了一份强有力的申诉，指控中国官员违反1728年^③《恰克图条约》（该约确认两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且

① 根据俄国人的习惯，Маньчжурия 一词使用范围很广，有时用作政府、皇朝一类的称号，有时用作地名（指今东北地方），有时指所属民族，此外尚有多种用法，本书按照现在通行的译法，凡属第一类者均称清政府、清廷、清帝……，属第二类者仍称满洲，属第三类者称满人、满族、满员、满臣……，其他则根据文义定译。——译者

② 即黑龙江。——译者

③ 按正式文献均称该约订于1727年。——译者

宣称，他对理藩院的批准只能等到5月15日，过此期限，在不论什么情况下，他将经由阿穆尔和满洲取最近的道路去北京。如果中国政府不及时为他提供过草原所需的交通工具，他将乘轮船，并至迟不超过7月1日抵达直隶湾。

普提雅廷没有等到回音，他确信已不能继续由陆路前进，于是改乘“亚美利加号”轮船，顺阿穆尔而下，在预定的日期内到达了直隶湾。

普提雅廷旋即试图和北京理藩院建立信函联系，但是毫无结果。普提雅廷发了一个声明，说他此行是为了弄清若干边界问题，同时要使清政府对遭受来自英国和法国方面威胁的危险，有所戒备。理藩院对此粗卤地答复说，它认为就边界问题和俄国公使进行任何谈判均属多余，而公使来京（这正是普提雅廷所力争的）是办不到的。中国人在复函中还指出，公文来往一律需经恰克图转送，以后，公使凡由直隶湾发出的一切函件，均不受理。

这样，清政府便使1805年出使北京的戈洛夫金伯爵的使团*受挫以后，又以拒绝接待俄国公使而使俄国再度蒙受侮辱。普提雅廷企图和北京中央政权独立进行谈判，毫无结果，在虚掷了近一年的时光后，他终于参加了英国、法国和美国公使的行列，结伴来到天津。在这里，由于四大国代表的共同努力，清政府不再固执己见，中国遂与上述各国分别订立了条约。

俄国和美国的代表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时表现得最有分寸，这大大促进了对所提问题的和平解决。因此，由普提雅廷签署的《天津条约》，三日后就得到了清帝的批准。中国全权大臣秘密地将此事通知了公使，并且告知，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伯爵和黑龙江将军奕山已划定了以阿穆尔为界的新的俄中边界。按照《天津条

* 戈洛夫金使团之所以受挫，是因为特使抵达库伦后，怎样也未能使当地行政长官对他首先往访。

约》，俄国与其他列强在海路贸易、外交关系和传教活动方面同等地享有一切权利和优惠待遇。

虽然问题这样解决，似乎是公平合理的，但实际上，条约对别国人说来，远比对我们有利益。俄国既然没有商船，当然不能从条约赋予的权利中得到实惠，而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却能竭力利用这种权利。西伯利亚人公然抱怨说，我们的全权代表在签订条约时过分注意欧洲利益的一致性，却完全忽视了我们和中国之间有着漫长的陆上疆界，他有责任提出另外一些特殊的要求。

穆拉维约夫伯爵，尤其是恰克图行政长官是《天津条约》中被忽略的俄国陆上利益的主要捍卫者。他仔细分析了1858年8月送给他们的条约抄件，认定必须在条约批准之前增加几项补充条款，以巩固俄国从过去签订的条约中已取得的陆路通商权利，而《天津条约》对此却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对西伯利亚竟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许多人已开始议论必需将俄国军队开往蒙古和满洲，以使用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

与此同时，对天津谈判的结果深感满意的普提雅廷，却拟订了一项进一步的行动纲领。他醉心于在北京确立俄国的影响，决定用俄国武器来支持中国，以对付英国和法国，从而实现这一目标。他并不满足于口头提议的效劳，还书面通知中国全权大臣桂良和花沙纳说，奉俄皇之命，为训练中国军队于明年将提供足够数量的军事教官，同时，还要将最新式的大炮五十门，最新式有来复线的枪枝一万支运抵白河口，供中国政府使用。

与此同时，他还告知，俄国政府拟于1859年2月批准刚由他——普提雅廷签订的条约，届时将为此而任命一名新的俄国公使前来。普提雅廷劝告中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使新任公使经由蒙古和满洲尽速到达，并担保说，如果俄国公使先于别国代表到达北京，他会授以机宜，不使英国人和法国人将来提出苛求。

普提雅廷的友好建议远未受到预期的赞许。中国官员在异常迅速的答复中赞赏公使关于运送武器和派遣教官的美意，并表示全都欣然接受。至于公使来京问题，他们非但不答应帮助他加速行程，反而希望公使于一年以后来京，绝勿赶在别国使节前头，这些使节专爱因袭恶例，也正想从速来京。

尽管这种回答粗卤无礼，普提雅廷并未放弃他的初衷。还在他回俄国的途中，就从巴黎写信给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说明必须消除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东方事务中的领导作用，这种作用理应属于俄国，并且将向中国提供俄国武器，作为实现这一目的最合理的手段之一。回到彼得堡后，他向外交部递交了一份述职书，发挥了他关于未来俄中关系的设想。普提雅廷认为，有外国代表在场，我国公使要在北京获得某种实质性的成果，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坚持公使要尽快去中国，以求在外国人到达前办毕条约的批准事宜，并了结对俄国最为重要的边界问题。他列举了据他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并据理说，必须：1. 为清政府购买它所承购的武器；2. 派遣五名军事教官去中国，帮助训练中国军队；3. 向太平洋派出一些吃水量不大的舰艇，以便在中国内河活动。普提雅廷建议在军事教官中选派一人，授以特命全权，使他能作为俄、中两国政府间的中间人，与各部大臣和军机处直接交涉。

所有这些建议在俄皇陛下召集的御前会议上进行了研究，并受到嘉许。

II

为了争取时间，决定不再从彼得堡派遣新的公使，而将在北京的教会监护官彼罗夫斯基（他曾参与穆拉维约夫在阿穆尔的谈判）改为公使衔，委派他办理《天津条约》的批准事宜。根据普提雅廷

的坚决主张和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的推荐，任命了上校侍从武官伊格那提耶夫担任选拔教官的工作。他于一年前作为一个特别军事考察团的团长被派赴布哈拉，不日即可来到。

伊格那提耶夫于1858年的圣诞节赶回彼得堡。在初次觐见俄皇时，陛下就提升他为御前侍从少将，并宣布任命他前往中国执行一项困难而又微妙的使命。

出使前所花的准备时间较之预计的为多。有鉴于负责组织中国全部军队这一任务的复杂性，决定派遣各兵种的军事教官随同伊格那提耶夫前往。委派谢苗诺夫团上尉泽伊费尔特负责训练中国步兵，近卫军工兵营中尉泽伊姆负责建立工兵部队，近卫军骑炮兵上尉巴柳泽克负责建立炮兵部队，利申中尉负责组织猎兵部队，地形测绘师什姆科维奇负责绘制地形图。

出使必须急速进行，因为在所面临的道路泥泞的季节里，在西伯利亚地区通行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还因为伊格那提耶夫将军亟需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伯爵见面，而后者早在冬季即已声称，至迟到4月份他就要离开伊尔库次克。

3月6日，伊格那提耶夫从彼得堡出发，途经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彼尔姆、科雷万，尽管道路糟糕透顶，仍然于4月4日前赶到了伊尔库次克，因此还赶上穆拉维约夫尚未离开他的府邸。

伊格那提耶夫充分利用了在伊尔库次克逗留的七天，以便尽可能地了解和熟悉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局势。然后，他同总督来到恰克图，不料在此碰到了普提雅廷在两年前遇到过的同样的阻碍。

总督派往库伦的界务官^①卡尔波夫回来时带回消息说，蒙古的办事大臣不让俄国公使进京，因此只能在恰克图等待北京政府批准他们继续前行的通知。4月30日，期待已久的彼罗夫斯基的使者——总督的侍从武官希特罗沃终于来到了，他带来了《天津条

^① 旧译作“靡米萨尔”或“喀密萨尔”。——译者

约》的批准书，还要将它送往彼得堡。原来，彼罗夫斯基经过持续几个月的谈判，好不容易才使条约获得批准，而他所完成的使命也只限于此。中国人不仅不同意批准《璦琿条约》和签订彼罗夫斯基所提出的补充条约，而且竟无礼到凡与《天津条约》无关的谈判，一概予以拒绝。当他们看出，俄国全权代表的要求是由于提供俄制军械和派遣军事教官而提出时，就正式将两者均予以拒绝，并对一位新任俄国公使的来到（照他们看来，这件事既突如其来，而又毫无可取），表示诧异。

这些情况对于伊格那提耶夫的出使关系重大。由于事态出现了这一转折，作为此次出使的主要目标，即帮助中国办理军事这项任务便不复存在了。当中国的大臣们对彼罗夫斯基作了上述声明后，若再派遣俄国军事教官和运送军械，便属完全不可思议的事了。于是伊格那提耶夫擅自改变了授予他的指令。由三百八十辆载有各种枪炮（伊热夫斯克城工厂制）的大车组成的运输队到达上乌丁斯克后就不再前进了。从彼得堡来的军官们（除巴柳泽克留在伊格那提耶夫身边外），均听凭总督安排。原拟用来装备大沽炮台的大炮运往诺夫戈罗德港，嗣后又运往尼古拉耶夫斯克^①，而轻武器则转交给了西伯利亚部队。这支部队在此以前仅有一些枪膛已经扩大的滑膛枪，其中多半还是燧石枪。拨给伊格那提耶夫用以建设中国武装部队的五十万卢布，则交由伊尔库次克金库保存。

所有这些处置，事后完全得到了俄皇的赞许和肯定。

III

中国人突然拒绝接受军械一事，完全改变了外交部预定的任务。以组织军事教练事务为主要目标的具有外交性质的一次出

^① 即庙街。——译者

使,此时则变为纯粹是为了完成一项外交使命了;没有取得任何外交职衔的伊格那提耶夫的地位也变得极其暧昧。为了摆脱这种处境,他立即请示外交部,目前他以使用何种正式官衔为宜。

这种待命状态结束得比预想的为快。5月15日,库伦行政长官派驿使携信驰报恰克图行政长官,声称,中国皇帝已同意让俄国公使进京。这种匆忙决定的原因,稍后才弄清楚。秉性顽固的中国人由于因循保守,不理解也不愿意承认,将彼罗夫斯基由一个教会的普通负责人(柳比莫夫、科瓦列夫斯基等人都曾任此职)改称为公使的高级职衔是合法的,因此,当皇帝得知真正的公使已抵恰克图时,立即下令准许他进京。

离开恰克图的行期定于5月24日。除了由伊格那提耶夫任命为侍从武官的巴柳泽克外,随行的有书记官、七等文官沃利夫,汉语译员、五等文官塔塔里诺夫和蒙语译员、少尉瓦姆布耶夫,还有由五名哥萨克人组成的护送队。

他们懂得,显赫的声势在东方民族的心目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因此竭尽全力,以最隆重的方式为出行者举行欢送仪式。在大教堂作完送行祈祷以后,全权代表在人潮簇拥下进入广场,署理总督职务的科尔萨科夫将军陪同他对广场上列队欢送他的地方军队进行检阅。伊格那提耶夫向部队致答礼后,就任他们朝着通往边界的道路开去,而他自己则在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和恰克图的地方长官、商界人士、女宾和几乎全体居民的陪同下,徒步前往边境。在恰克图和买卖城的中间地带,牧师们举行了简短的祈祷式,然后,伊格那提耶夫向全体送行者作了最后的告别,向部队道了谢,和市行政长官一起坐上马车,在三百名哥萨克人护送下,向蒙古境内的第一个驿站驶去。

所有这一切都是做给当时在恰克图和买卖城的蒙古人和中国人看的。根据这些目击者的传述,住在北京的人们当然会认识到

俄国代表的力量、权势和地位。

IV

路途是漫长而艰难的。首先是通往北京的交通方式问题。在此以前，旅行者经常是以商队的方式行进的。而这次前往的使团觉得这样过于缓慢，决定试用中国的两轮马车。这一办法是成功的，坐两轮马车不仅舒适，更重要的是比较迅速。男女驭手们将马套上车轡，便头也不回地一往直前，而且多半是疾驰而去。

这样，伊格那提耶夫一行于5月27日到达库伦。他们在此逗留了两天，以便等候落在后面的人，同时，一般说来，也是进行一次行军间的休整。通过蒙古和戈壁草原的其它地方，用了十一天时间，其中在张家口又逗留了两天。

从蒙古一进入中国本土，地方当局和官员对俄国使团的态度便急速改变了。没有一处举行过正式的欢迎仪式，中国政府的全部关注仅限于派遣两名官员伴送该行人员到北京，而按照惯例，不仅对新到任的教会监护官，即使对于普通的信使，都得如此办理。

中国当局对使团的这种态度使全权代表耽心，从张家口到北京，而主要是进入京城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

6月15日，星期一，使团来到了北京城外的俄国公墓。除彼罗夫斯基和固礼神甫外，教会的全体教士和世俗人员都前往欢迎。在进城和去南馆的途中，伊格那提耶夫坐着彼罗夫斯基头天发去的一顶绿呢官轿，由骑马的随员和护送的哥萨克人簇拥而行。中国官员曾劝阻说，京城的百姓从未见过外国人坐这种官轿，俄国公使此行会在城门口引起骚动。使团对此当然置之不理；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使团在百姓十分安宁而又惊讶的状况下，隆重而顺利地穿越了全城。

南馆给这些新来者的印象极坏。住所狭窄、肮脏，又寒伦。没有任何的成套家俱，没有器皿，没有餐桌布、银餐具，就连生活必需品都感到缺乏。根据最新消息，外国代表来北京的问题已经正式解决，这就必须考虑到俄国公使以南馆作为长期住所，并将在此接待各国使节的问题。要将南馆收拾得像个样子可得费不少力气，有许多东西甚至得从恰克图订购。

新使团来到北京对清廷并未产生多大影响。曾和彼罗夫斯基进行谈判的大臣理藩院尚书肃顺和刑部尚书瑞常，派遣了两名官员前往迎贺新到的使团，这便是清廷的全部关注。次日，伊格那提耶夫正式通知军机处，他来此接替彼罗夫斯基，旨在商讨与两国利益有关的各项问题。

V

彼罗夫斯基于18日离任，而19日，中国官员就前往俄国使团通知说，已再度任命肃顺和瑞常与俄国全权公使进行谈判。为使中国人将来无法否认即将进行的各项交涉，必须使这些交涉具有正式的官方性质。于是，伊格那提耶夫坚持要用书面方式通知此事，并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

从全权代表在北京遇到的俄国事务的状况推断，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甚微。外交部在指示彼罗夫斯基办理《天津条约》的批准事宜时，还曾委托他将我国的边界确定下来，谋求割让滨海地区，为我们的贸易争取某些权利等等。我方代表所提的建议均遭拒绝。彼罗夫斯基为维护自己要求所阐述的理由，先是遭到肃顺和瑞常的口头驳斥，接着军机处又连发三个正式照会，对肃顺所述的一切均表示同意和确认。肃顺直截了当地拒绝承认《璦琿条约》，而军机处则称签订该条约是失当的。

为了使这一粗鲁无礼的声明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政府颁布了清帝的上谕，将同俄国人进行僭越谈判的黑龙江将军奕山及其助手吉拉明阿(两人均参与璦琿谈判)革职。

我们在阿穆尔新近采取的行动和在北京已开始进行的不合时机的谈判，引起了中国当局对俄国的不信任，他们怀疑俄国意欲侵占天朝的领土。由于无法与别国代表们以及我们在中国沿海航行的船舰取得联系，由于除了《京报》所刊载的消息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得到任何情报，最后，还由于中国人正式拒绝和我们谈判划界问题——所有这一切，使俄国使团在北京的政治境遇变得十分困难。

为此，伊格那提耶夫写道：“如果说，我们在北京曾经有过一些影响，那末，目前它已不复存在。俄国人在此比在中亚细亚更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早在科瓦列夫斯基时期，在我们馆里经常可以见到当地居民，而现今，从未有一个体面的中国人来看望我们，正象没有一个俄国人在城里造访别人一样。中国人尽管天生贪财，但店铺却拒绝售货给俄国顾客，而我们只好通过中国的仆役购买各种物品。我们既无情报员，又无侦探，因此我们能知道的，也就是报上所公布的那些消息。”

在讨论俄国全权代表和中国大臣会谈的问题时，中国官员力图将日后进行会晤的地点定为理藩院。对此，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俄国大皇帝的全权代表，不能接受诸如对待朝鲜这类小国使团所采用的办法，因此他只愿在自己的南馆进行会商。这一要求获得实现，两国全权代表遂于6月28日在馆内举行首次会晤。

在被任命进行谈判的两位中国大臣中，庸庸置疑，肃顺起着首要作用。他作为皇室的一员，对事件拥有巨大的、几乎是无可限量的影响。他作为主战派的首领，对一切外国人一般都怀有敌意，而对满洲领土有所企求的俄国则更受其敌视。他习惯于周围人对他

的阿谀奉承，表现得极端放肆，有时出言不逊，甚至达到有失体统的地步。瑞常与他相反，是一个沉默寡言、抑郁阴沉的市侩，显然，他惧怕肃顺，因而不敢对他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谈判伊始，中国全权大臣就以最不合礼仪的方式向伊格那提耶夫说，皇帝得悉俄国新任公使抵达的消息时甚为诧异。他们说：“公使恐系出于误会，尚未自彼罗夫斯基处获悉，〈天津条约〉批准事宜业已完成，军械和教官一事已作罢论，俄方所提各项新建议，均已予肯定明确之回复。北京已无未了之俄国事务。”全权大臣最后还说：“皇上旨意，新任俄国公使应尽快返回贵国。”

以生硬粗暴方式作出的如此妄诞的声明，使人一目了然，中国政府有意要通过其代表肃顺，置俄国公使于受挑战的地位。对上述这番话进行反驳时，既需避免和中国决裂，又要维护俄国的尊严，这是难办的事。

伊格那提耶夫尽可能平静地回答说，关于军械和军事教官问题当然不必再议。他说：“当我们刚一收到彼罗夫斯基的信，便确信，中国人并不珍视俄国对他们真诚的同情和善意，我们立即取消了派遣军事教官的计划，并已将军械运回。”公使在结束其谈话时说：“我之所以来北京，旨在了结根据〈天津条约〉、〈璦琿条约〉和其他诸条约应予解决的一切俄中问题。”

肃顺将拒绝接受俄国军械一事，说成是为了消除清政府和英国之间的误会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同时他也同意划定俄国和中国之间的东部边界，但又认为由于不明地理；而无法在北京商讨该问题。中国全权大臣建议委托吉林将军就地解决此事，并认为必需补充说明：“朝廷万难允许俄国侵占满洲寸土，为了满洲，我们不惜开战，至于满洲诸港，恐日后终将不保，然而我们亦不认为非让与俄国，而不能让与英国等其他列强。”

他们完全否认〈璦琿条约〉，声称它是无效的，因为奕山（订约

人)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也即无权将阿穆尔左岸让与俄国,正因为如此,皇帝对奕山及其助手这种专擅和卖国行径给予了严惩。伊格那提耶夫对此反驳道,清帝对其臣属是否满意与他毫不相干,但是俄国也和其他有教养的民族一样,既然恪守条约的信义,便不能否认《璦琿条约》。如果清帝不承认《璦琿条约》,并借口奕山擅自妄为而将其签字视作无效,那末,清帝不仅得承认同样是签订该条约的大学士桂良和尚书花沙纳的签字为无效,而且还得承认清帝本人的那道上谕(中国全权大臣曾根据这道上谕向普提雅廷宣布:和穆拉维约夫伯爵进行的边界谈判已经顺利结束)也是无效的。

中国人对于有否此项上谕**提出异议,因而一再要求出示该上谕。同时,他们还请求将俄国全权代表经常引以为据的《璦琿条约》、《恰克图条约》和《尼布楚条约》的原文本给予一阅。但不幸的是,这些文件全都留在外交部,当伊格那提耶夫离开彼得堡时,外交部并未供其使用。

显然并未见过过去条约文本的中国人力图证明,《恰克图条约》和《尼布楚条约》一则因年代久远,二则已由《天津条约》完全代替,因而已经失效。

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快要结束时,伊格那提耶夫迫使中国全权大臣作出保证,将他的所有声明和建议立即奏明清帝。为了改变未来会谈的性质,并迫使肃顺降低调子,伊格那提耶夫向他说明,在和俄国这样强大的国家进行谈判时,任何敷衍武式的狂悖举动都是不适宜和不礼貌的。全权代表说:“我国与中国的边界绵亘达七千俄里,俄国较之其他任何海上强国都更易于随时随地给

* 中国凡签订国际文件,均备刻有一种专用印章,印章上的铭文表示授予盖印人以何种全权。若未加盖此种印章,签字即属无效。

** 有理由推断,中国方面为了使欧洲人尽快离开天津,遂将上谕告知普提雅廷,而事先并未奏明清帝。

中国以有力的痛击。”

关于进一步的谈判，双方决定，一切预备性会商均由肃顺委托的官员与我方译员塔塔里诺夫和固礼神甫在俄罗斯馆内举行，全权大臣肃和瑞只在特别重要的场合，而且必须是在俄国全权代表邀请时，才亲自来馆。

这次和中国方面的首次会谈，将两国间不能令人满意的关系暴露无遗。它使伊格那提耶夫完全确信，中国方面对我们既不尊重，也不畏惧，却将我们当作阴险狡诈、无事生非、而又胆小怯懦的邻邦。我们则认为，中国人对我们的这种看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我们不断地劝说中国人相信，我们两世纪来的友谊是始终不渝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他们信服。于是，我们要求他们作出对我们有利的重大让步，并且警告他们，如果我们的要求不得实现，便会引起战争。然而，我们并没有象英国人必然会做的那样寻求大炮的帮助，而仅限于毫无价值的空谈。

为了迫使中国人敬畏我们，首先需要使自己的行动表现得坚决。

情势只许我们采取下述两项决定之一：要末我们对中国提供一项帮助，使中国政府因此首先确信，俄国的友谊是不容置疑的，然后我们再提出自己的要求作为对此项帮助的酬谢；要末我们将划界问题由北京移到边界，在边界的一些地方，主要是在与满洲交界的一些地方采取一系列重大的示威行动，万不得已时甚至不惜采取军事行动，以使用武力达到我们的要求。

中国全权大臣之所以狂妄异常，重要原因之一是，就在俄国公使到达北京前几天，中国人在大沽口打败了英国人。事件的具体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英国公使普鲁斯为办理《天津条约》的批准事宜，率领了一支分舰队驶抵直隶湾，他以通常的大不列颠式的傲慢态度要求准许其中的一艘军舰驶赴天津。

本欲和平接待外国使团的中国当局答复说，白河两岸建有炮台，因此不能让英国兵船驶入，并且警告说，若有船舰执意不听劝阻，强行驶入该河，定将炮击不贷。

英方置中国当局的劝阻于不顾，因而受到了惩罚。靠武力为自己铺平道路的尝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十三艘进攻炮台的舰只中，二艘被击毁，一艘被击沉，三艘被击漏，后获救，其余各艘均遭重创。已登岸的一千二百人的陆战队遭到了更大的伤亡：英国军官八人被击毙，二十七人受伤，其中何伯将军也受重伤，减员四百三十人。

中国方面的主帅僧王^①因为这一伟大胜利，得到了清帝御赐的貂皮大氅一领，海龙皮帽一顶。而英国人则得到了很好的教训。

中国当局虽然并未接受俄国的武器（否则，英国人会遭到更大的损失），然而英国国内人士全都相信，中国的防务是由俄国人指挥的。上海的一家报纸甚至载文证实说，英国人看见了炮台里的俄国人，听见了俄语的呼唤声。很多英国人为俄制来复枪的枪弹所伤。

会谈的第二天，伊格那提耶夫给中国全权大臣送去了一份旧约补充条款的草案，并附有备忘录一份，逐条作了说明。伊格那提耶夫考虑到中国人有一再讨价还价的积习，便在草案里提出了最大限度的要求，准备在谈判过程中就次要部分作出让步，而保留实质性部分，以显示俄国人的要求并不过分。草案最主要的条款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1. 划定东部和西部的边界；2. 开放中国内地的陆路通商；3. 在蒙古、满洲和喀什噶尔设立新的领事馆；4. 调整我方边务当局和中国边务当局之间的直接关系；5. 引渡逃犯，等等。

满洲人对占领阿穆尔和乌苏里江边的哥萨克岗哨并未予以任

^① 即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译者

何实际的反对，总督穆拉维约夫伯爵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政府认为阿穆尔问题业已了结。他将中国政府不愿和俄国缔结边界条约一事，解释为它害怕在本国臣民面前声张这一对中国不利的交易。这种观点赋予我们的地方当局在别国领土上行动的最大自由，这对他们固然是十分适宜的；但它不符合国际法，因而在外交关系上，特别是在与欧洲列强的关系上（欧洲列强为了深入中国内地，长时期来曾作了不少徒劳的努力），这种观点是行不通的。

外交部预见到，在我们要求正式批准《璦琿条约》时，必然会出现困难，便同意了穆拉维约夫伯爵的意见，以简单交换双方确认的边界地图来完全代替批准条约的手续，从而使划界一事具有足够的合法性。

穆拉维约夫为了执行这一任务，早在冬季就请璦琿办事大臣在解冻以后立即派遣清廷的界务官到乌苏里江口，会同我方官员勘定边界线。我方则派总督的总军需官布多戈斯基上校前往办理此事，他于4月4日到乌苏里江，5月12日抵兴凯湖，并从陆路向海边继续前进。直到6月16日才到达图门江口（从这里开始为朝鲜国境）。备尝艰辛的这段旅程（由于没有道路，必须经常在人迹未到之处，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却是劳而无功的：所到之处既没有中国方面的界务官，也没有别的官员。不数日，穆拉维约夫亲自来到了波谢特湾，他将抵达的日期预先通知了璦琿办事大臣，但也沒有人在这里迎接他。穆拉维约夫在该湾白等了六天，他确信是中国当局回避划界，遂启碇离港，乘坐“亚美利加号”轮船直驶直隶湾。总督改名换姓，于7月2日到了直隶湾，旋即遣其下属迪西克里安尼公爵*、布多戈斯基和译员希什马廖夫登岸，并派他们去北京向

* 迪西克里安尼是杀害加加林公爵的伊麦列京斯基公爵的兄弟，因为他是凶手的同犯，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穆拉维约夫任用他为侍从武官或传令官。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美男子，仪表十分威严。

伊格那提耶夫面呈一份地图，图中新标定的边界线正是他希望在上乌苏里江边区划定的界线。

穆拉维约夫在恰克图和伊格那提耶夫分手时就约定，等他一到直隶湾，伊格那提耶夫就立即派遣他的侍从武官马尔蒂诺夫上校前去向他报告总的情势，马尔蒂诺夫是专为此事而住在北京的。

但是，实现预定的计划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俄国人从北京和停泊在直隶湾的俄国舰只取得联络。他们认为，准许俄国人去海边，这就无异为外国人开创了一个极为不妥的先例，他们定将效法此例，以便和京城建立起正规的联系，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在北京派驻欧洲国家的常设代表，而中国当局对此却是悉心避免的。大沽的惨祸就是他们怀着不容他人覬覦的心情维护与海上联络的不可侵犯性的明证。

在穆拉维约夫的使者到达前一天，举行了两国全权代表的第二次会议。会议一开始，立即就派遣马尔蒂诺夫取道北塘去海口的问题展开了争论。会议持续了五个小时，几乎毫无结果。肃顺全然不顾俄国全权公使阐述的理由，根本不愿谈及在上乌苏里江地区作出让步和在该江与图们江之间划界的问题，并称，清帝认为俄国军队占领东部边界地区是破坏两国间友谊的行为。

在所有提出的问题中，只有割让满洲港口的提议有所收获，而这也全靠了肃顺的奇怪想法，他认为中国当局掌握沿海港口反会大大便利于外国人深入内地。

会谈终了时，伊格那提耶夫将他在首次会议上说的话作了一番印证。他说，根据《璦琿条约》让与俄国的土地事实上已归入俄罗斯帝国版图，因此已由我国军队占领（实际上确已按照穆拉维约夫的命令如此办理了）。

中国大臣对口头拒绝还嫌不足，过了三天又通过理藩院发来公函，坚决地逐条驳斥了伊格那提耶夫提出的所有要求。但这一

情况并未受到重视。6月17日^①，迪西克里安尼公爵奉命经北塘返回直隶湾，尽管中国当局沿途阻挠，他仍顺利到达该湾。他头戴一顶高加索的毛皮高帽，身佩一柄很大的短剑，他的威武的外表和刚毅的姿态，使中国人望而生畏。他不吐一语，既不说汉语，也不说蒙古语，马不停蹄，由北京径直往东。他走进百姓家里，就把人吓跑了，因而搞到了马匹和食物。

他到了直隶湾后，便乘坐正等候着他的俄国船只前往东京，是时，穆拉维约夫也离此前往东京了。

与此同时，马尔蒂诺夫上校奉命取道蒙古去西伯利亚，他对那些阻滞他行程的官员也采取了生硬粗暴的态度，因而同样使地方当局感到畏惧。两星期后，理藩院向伊格那提耶夫提出了请求：“往后勿再差遣此等粗野之人，惊扰地方百姓。”对此，伊格那提耶夫回答说，如果中国官员不是阻挠，而是满足我方的要求，那末，这些受到差遣的信使，这回虽使中国官员如此惊恐，往后则不致非逞其勇武不可。

VI

北京的局势继续复杂化。英国人在大沽的不幸失败使中国政府确信，它能够与欧洲相抗衡。它决定从推翻《天津条约》开始。还在首次会商时，伊格那提耶夫就劝说肃顺，至少不要与法国和美国发生争执。这位中国大臣骄傲地回答说：“我国政府本欲和平接待外国使团在京办理条约批准事宜，而英国人却强行闯入白河，与我交战。僧王大败英人，击毁战船数艘，捕获俘虏多名。欧洲人首起衅端，破坏和平，故而皇帝圣意，去年在天津所订之诸条约，概不承认，至于与俄国所订之约，因已获批准，当不在此例。”

^① 根据上下文，此处似应为7月17日，原文恐系有误。——译者

中国政府的傲慢在对待美国公使华若翰的态度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华若翰是应中国政府之请，在它和英、法关系破裂后来到天津的。他乘一辆门窗紧闭的中国式马车，以一种和公使身份极不相称的方式进了北京，然后便被安顿在指定的寓所里，在此，他竟完全出乎意料地受到了监禁。

中国人在这所房子所在的胡同口筑起了街垒，撵走了邻近的全部居民，岗哨里里外外将使团团围住。美国人外出购买食品甚至亦遭禁止，而由中国当局免费供给他们。

总而言之，中国人对待他们，就象往昔对待萨瓦·弗拉迪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的使团和其他使团一样，不过象美国使团在进入京城时不受礼遇的情况却是没有先例的。

与此同时，俄国使团，它的所有官员，甚至低级官员和仆役，都享受着充分的自由，在全城各处通行无阻。相形之下，中国当局对美国人的态度就更显得奇怪了。

华若翰提出的觐见清帝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中国当局非得美国公使答应按照中国宫廷惯用的仪式下跪、磕头等，才准他进宫。而这对外国人却是屈辱的礼节，华若翰当然不能同意。

伊格那提耶夫遵照外交部原先的指令，试图和美国人建立联系，便派译员和迪西克里安尼去美国使团，建议为他们往直隶湾转送公函，但是中国当局不准任何人进入住所。更有甚者，理藩院竟如此无礼，以致向俄方发出了正式禁令，不许他们前往和美国使团联系，因为美国使团受到监禁。伊格那提耶夫收到理藩院如此不成体统的函件后，没有放过这一机会，遂致函军机处，理直气壮地指控理藩院。进行这项指控具有双重目的：第一，他希望从此终止实质上是管理中国的藩属和朝贡国事务的机关和他所作的无休止的周旋，而和帝国的最高政府机关军机处建立直接联系；第二，防止中国人用对待美国人的办法来对待俄国人。

俄国全权代表措词强硬地抗议中国政府对待外国代表的这种态度，并宣称，如果中国君主不同意象俄皇陛下在彼得堡接见他那样地站着，并和他握手，那末，他本人宁可及早放弃觐见清帝的这种荣誉。

华若翰觐见清帝的要求既遭完全拒绝，于是和桂良简单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后便离开北京。当时如果不进京城，在北塘或天津便很容易办理此事，而不致蒙受不必要的屈辱。美国公使的挫折对欧洲代表是一个警告，有鉴于此，他们都延期来京，这对俄国是有利的。

穆拉维约夫对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璦琿条约》一事毫不理会，坚持将其付诸实施。

8月底，他在致伊格那提耶夫的信中写道：“从10月初起，我将在布拉戈维申斯克^①等候您的消息，并相机在阿穆尔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说，从松花江同乌苏里江会合处到图们江之间这一地段尚属未划界的土地，我不认为这是坏事，而是大好事，因为我们滨海的边界线至少将划在朝鲜的边境，而沿乌苏里江的边界将划到该江和松花江的合流处。这一切我已与其他方面谈妥，现在不必惊动军机处，待至适当的时机再和中国交涉。^②所以，我现在就命令将所有中国官员和岗哨从乌苏里江右岸撵到左岸，对顽抗者予以逮捕，并用武力押解至璦琿。”

可见，穆拉维约夫十分关心和他声誉息息相关的阿穆尔—乌苏里问题的顺利解决。这个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将会给俄国的威望和它在极东部的实际利益带来损失。穆拉维约夫和外交部一

① 即海兰泡。——译者

② “这一切……”起原文为法文：c'est tous ce qu'il nous faut pour les étrangers et avec la Chine nous arrangerons en temps et lieu sans inquiéter le ministère. ——译者

样，最怕英国人来干涉我们的事务，甚至可能占据那些非我莫属的沿海港口。同时，穆拉维约夫还认为，只要中国政府同意我们拥有这些港口即已济事，因为他觉得过去那种逐渐占领的方式今后仍属可能，所以并不为划界是否精确的问题而忧心。

穆拉维约夫既已确信《璦琿条约》不可能完全生效，为了挽救他的这一宠儿，他提议只有根据清帝业已批准的《天津条约》，牵强附会地引用该条约的第九条，来说明由他标定的边界线的见解。

“中俄两国边界未确定部分将立即由两国政府派出的信任大员就地勘察，他们签订的边界线条款将作为本条约的补充条文，划界后将拟定详细记文并绘出毗邻地区图，以作为今后两国不容争议的边界文件。”^①

伊格那提耶夫将与中国当局谈判无效的消息告知穆拉维约夫，他建议对中国当局不愿承认我方在滨海地区的主权一事，不予理会，并论证说，必须刻不容缓地在英国舰只到达前，用设立军事哨所的办法，将满洲沿岸最重要的地点全部予以占领，并升起俄国国旗。穆拉维约夫于11月初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发出的复信中写道：

“在前来此间的途中，我采取了下述行政措施。

“在哈巴罗夫斯克^②我曾下令，不许一个中国官员沿阿穆尔而下去哈巴罗夫卡；我命令将我发现的在乌苏里江江口附近右岸的清兵岗哨撤往对岸，如遇阻挠，准予出动我们的士兵和船只。当我确悉乌苏里江左岸居民尚不知《璦琿条约》的内容后，我便派遣上百名哥萨克人前去向他们进行讲解。我警告璦琿官员，如果发现他们中有人不执行《璦琿条约》的条款，就要立即将他们逐出该城。

① 见《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5月版，第30页。
——译者

② 即伯力。——译者

我用这些办法向清廷证明，我是严格履行和中国订立的条约的，并要求他们也照此办理……”穆拉维约夫接着写道：“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减轻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为中国安排的厄运。北京将被占领，中国人必遭惨败。不过即使如此，只要我们能不失时机地介入中国人和联军之间的谈判，我们仍能在京城失陷后向他们伸一援手，当然，这是以清政府不再拒绝我们的要求为条件的。”

VII

当时北京的情况依然如故。穆拉维约夫送来的新边界地图，丝毫不能说服中国大臣，而送图来京的布多戈斯基上校在北京虚度了整整两个月，已定于9月初经蒙古返回伊尔库次克。

伊格那提耶夫并未因中国政府拒绝了他的建议而感到多大不安。过了几天，他重又致函肃和瑞，请求他们留意审阅前此关于俄国事务的所有公函，随函并附有一份详细的备忘录，逐点反驳了中国当局的答复。

伊格那提耶夫将《璦琿条约》和中国当局不敢否认的《尼布楚条约》进行比较，写道：“究《尼布楚条约》之历史，显而易见，订约双方不谙地理，使俄中两国东部边界未得准确之划分。两国之全权代表唯见兴安岭由格尔必齐河朝东走向，遂定顺兴安岭至海为界。据新近查明，兴安岭起先确由格尔必齐河向东，后分为两岔，一岔向北入鄂霍次克海，然其主岔却向南折去，于黑龙江、松花江两江汇流处之北越黑龙江，而断过三姓地方。情况既经查明，重划更准确之边界势在必行，去年在璦琿已另有专约将此确定，仅此作《尼布楚条约》之补充。

“倘以兴安岭为界，则由其分岔处至海之边界仍需划分。若将兴安岭之主岔——南岔为两国边界（如此方可称为公平合理），贵

国三姓、吉林两地之大部则将丧失，此非俄国之所望。然贵国欲顺黑龙江偏北甚远之兴安岭北岔划界，本国亦断不能让步。俄国之要求皆系正义、合法之举，故坚持照普提雅廷 1858 年所奉之贵国皇帝上谕办理，将乌苏里江右岸让与本国，并顺该江和黑龙江划界。俄国船只得松花江为例，亦许在该两江上通航，乌苏里江至海之地，于边界最后划定前，暂由两国共管。”^①

伊格那提耶夫然后转到沿岸港口问题，写道：“英国肆行威胁，贵国时值危难。目下英人欲取道大沽向北京大举进军，其为害于贵国者甚巨。然其远离欧洲，尚不能将其征伐所需之兵员立即调齐，故正需用海口，逐步集中其兵力。英人要占领海口并非难事，倘其一旦予以占领，则将常向直隶湾沿岸、天津乃至北京进犯，而使居民百姓不得安宁。

“贵国政府深感此项危险之不可免，今欲避免之，其唯一办法，即由中国当局将此等海口交由俄国设防守卫。

“肃、瑞两大臣知此策于中国大有裨益，故亦称此为良策。

“至若本国之陆路通商权利，《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均已予以极明确之规定，故于《天津条约》中已无庸提及。”

伊格那提耶夫在信的末尾写道：“本公使提议之六项补充条款，皆已予以明确之剖析。然贵大臣肃、瑞二公之答复，千篇一律，纯属无聊而又无理之陈词滥调。”

中国大臣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竟至恬不知耻地解释说：由于臆抄普提雅廷所奉的清帝上谕的司书们的错讹，因而造成了

^① 参见《成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 42 卷，第 16 页《俄罗斯照会》（九年八月初五，公历 1859 年 9 月 1 日）载：“然照会屡次言及立尼布楚和约时，两国并未查明此地。但知兴安岭之西、格尔毕齐河源处，约略云，顺此山至海为界。其极东近海之地，作为共有，俟将来查明再定。据新近查明兴安岭分为两岔，一岔往北至冰海，一岔往南至黑龙江，断过三姓地方，盖兴安岭北岔不能为界，因其向北不向东，兴安岭南岔为界，与中国有亏，是以瑛珲城议定以黑龙江乌苏里等处为界，则两国皆有裨益。”——译者

两国间的误会。

他们写道：“本政府仅允贵国暂用中国领土的某些地段，而绝无将乌苏里江永远让与之意。

“迄今为止，俄国商人仅在伊犁、恰克图和塔尔巴哈台三处贸易，从未在他处行使此项许可权，且旧有之条约皆已由《天津条约》所代替，该约于贸易一事从未稍有提及，故《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所予贵方之陆路贸易权，即不再生效。”^①

中国当局继续写道：“今我两国新换条约，理当倍加友好，互相遵守新章，以为信义。今贵国于初换条约之后，即欲增出他事数条，而贵大臣又以侵占扰乱之语，轻出于口，设果有此事，本政府必将贵国负我美意，不顾本国新近所作之重大让步，转欲侵占他处地方，种种情节，宣示中外。”^②

“贵大臣固执己见，不知贵国所欲全与本国利益不合，本国断不能予之。”^③

中国当局在来文的末尾写道：“现时，我国已派该处将军副都统在彼，等候贵大臣详细定义。贵大臣必须迅速到彼，不可使将军久候时日，方为妥善。”^④为将公使逼出北京竟想出这种办法来，是

^①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0卷，第28页《给俄罗斯照会》（九年六月廿五，公历1859年7月24日），文义基本一致，唯俄文未句“即不再生效”一语，在《始末》中为“今毋庸议”。

• 外交部最耽心发生这类周折，因为它将使《璦琿条约》尚未被清帝接受一事公开暴露出来，从而可能于海上列强以借口，干预将满洲海口并入俄国的问题。中国方面的威胁又一次使伊格那提耶夫确信，我国和中国的划界事宜必须瞒过外国人，并于他们在北京安顿下来之前办妥。

^②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1卷，第1页《给俄罗斯照会》（九年七月初二，公历1859年7月31日）。按其文义基本一致，惟于“设果有此事”一语后，尚有“我中国必将相持贵国二百余年优厚之意，并借与黑龙江左岸旷咽吞屯奇咭地方，为贵国流民居止，又新立条约，五口通商，一切相待美意情厚，而贵国转欲侵占他处地方，出言无理，种种情节，宣示中外，使各国闻之，共知贵国之非是”等语。——译者

^{③④}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1卷，第1页《给俄罗斯照会》（九年七月初二，公历1859年7月31日）。——译者

最无耻和无礼不过了。

在和中国人进行的最后几次会商的某次会议上探明，缔结《璦琿条约》时发生误会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不谙地形。我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时，认为松花江是阿穆尔的支流。而中国方面，正象后来所表明的，称它是阿穆尔本江的下游。为了辩明该问题，伊格那提耶夫要求参阅普提雅廷所奉关于《璦琿条约》业已签订的那道上谕的抄本，但是小心谨慎的中国人托词拒绝了这一要求，声称，此件存于军机处，他们未敢冒昧请取。在后一次会上，全权代表间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执。目空一切的肃顺总是过于随便，他竟将给他看的《璦琿条约》文本掷于桌上，并很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伊格那提耶夫顿时起立，大声宣布说，肃顺的举止完全是失礼的行为，他还放肆到如此地步，竟至当着俄国公使的面蔑视国际文件，于是公使退出会议，并立即补充道，他将请求军机处另派知礼的全权大臣。^{*}

翌日，伊格那提耶夫向军机处送去一份指控两位全权大臣的正式文件。谴责肃顺的罪状有许多条，而对于完全听任肃顺左右的瑞常，则指责他缺乏主见。伊格那提耶夫向军机处宣称，与肃和瑞这样的全权大臣进行谈判毫无益处，要求指派别的大臣代替他们。

四日后，军机处对伊格那提耶夫的指控作了答复。军机处竭力为被指控者进行辩护，并表示完全相信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它写道：“本国信任大臣，既与贵大臣办理事件，断无不诚心相待之理，其每次与贵大臣面议言语，皆系据理直言，本处均已知悉，何谓先出无礼之言？现在我们派出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在彼久候贵国使臣妥办，而贵国使臣竟未到彼会办，是贵国使臣并不以和约为重。我国根据《天津条约》，对贵国作出重大让步，准许贵国七处海

^{*} 对于一位中国官员，指责他不知礼貌乃是再大不过的侮辱。

口通商，又将黑龙江沿岸地区、马林斯克^①及海边空旷地区让与居住，并准予由黑河口顺松花江往东入海行走。至乌苏里、绥芬河一带之土地，决不能让与贵国。前因黑龙江将军奕山办理糊涂，是以大皇帝将伊撤任惩办，贵使臣岂尚不知？贵使臣必欲将所求之事，件件允准，方为和好，有是理乎？以本大臣之意，不若贵大臣迅速知照贵国会办地界之人，早赴黑龙江，会同我国信任大员，详为妥办，勿误两国公事。”^②尽管此信措词严厉，令人不快，但由此仍可看出，对中国官员的指控，毕竟还是产生了某些作用。

军机处已不再如以往那样否认穆拉维约夫和奕山签订的条约本身的存在，而仅以中国全权大臣的这一“糊涂”行为，作为政府不承认该条约的理由。

军机处初次承认我们有权占领滨海“空旷地区”，这对我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从阿穆尔河口到符拉迪沃斯托克^③海边所有地区都是空旷的。军机处过去宣称，任何重新划界的议论纯属多余，现在却通知说，已有两名将军奉命在边境等候俄国全权代表。在照会的末尾，军机处甚至不再坚持非要伊格那提耶夫本人去阿穆尔和乌苏里江，只是建议派遣信任大员前往彼地。

10月6日，中国官员来俄罗斯馆请求确定继续谈判的日期。此事也可看作是某种良好的转机：俄国公使在刚来北京的头几个月里，每次会晤都得亲自求见，中国人则毫不客气地表示，他们厌倦开会，并认为这些会是多余的。现在，伊格那提耶夫在北京看来立足已稳，但事情仍未因此而取得些微进展。

肃和璫于预定的日期和时辰来到俄罗斯馆。两人都彬彬有

① 即闾吞屯。——译者

②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2卷，第26页《给俄罗斯照会》（九年八月初九，公历1859年9月5日）。——译者

③ 即海参崴。——译者

礼，竭力为自己辩解说，他们经常将谈判进程启奏皇上，其一切行动，皆由清帝允准，并责备伊格那提耶夫似乎不应向军机处诬告他们。

在9月这一个月份中，伊格那提耶夫向军机处还提出过两次申诉，指控中国全权大臣固执己见，但毫无结果。于是他宣称，意欲派遣官员前往瑗珲以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军机处仍有意摆脱令人讨厌的公使，答复道，它认为这在目前是多此一举，而同时又说明，当地的将军已奉命在阿穆尔等候全权公使本人，以期尽好尽快办妥此事。

自此以后，交往中断了整整三个月。

VIII

难以设想尚有比俄国公使在北京的处境更为艰难的了。由于远离彼得堡，他发回去的报告不过五、六个月便不能得到回音，这就迫使他一举一动不得不自担风险，自负责任。他只好在没有任何物质手段，孤立无援，几乎是单枪匹马的条件下从事极为重要的工作，并和深悉俄国企图、熟知其弱点的顽固倔强的中国人争斗。当时的形势要求，无论如何必须在别国代表抵京前将事情办妥（因为就连中国人也经常以别国代表来京恐吓伊格那提耶夫），这就使本已艰难的局势更加严重了。

在这种束手无策的状况中，唯有被撵出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留给我国教会的大量藏书*可以排愁解闷。伊格那提耶夫在中国京城羈留的整个期间，广泛利用这批藏书研究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和传教士的活动。从这批藏书得来的知识，使他后来颇为容易地

* 在缔结和约和法国人进城后，这批藏书当即归还了罗马天主教会和法国使团。

制胜了别国人和中国人，而正是由于取得了这一胜利，他才返回到了恰克图。

什姆科维奇在此期间绘制的地形图，例如北京城平面图*，带来了不少好处。

12月初，伊格那提耶夫决定恢复和中国人的书信往来。他在给军机处的照会中将自己的办事方法作了如下的说明，他写道：“本年夏，本公使即已表示同意中国政府将谈判由京城移至边境进行之提议，至今历时三月，本公使切盼吉林将军能与穆拉维约夫伯爵辩明办妥，但未能如愿。本公使谨奉本国大皇帝谕旨，要求重开谈判。”^①

伊格那提耶夫仍想摆脱对他怀有敌意的肃顺，便借口需要商讨的问题事关重大，要求委派一名大学士为全权大臣，然而军机处未予同意。

军机处在其咨复中写道：“本国之大学士，各有专管之事，并非凡事皆得与闻。尚在贵国使臣彼罗夫斯基在任时，肃和瑞即已奉旨办理谈判，现在二大臣已为继续前此中断之会商妥作安排。”^②

中国政府尽管拒绝了公使的要求，但仍认为必须增派第三位大臣，即曾参与1858年天津谈判的花沙纳参加此项谈判。但这一任命却引起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十分悲惨的后果，因而未能实现。当花沙纳得悉，处于盛怒下的清帝打算任命他（引起误会的罪臣之一）去和外国人办理交涉，解决难题时，他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于是决定自尽。

当他从皇宫散朝回家后，便与全家人诀别，据说然后便吞金自

* 没有北京城的平面图，在新近战争中招致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①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5卷，第38页《俄罗斯照会》（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历1859年12月23日）。——译者

②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第7页《给俄罗斯咨复》（九年十二月初四，公历1859年12月27日）。——译者

尽。三分钟后他已不在人世了。他的自杀给中国人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清帝当众表彰死者，仿佛他作了一件英勇的事，并表彰他的爱国精神，甚至还为此谕令以官费将其安葬。

新的会谈仍然是和肃顺、瑞常进行的。肃彬彬有礼，温文恭谦。他郑重其事地代表军机处转交了一份公文，但其中除了解释不能以乌苏里江至海口为界的原因外，毫无新的内容。公文中写道：“众怒难犯，恐该处人情不服，必启争端，反伤两国和好之道。”^①中国人在转而谈到《璦琿条约》的问题时写道：“本处确知，贵国全权代表穆拉维约夫伯爵肆行逼迫奕山签订该约。我方大臣迫于从命原另有所谋：不以正式关防画押，便有签字，亦无用处。他正图以此在御前开脱罪责。”

后来得知，中国大臣在最后一次会谈前都到军机处会商，作出决议，并完全为皇帝所赞许。决议说：“勿使与伊格那提耶夫谈判破裂，勿使俄国与欧洲列强联合，俄国所提之要求概不接受。”惯于拖沓从事的中國人在2月、3月和4月间仍和伊格那提耶夫信函敷衍。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情势的发展，以便准确无误地决定对某件事应否同意，或是对俄国应否反对。

如果中国在和英、法的争端中遭受挫折，那时，它便会决定对俄国的要求作某些让步，并以此请求与俄国联合起来，反对海上列强。反之，如果中国在天津和英、法达成和解，则将向这些国家诉说俄国的侵占行为和贪得无厌。

不顺遂的境遇使伊格那提耶夫越来越相信，从中国人那里将会一无所获，而他必须离开北京，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别国特使即将来京，他将因此而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这就迫使他最终拿定主意：只候最高指令和俄国船只抵港的消息（他为派一艘俄国船来直

^①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第23页《给俄罗斯咨复》（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历1860年1月8日）。——译者

隶湾已张罗多时了)一到,便离开北京,登上该船。

伊格那提耶夫为了使中国当局对他离京在思想上逐渐有所准备,早在2月份就预先通知他们,春天将有俄国船只驶抵直隶湾,并请求给予方便,使他和这些船只联系。然而,当时中国当局拒绝了他的请求。中国方面就此事写道:“查《天津条约》第二条内载,俄国使臣来京必得经由恰克图。经由北塘者,早经彼罗夫斯基与肃顺、瑞常议定,总须海口无事,方可前来。贵使臣亦应知悉,今值北塘设防,尚恐有敌国船只,冒用贵国旗号,前来窥探,岂能不加防备。故贵公使去海边及告知贵国船只前来之事,碍难允行。倘贵方不照此行事,日后无谓自我起衅也。”^①

当然,将伊格那提耶夫这样一位在和外国人开战时可以充当重要人质的人放出京城,对中国当局是没有好处的。此外,他们还耽心,俄国全权公使因为谈判受挫而怨恨他们,就会转向英、法方面,凭着他熟知北京,而“为他们指明道路”。

中国当局在照会中还写道:“两个月前,贵国多人擅自在乌苏里江登岸,肆行滋扰。想贵国大臣穆拉维约夫未必知悉,本大臣责无旁贷,烦请贵使臣知照穆拉维约夫,妥为管束,不可令贵国人擅自登岸滋扰。”^②军机处非常清楚,这些滋扰原系由总督的军事安排所造成,但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却故作姿态,将此事说成是“俄国流民”擅自行动的结果。

3月底,伊格那提耶夫就此事向军机处答复道,他已就发生的滋扰事件咨询地方长官,同时,他请求军机处将附于该公文内的一份封缄的正式信件转送上海(该件是寄给即将驶抵该港的第一艘

①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7卷,第34页《给俄罗斯咨复》(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公历1860年2月2日)。——译者

②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8卷,第20页《给俄罗斯咨复》(十年二月初八,公历1860年2月29日)。——译者

俄国船的船长的)。此外，伊格那提耶夫还请求中国当局下令准许一名俄国官员去北塘，他打算让这位官员留在该地，以便尽快得悉船只来港的消息。

中国当局一如既往地给了否定的回答。俄国公使虽已打算调查乌苏里江的滋扰事件，但中国当局对此避而不谈，却仍根据原先提出的理由，一概拒绝了公使的两项要求，并退还了寄往上海的信件。这就必须另谋别法了。

伊格那提耶夫利用他和天主教传教士之间的美好关系，托其中一人将公函用可靠方法送往上海，结果此事办成了。公函交给了美国领事各理德，再由他按地址转交。

伊格那提耶夫将北京的情势向等在上海的俄国船长进行了说明，并请他尽快将船驶往直隶湾。同时，伊格那提耶夫将船长所必需的情报尽行告知，指明了中国人的海防措施，同北京联系的困难以及回避困难的办法。

伊格那提耶夫不久获悉，信件已送到上海由妥人收下；于是，他向军机处提出了一项新的声明，他写道：“贵国官员虽不应允，然本国船只遵奉我国皇帝陛下旨意，日内即将驶抵直隶湾。为避免各船长与沿岸居民常易因此而引起之误会，将派一名军官和一名教会职员前往北塘，将俄国船只拦阻于沿岸工事外之安全区停泊。为便于办理此事起见，本大臣建议，派一名中国官员随同前往……”他接着写道：“贵国大臣早应明察，惟有双方切实遵行各项约定，方能两国和好，然本政府之提议无一不为贵政府拒绝或留难，由此益见贵政府所示之厚意纯属虚伪。

“尚在去年，穆拉维约夫派遣三名官员，由北塘抵北京，畅行无阻，迪西克里安尼公爵又由北京去海边，亦未受限制，而时至今日，贵国政府仍不准我方派员去海，实令人大惑不解。”

但是，中国大臣对任何理由都无动于衷。他们甚至不顾表面

的礼节，说出了“贵使臣派员前往北塘之处，应毋庸议”这一类话。^①

伊格那提耶夫逐渐确信，非采取坚决的、甚至是强制措施不可。

同时，他的处境日益艰难。他时刻等待着来自彼得堡的重要指令，而外交部却迟迟未发。发往上海的公函又尚未获复，这简直使他束手无策。

4月已逝，5月来临，终于在7日这一天，他渴望已久的消息一齐来到了。外交部答复了伊格那提耶夫提出的所有问题；各理德从上海给他寄来了最好的消息——这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日子。

外交部对于伊格那提耶夫先前在北京的一切活动表示十分赞许，并授予他公使衔。外交部一方面让他自行斟酌是否离开中国京城的问题，同时告诉他，业已采取措施组织一支特种分舰队，派往中国水域，由他指挥，并建议在“斯维特拉纳号”巡洋舰上升起驻舰旗。

外交部指示伊格那提耶夫注视海上列强的动向，建议他和美国公使联合行动，仍本着1858年普提雅廷伯爵的精神，竭力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并且切勿使战争扩大到足以推翻现行王朝的危险境地。这就是说，用汉王朝来代替满王朝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中国政府一旦将其统治重心由北京移到南方，势必摆脱俄国的影响，而落入海上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控制之中。

IX

寄往上海的信件十分幸运地落到了海军上将大公的侍从武

^①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0卷，第5页《给俄罗斯咨复》（十年闰三月初三，公历1860年4月23日）。——译者

官、太平洋舰队队长海军上校利哈契夫本人的手中，他立即将伊格那提耶夫在其信中提出的各项要求付诸实现。

他于3月21日到上海后，旋即雇了一艘日本私船驶往日本，寻找自己舰队的船只。4月3日，他抵达函馆，在此遇到了“亚波涅次号”运输船和“德日基特号”三桅快船，但很不幸，经检查后发现，该两艘船的状况实在太坏，不能出海。因此，利哈契夫没有放弃他刚刚乘坐来此的“列尼号”轮船，命令将煤添足，并派遣卡兹纳科夫中尉乘该轮携带给伊格那提耶夫的信件和物品前往直隶湾。但是，“列尼号”并未到达预定地点。夜间，它在日本海岸附近触礁撞毁，并且下沉得如此之快，以致由卡兹纳科夫带给公使的东西几乎一件也未抢救出来。

利哈契夫尽快做好“亚波涅次号”船的出海准备后，立即乘此船开往波谢特湾，并于12日抵达。他在诺夫戈罗德港投锚停泊，当即派出了由二名军官和二十五名低级官佐组成的登陆队，随带独角兽野战炮一门。同时，登陆队队长纳齐莫夫上尉还得到下列指令以便遵行。

“兹命令你：

1. 安置好自己和全队的住处后，立即着手采煤，以供中国海分舰队之需。

2. 以最稳妥的方式将转给你的事关重大的公文送往乌苏里江上游的我方村落，并继续传递下去。

3. 搜集周围地区的一切情报。

4. 对当地人的态度既要坚决，又要温和、谨慎。

5. 倘遇外国船只，你可升起我们的旗帜，并向他们解释，你所占住的地方和港湾根据《璦琿条约》规定属于俄国地界，你可以说明你是为了采煤而来的。

6. 如果你们的营地不合卫生要求，你不必将就，可将营房挪

至他处。

7. 如遇有任何未及预料到的情况,应由你自行斟酌处理。

8. 在卡扎凯维奇海军少将抵达后,你即前往求见,并接受他的领导。”

4月13日,“亚波涅次号”运输船出海,并于29日抵北塘。“德日基特号”三桅快船在得到分舰队长官从函馆启航的命令后,也于次日驶抵北塘。

伊格那提耶夫终于收到了我方船只到达直隶湾的好消息,他当即就使团离京的问题积极地和军机处通起信来。

他还以稳妥的方式给利哈契夫转去一信,建议他从分舰队中派遣一名海军军官前来和公使面谈,此信的副本也送往了军机处。

X

中国当局对公使最后的声明尚未答复,因此,禁止伊格那提耶夫离开京城的谕旨仍属有效。这是一个亟须澄清的问题,所以伊格那提耶夫利用收到恰克图发来的公函的机会,想再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于是提出了下述的最后通牒:

“我们两国间之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致使本国政府不胜诧异。本国皇帝陛下与中国大皇帝间所订之《璦琿条约》已付实施,今发生误会,实非所料。整整一年半来,我方竭力履约行事,但是,于此期间,不论我方前任大臣或本大臣,均未取得贵国大臣应有之合作。

“现今本大臣得到本国皇帝陛下谕令,向贵国政府最后一次提议履行《璦琿条约》,了结划界事宜和其余问题。

“本大臣务请贵大臣从速将此奏闻贵国大皇帝,并迅即给本大臣以断然答复:究竟愿否交换并确认两国间之边界地图。

“倘军机处准行，本大臣愿继续会商，此意早已为贵大臣所知悉。不然，本大臣将遵奉本国命令，即行离京，前往北圻，登乘停泊该处受我指挥之船只。为减少旅途之阻碍，切盼贵大臣派员护送，并请按本公文附件所提之要求准备运送车马。本大臣定于16日启程，务请于5月11日前作出答复。为此照会，1860年5月8日。”^①

一星期后，军机处总算赐予答复。清帝批驳了伊格那提耶夫的请求，并且绝对禁止公使本人去海边，甚至连他的任何一个随员也不得例外。

这种荒诞的禁令当然不能使伊格那提耶夫改变自己的意图。他命令尽快将出发的准备工作办理完毕，并立即向军机处发出一份措词严厉的照会，宣称，他作为俄国公使，仅遵本国皇帝陛下旨意行事，因此，不管如何阻挠，他必将启程，而且并非去中国当局准予前往的恰克图，而是赴海边，以便登乘一艘俄国船只。

这份照会使中国大臣们进退维谷，对于将皇帝谕旨看作一文不值的如此疯狂的公使，他们竟全然不知所措。他们不愿收回自己的禁令，但是俄国公使的态度坚决而且顽强，因此坚持禁令又颇为危险。

他们虽然认为保持沉默是当时的较好办法，却仍然私下派遣一些下级官员来馆。他们暗示使团成员，如果公使不顾禁令，终将离京，则中国政府将不加拦阻。他们说：“不会有人强行扣留你们，然而我们同样无意给予旅途协助，对可能发生的误会亦概不负责。”

与此同时，另一些官员却相反说，清帝对公使的放肆行为极为不满，已经谕令在城门口增设警卫，禁止使团通过，不准给予马匹、

^①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1卷，第1页《俄罗斯照会》（十年四月初一，公历1860年5月21日）。——译者

车辆，只在万不得已时方准其离京，且必须经由蒙古去恰克图，而非离京赴海边。

馆舍周围出现了大量警士，他们公然力图窥探俄国人的活动情况。为了使他们有所畏惧，巴柳泽克命令护送的哥萨克当着他们的面磨军刀，上枪膛，这对中国人是颇为有效的。

在使团启程前一天，军机处仍然保持沉默。公使趁官员来馆的机会，吩咐译员向他们表示，对公使的正式公函置诸不答是何等无礼；此外，还命令口头上转告他们下列各事：1. 在阿穆尔、乌苏里江和滨海地区，俄国当局将依据我们对《璦琿条约》的理解行事，而非根据中国人的伪称妄说；2. 中国人如若中断和俄国的通商往来，即被视作对俄国宣战；3. 如果中国政府同意俄国公使的提议，他将率分舰队留在直隶湾，一旦需要，他便可在清帝和别国特使进行谈判时，向清帝提供友好的协助。

伊格那提耶夫非常耽心，英国会在僧王遭到不可避免的惨败后和中国媾和，并打算迫使中国签订一项象它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强加给瑞典的那种条约；还耽心，它会强迫中国承认，非经大不列颠同意不得向俄国作任何领土让步。因此，伊格那提耶夫决定竭尽全力，使中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即划分东段边界的问题。他撇开所有次要的问题，力求从国际法意义上看来是最无可争议的方式提出问题。他在致军机处的信中写道：“本国实非向贵国另有所求。贵大臣声言，吉林将军已有报告，深恐贵国与本国居民发生争端，故本大臣之建议，碍难允行。然本大臣决非请求贵大臣迁徙贵国居民，唯望本国移民所占之地能予确认。绥芬河上游属贵国，仅其下游属于本国。”

伊格那提耶夫为他将来返回北京创造条件，他继续写道：“贵大臣显然并不理解，俄国能给贵国以何种利益。本国诚愿协助贵国和外国人讲和，并望使贵国免受外国人之苛求，然本国对待贵国

至诚之意，贵国竟全然未予珍视。”

伊格那提耶夫一面料理行前的未了事宜，同时给亚洲司司长写信说：“我将于明晨离京……情况可能是：或者我们只好认为边界问题已由实际上的土地占领而获解决，对我迫使军机处所作的认可（承认清帝批准过新的领土让步，但由于害怕引起纷争，不能加以重申），表示满意；或者由于必须用边界示威来支持我们的要求，但考虑到欧洲各国代表在会场会使问题的解决增添许多麻烦，因而在今后等候更为有利的时机来恢复谈判。”

同日，公使告知科尔萨科夫将军，关于我们根据《璦琿条约》占领满洲滨海地区一事，业已知照中国政府。公使建议他前往璦琿，以便和吉林将军签订关于边界问题的最后约定。

伊格那提耶夫交给大司祭固礼一份详细的指令，指示他在公使离去后应如何行事。

他写道：“我此次离京后是否仍返此间，现尚不能确定，这将完全取决于天津谈判的结果和中国政府的作法。值此分别之际，我认为有义务对您相告数语，说明我即将采取的行动，和您为实现我们的共同使命所能参与其事的程度。外交部希望，我能以调停人的身份，用有益的劝导和解释促使达到我们的目的。我的意图是坚持向中国政府提出的那些要求，您是知道的。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则是尽快结束边界问题并交换边界地图，我也提请您特别注意此事。中国政府应当懂得，当中国和欧洲列强进行谈判时，由俄国充当顾问，定能大大减轻清王朝即将遇到的厄运，而我在别国代表抵达北京后返京，可能对它会大有好处。

“总之，我最诚恳地请您注意下列各点：1. 密切注视与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列强有关的一切情况，尽量搜集关于时局的情报；2. 向中国人说明，俄国无意利用中华帝国的困境，恰恰相反，俄国完全保持中立地位，竭力防止欧洲人对它施加影响；3. 竭力传播对我们

有利的传闻和消息，并尽可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解释；4. 尽可能经常向彼得堡、东西伯利亚总督和我（送往北塘或分舰队）发送有关时局的报告。如遇重要情况，可借口有俄国来的公文需要送交，从教会中派一人来向我报告；5. 请将我托您送往彼得堡的邮件速速发出；6. 如若中国政府要求教会离开北京，您可以宣称，由于没有我的相应指令，您不能擅自执行这一要求，并且无论如何您要清帝对此事发出谕旨。”

XI

启程的时刻临近了。即将出发的这行人对所面临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使大家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加之近日又传来了令人揪心的消息，仿佛城防士兵已奉有命令，不准俄国人出城，将他们在城墙边予以扣留，而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使团的轿子来到内外城门之间时将城门一关即可办到。果真如此，公使就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为了不致陷入窘境，他们采取了一项预防措施，即将准备装运使团行李的两辆大车的后轴锯断，然后再用活销将其连接起来，因此，只要一拔活销，后轴就会塌落下来，大车顷刻间就动弹不得了。

行动的计划是这样的：让两辆大车一前一后地行驶，当前一辆车已抵外城门口时，后一辆车尚在城内门口，此时，两辆车的驭者同时拉动活销，用活销连接的被锯断的后轴就塌落下来，大车便不能行动，堵在城门口，使城防士兵不能关上城门，而使团的轿子则乘此时机溜出城门。出城的地点本来定在离南馆最近的城门，但在启程前几天，他们却故意在中国籍的仆役中散布说，使团将通过离该馆远得多的另一处城门出城，而中国人正是在那里等着使团。在预定的日期和时刻，5月16日上午8时，使团从南馆出发。使团迅速走过南馆与城门之间的这段路程，便让经过改装的两辆大

车走在前面。大车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两辆车在城防士兵中制造了不少混乱；使团的轿子则乘机在随员和骑兵卫队的簇拥下扬长而去。但这里还设了一个计谋——轿子是空的。公使从使团的一个成员佩休罗夫那里牵过一匹马，由一名担任护卫的哥萨克人伴随，骑马走在前面，顺利地通过城门，而未被中国人发觉，只是到了郊外很远的地方才停住。

中国人既然错过了在城门口扣留公使的良机（假设他们是打算这样做的），也就不敢在城外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而只是派了几个警士从远处注视俄国人的举动。在第一个投宿处，由军机处派出的两名清廷官员骑马赶来进行解释。他们向接待他们的塔塔里诺夫宣称，军机处责令他们竭尽全力说服俄国公使返回京城。他们说，没有答复伊格那提耶夫的公函是由于一项不愉快的误会所造成的，他们对此表示歉意，并再三要他相信，如果公使要有要事相告，大臣们一定会立即去俄罗斯馆。官员们竭力以旅途中可能遇到的险阻恐吓使团，他们说，政府为减少旅途阻碍而采取的措施尚未布置就绪，最后他们将大臣们诚惶诚恐的状况一一加以陈述，说没有一位大臣敢将俄国代表擅自离京一事向清帝禀奏。

所有这些理由当然丝毫不能说服伊格那提耶夫。他仍通过塔塔里诺夫转告这些官员说，旅途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吓不倒他的任何一个随员，使团本身能够保卫自己的安全。

从北京去海边需走一百二十俄里左右。为了按照中国人极为重视的礼节行事，同时也为了向中国人表示，使团决非逃离北京，而是镇静如常地前往应去的地方，所以公使一路上都是坐轿的。旅途中平安无事。但当他们到达离天津九俄里许的地方时，他们认为改走岔道更为适当，这样可以避免和城里仇视欧洲人的百姓们、驻军大本营以及显要的清廷大臣们相遇，因为他们是会随便找个借口将使团强行扣留的。从离海尚有二十俄里处开始，沿途都

有土筑的工事、设防的阵地，以及为了打退日益逼近的联军的进攻而集合在这里数以万计的蒙古骑兵的马群。

使团离北京越远，中国人就越显得殷勤恭敬。好奇的百姓成群地来到路旁，观看俄国大人一行。

地方官员则认为尽迎送之礼是自己的职责。在最后一程中，有一位职位较高的地方官在祝公使旅途平安时，竟为公使离开中国而表示伤感。伊格那提耶夫知道，对该官员所说的一切日后军机处定会知悉，遂乘此机会表示遗憾说，由于大臣肃顺的作法，使他未能如愿地为处境如此艰难的中国政府出力。他说，对外国公使的照会置之不理，象那个没有教养的满臣（他的行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对待他那样对待外国代表，这都是从未遇见过的。伊格那提耶夫所以要指控肃顺，其目的是力图动摇军机处对他的信任，并将他说成是谈判受挫的唯一罪魁，指望将来谈判恢复时，能由一名较为随和谦让的大臣来代替肃顺。临近海边时，伊格那提耶夫预先派人将自己抵达的时间、随行人数和行李重量通知了利哈契夫。因此，当使团到达岸边时，就受到由利哈契夫派来迎接他们的他的部下、海军大尉穆辛—普什金的欢迎。下午三时，利哈契夫本人来到了。公使当即同他乘上“亚波涅次号”运输船，该船和“德日基特号”三桅快船一起停泊在离岸八海里处。

伊格那提耶夫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尽快赶赴上海，等待即将前往该地的联军；首先和英、法两国派遣的全权特使会晤，了解他们的意向，然后见机行事。

临行前，公使在致军机处的最后一份公函中，要求将所有致俄国公使的书信转往北塘。为了使北京政府相信，俄国公使并非依赖于联军，而是独立行事的，伊格那提耶夫通知说，他不久即将率分舰队返航，来听取他在离开北京前致军机处的最后两份公文的答复。

第二章

I

形势迫使公使应尽快去上海，每一天的迟误都会有很大关系；公使在日益迫近的军事行动尚未开始时，亟须与其它各国使节取得联系。

公使连一小时也不愿虚掷。为了这次转移，他放弃了“亚波涅次号”运输船而改乘享有健行者声誉的“德日基特号”。但是，真可惜！这一次“德日基特号”三桅快船竟辜负了对它的期望。

船上全部存煤只够用八个小时了，而且还必须节省，以备万一。由于存煤不足，“德日基特号”不得不扬帆而行，可是这一次却很不得力。开始时风力尚可，一出海便很快减弱，终于逐渐变为完全风平浪静了。这样日复一日地过了一星期，而天气毫无变化的征兆，海面上依然风平浪静。当时，乘客的处境很不佳，船内拥挤不堪，而且苦于完全没有新鲜食品。到了最后几天，不得不光以面包干和脏水沏的茶当饮食。

到第八天才有微风，“德日基特号”渐渐地开动了。两天以后（船长指望在四天内完成全部航程），三桅快船终于到达了扬子江。7月1日晚，当船驶近长江口时，船长由于不知存煤是否够用，因此很难决定应否发火开机溯江而上。当时晴雨计的水银柱急剧下降，预兆不佳。风加剧了，但幸而已转为东风，于是“德日基特号”立刻扬起满帆，迅速驶过了由此至吴淞口之间的一段不大的距离。

挫折终于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完全意料不到的幸运。当“德日基特号”驶近停泊场时，船上的人们突然发现了“斯维特拉纳号”巡洋舰就在该处停泊，这使大家都很高兴。“斯维特拉纳号”巡洋舰舰长是海军大将的侍从武官、年轻而精力充沛的海军上校利哈契夫，他异常迅速地将停泊在威腊法郎加港的巡洋舰从地中海开来。巡洋舰在沿途各港口只作了最必要的短暂停留，几乎全程都开足马力，并且在这整整一千哩的航程中，还要拖曳落后的“波萨德尼克号”海防舰和“纳叶兹德尼克号”三桅快船前进，这两艘船也是预定编入利哈契夫的分舰队的。但不幸的是，这两艘船的情况如此令人失望，竟起码需要修理两个月。

“德日基特号”一下碇，伊格那提耶夫便立即登岸。刚刚兼署俄国领事职务的美国领事各理德，是一个富有而好客的人，他邀请公使住在他的寓所。公使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盛情的邀请，因为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住在他的寓所里；而同华若翰相识，会使伊格那提耶夫一开始就能较顺利地同别国使节交往。

俄美两国利益的一致，处境的相同，这必然会有力地促使他们的代表接近。在即将发生的联军同中国的战争中，两国打算严守中立，并决定只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才充当交战国之间的调停人。

俄国同美国的接近完全符合俄国外交部的预想和穆拉维约夫总督的看法。关于这一点，穆拉维约夫早在一年以前就说过：“目前，我们要在此间海域内单独行动，力量尚嫌不足。对于我们，无论谁的友谊都是十分必要的，至于同美国人接近则比与任何其它强国的友好更少危险，而且由于英国人害怕这种接近，而对我们有利。”

在同华若翰初次会晤时，伊格那提耶夫就向他指出了他在北京逗留期间的种种失策，并向他说明了他那时处境的种种危险。这

种处境是他自己造成的，由于他竟让中国人将他禁锢在寓所里，以致不能同俄国公使接触，甚至没有同俄国公使见面便离开了中国。伊格那提耶夫说：“倘若当时我同您相会，我们就可以办成许多事情。”

在各理德家中的共同生活有力地促进了伊格那提耶夫同华若翰的接近。在他们有了相当接近之后，伊格那提耶夫谈到在联军的军事行动开始后，他打算采取的政治立场的问题。

伊格那提耶夫决定通知中国政府，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俄国将同北美合众国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当他将这一决定向华若翰进行说明后，他又向华若翰提议：首先，向联军和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在对待交战各国的态度上，俄国同合众国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其次，彼此承担义务，不单独出任调停。华若翰虽然完全承认这样做对两国最为有利，可是他对自己将来的活动范围仍然避而不作正式的规定。总之，美国公使是一个不大高明的外交官。尽管他有很多长处（他是一个聪明而有学问的好人），但他完全不具备当时所必需的果断，此外，他对欧洲和中国的问题甚少兴趣，而只巴望早日归家，回到合众国。

在“德日基特号”到达上海后不久，人们便获悉，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由于他们乘坐的轮船沉没而耽搁在途中了。这种情况使伊格那提耶夫有可能同联军总司令霍普·克灵顿和蒙托班以及两国公使普鲁斯（额尔金的兄弟）和布尔布隆进一步熟识。

公使们非常矜持和冷淡地接待伊格那提耶夫。特别是普鲁斯，他无法掩饰他对俄国的仇视，他认为俄国是造成去年英国军队在大沽失败的罪魁。

急躁、傲慢、充满大不列颠式的成见和自负心理的普鲁斯，乃是一个道地的外交官，至于布尔布隆，则纯粹是一个无足轻重、平凡庸俗的官吏，他最重视自己的地位和薪金，拜倒在英国的威严之

下。为了同联军谈判，中国政府派遣全权大臣薛焕率领他属下的全体官员去上海。任命这个同英国人在 1858 年即已有亲密交往，并对俄国深怀敌意的中国人，这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极坏的后果。

这位全权大臣的任务是：1. 取消曾许传教士在京传教的权利；2. 宣布禁止领事和外国商人深入内地。如果外国人不同意这些要求，薛焕则可以完全否认《天津条约》，推说 1858 年签订条约的全权大臣们，似乎被外国人的威胁吓糊涂了，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签订了什么条约。

除英、法代表冷淡地接待伊格那提耶夫一事之外，薛焕抵达上海后不久，在上海传播着对俄国极为不利的流言，似乎俄国虽然在北京力图获得阿穆尔和滨海地区的大量领土，但经过忙碌奔走却一无所获，现在伊格那提耶夫来到上海，就是专为此事来求助于联军的。伊格那提耶夫为了结束自己的暧昧处境，并且使欧洲人确信我们与中国已无任何瓜葛，对这种有损俄国尊严的议论应该尽快予以驳斥。为此，他分别向各国公使发出了如下的通知：“值此联军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我认为有责任向阁下就俄罗斯帝国政府授命本人所采取的立场作某些说明。关于这种立场，已通过俄国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勃伦诺夫男爵与基谢列夫伯爵分别通知了圣·詹姆斯内阁和杜尔里内阁。

“当我在北京所进行的谈判结束后，我便取道北塘来到上海，以便遵照彼得堡的命令，不要远离联军进行军事行动的地点。在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中，我将作一个不介入战事的目击者，而这种身分完全是由俄国与联军和中国的关系所决定的。清政府没有破坏和我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因此，俄国对中国就只可采取观望的态度。英、法政府力求劝导清政府尊重条约，准许传教和发展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关系，而我们的上述态度与我们衷心支持英、法政府的这些打算又是完全吻合的。

“基于我奉到的指令，我当竭尽全力使事情获得和平解决，劝导中国政府履行它对英国、法国和合众国所承担的义务。当我甫达中国京城，即致力于这一既定的目标，但不幸的是，这些努力都未见成效。去年的一些事件使北京改变了观点和想法，而清廷重臣的莫名其妙的固执却有增无减。长期的经验使我们确信，欧洲列强只有在不顾他们各自情况的本来区别，而用一项共同的保证彼此结成休戚与共的关系以前，中国政府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基于这一点，我才奉命离开北京，来到上海会见联军，从而使中国政府不致将俄国遵守中立误认为是赞同它的行为。俄国代表离开中国京城，然后又同联军同时到达直隶湾，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当局目前处境的严重危险，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深思。联军给予中国军队的严重教训，终将使清政府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这项通知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它向公使们说明了俄国代表的立场，从而大大改善了伊格那提耶夫同英方，特别同法方的关系。普鲁斯和布尔布隆都答应一俟全权特使抵达上海，立即将这项通知转交他们。而华若翰则重申愿根据上述通知的精神同俄国公使采取一致行动，并答应在伊格那提耶夫动身去直隶湾后，立即前往该地。

6月15日，全权特使们终于到达了。而且，立刻就显出了他们对俄国代表的立场所持的不同态度。葛罗男爵赶忙与俄国公使相识，并以同他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明显愿望，立即拜访了他。而英国特使显然想迫使伊格那提耶夫先去看他，他由于等待伊格那提耶夫的拜访而使自己的访问拖延了几天。但是，伊格那提耶夫当然不会使他如愿。

伊格那提耶夫不愿有负于葛罗男爵，他利用同葛罗初次见面的机会，为酬答他的关注，便将自己长期以来在中国京城所得到的

印象告知他，即似乎中国人对法国人比对英国人印象好得多，他们认为，英国人是在大沽惨祸之后国内发生扰乱的唯一罪魁。

伊格那提耶夫对刚从俄国发来的关于俄国政府与法国政府之间有了明显接近的消息表示高兴，同时他向葛罗男爵表示，希望两国在东方的代表能效法此等良好的范例，在彼此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和相互信任的交往。谈话结束时，伊格那提耶夫请求葛罗男爵给他提供维护俄国利益的可能性，因为在战事爆发时，由于英国无节制的要求，这些利益很可能受到损害。葛罗特使诚然是以泛泛的言辞来回答此事，但毕竟是相当友善的。

中立国家的全权代表们来到东方，使联军受到很大程度的约束。额尔金、普鲁斯和一些法国人试图说服美国公使和葡萄牙代表(澳门总督)不要效法俄国公使去直隶湾，华若翰对此自然未予同意。葡萄牙使节则认为答应不离开上海较为明智，而伊格那提耶夫也这样劝说，伊格那提耶夫认为，葡萄牙代表既未奉有同俄国一致行动的全权，那他去直隶湾对俄国的事情未必有所裨益。葡萄牙代表之所以特别高兴地接受不离开上海的友好劝告，还因为当时伊格那提耶夫答应为葡萄牙谋取其它强国同中国缔结的同样有利的条约(这已丝毫不差地实现了)。最使联军烦恼的自然是俄国公使的到来：首先，他们不高兴他作为他们未来作战的战事目击者，此外，他们还耽心，伊格那提耶夫这样一位精通中国事务和深谙北京政府的人会干预谈判。他们估计，就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或者最迟在刚刚强行进入白河之后，就可以着手进行谈判。为了消除联军的一些疑虑，伊格那提耶夫不久就向他们宣布，自己的意图是利用作战准备中所发生的明显的迟延，以便前往日本，有可能时，去中国南方各港口进行访问，而后再去直隶湾。

伊格那提耶夫在上海逗留期间，利用与外交官和联军将士的经常会晤，及时向他们作了许多有利于俄国的劝说。伊格那提耶

夫坚决驳斥关于俄国似乎曾以武器供给在大沽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流言蜚语。他解释说，普提雅廷伯爵确实有过向中国人提供数千枪枝的打算，但是当俄国政府一知道武器将用于反对欧洲列强的联军时，马上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伊格那提耶夫仔细分析了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产生误会的原因，他解释说，虽然缔结了《天津条约》，但是大臣们按照惯例，向清帝隐瞒了条约的内容，这在办理条约批准事宜时才发现，而且有事实为证，与此事有关的大臣，花沙纳服毒自尽，而桂良两次请求辞职。他说：“为了避免发生误会，必须和清帝建立起直接联系，经常向他本人进行解释。”

伊格那提耶夫没有忘记自己的打算，排斥肃顺参加可能恢复的谈判，他力图使联军相信，肃顺是欧洲人的主要敌人之一。他说：“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人为敌的头号坏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统统赶出中国。”

“由于中国方面对欧洲人的敌对态度，俄国从未有公使常驻北京，只是在对我们的利益事关重大的时刻，才委派公使前往北京。华若翰在中国京城的遭遇乃是说明中国人的这种敌对心理的最有代表性的例证。俄国使团在京城之长时期的逗留，只有用俄国与中国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来解释。”

6月21日，美国公使离开了上海，而第二天伊格那提耶夫换乘“斯维特拉纳号”巡洋舰启航，前往长崎。同华若翰分别之前，公使终究说服了他向中国政府发出俄美联名的表示爱好和平的照会，该照会则告知中国政府，今后两国的行动将完全一致。这一任务交给了译员塔塔里诺夫去执行，为此目的，他乘坐“德日基特号”三桅快船从上海到了直隶湾。同时，塔塔里诺夫受托接受来自北京的邮件，尽可能同修士大司祭固礼取得联系，并将俄国公使返回北塘的消息预先通知中国当局。除了俄国和美国的内容完全相同的两份照会，伊格那提耶夫还发出一封致固礼神父的信和致军机

处的三件公文，他想通过这些公文将自己当前的活动同以前的谈判联系起来。在第一件公文中，他请求将从恰克图方面寄给他的信件转来。在第二件公文中，他对所得到的一项消息表示惊讶，这项消息说，似乎在上海迄今为止，不仅对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一事，而且对该条约的内容仍然一无所知，为此，他请求采取适当的措施。至于第三件公文，其内容大致如下：“我认为有责任通知军机处：我到达上海后，接到本国政府的命令，要我偕同北美合众国的全权代表迅速返回直隶湾。俄国和北美合众国愿在当前中国与英、法的纠纷中保持中立，他们准备通过自己的代表以善意的劝告帮助中国政府，甚至，如果它愿意，他们还准备采取措施求得它同各敌对国家的和解。”

离开上海之前，伊格那提耶夫为使欧洲方面送致俄国使团的邮件得以妥收无讹，作了悉心的安排。美国领事非常殷勤地答应将俄国公使动身之后到达上海的第一批邮件，用美国的炮艇送去，后来的邮件则同英、法的邮件一起送发。为了送发这些邮件，当时计划在上海、芝罘（规定为法国陆战队的集合地）和直隶湾之间开辟一条每周通航两次的正规的交通线。

II

6月25日，“斯维特拉纳号”巡洋舰来到长崎，在该港停泊四天，于7月1日同前来会合的“鲍亚林号”海防舰去北塘。除了这两艘船和三桅快船“德日基特号”、“纳叶兹德尼克号”之外，编入分舰队的还有海防舰“波萨德尼克号”（该船在长崎修理了两个月），和从阿穆尔开来同分舰队会合的一艘海防舰、两艘三桅快船。所有这些船只，除了“斯维特拉纳号”巡洋舰，都是老式构造，航速很低，机器失修，锅炉已不堪使用。这些船只用来作战虽毫无用处，

特别是同巨大、完善的联军舰队比较起来更是如此；然而他们却能起很好的示威作用，因为用于此种目的，船舰的数量比船舰的质量具有更大的意义。遗憾的是，在分舰队中，没有一艘象英国或法国炮艇那样吃水浅，适用于内河航行，便于靠岸的船只。俄国的分舰队只能停在离大沽和北塘很远的地方，这使伊格那提耶夫的外交活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7月3日，“斯维特拉纳号”在北塘的停泊场下碇，当时该处已经停有悬挂美国公使旗帜的“哈特福德号”。伊格那提耶夫在这一点上没有仿效华若翰，他决定当在礼节性问题上需要维护俄国尊严的时刻尚未到来时，决不升起自己的旗帜。

就在次日，公使前往拜访美国人。尽管这次拜访纯属私人性质，公使乘坐一艘没有旗帜的快船，也未带随员，但是，在“哈特福德号”上，美国人以应有的礼节接待了他，并在启碇时，按礼节规定鸣礼炮十七响表示致敬，“斯维特拉纳号”也立刻发出同样响数的礼炮表示答谢。

过了一天，华若翰作了回访，此后两艘船很快建立起了极为亲密的关系，两国公使互相接待、宴请，并经常彼此不拘礼节地会面。

“斯维特拉纳号”到达北塘之后，塔塔里诺夫立即就他自己的活动向公使提出了一份详细报告。

受命谈判的中国官员德(祥)(塔塔里诺夫到达直隶湾以后立刻就同他取得了联系)，将一些相当不利的消息通知了塔塔里诺夫。塔塔里诺夫转述德祥的通知说：

“俄国公使的上海之行，在此间造成了极恶劣的印象。大臣们据此认为，俄国公使不大愿意为大清政府的利益尽力。日前薛(煥)(著名的亲英派分子)接替何桂清担任了两江总督的职务，他于阴历四月末写信给我们说，联军本已决定留在上海，以便就地开始同中国政府谈判，但是俄国公使到达上海以后，这个决定便改变

了，而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决定：全力北上并企图挑起战争。德(祥)借口有清帝的谕旨，断然拒绝接受伊格那提耶夫和华若翰派人送来的联名照会。在这份俄国公使离北京后不久发出的谕旨中，清帝严格规定，在中国与英、法之间的问题了结之前，不得受理俄国人从北塘发来的任何公文。最后，他只同意将致固礼神父的信收下。”

塔塔里诺夫接着写道：“中国当局口头上很强硬，似乎已完全作好了迎击敌人的准备，但我们看到的事实上却完全相反：只要有一点外国船舰开进停泊场的风声，处境每况愈下的中国政府都会惊恐万状。

“人民开始抱怨：作为中国人的主要食粮的大米，由于英国人扣留从南方漕运来的帆船，运输大米发生了困难，使粮价日益上涨，而银价却不断下跌。人们称之为长毛的南方暴乱者，由于对清王朝不满，想乘英、法远征之机，以大股兵力向北方推进，据说出动了十五万人，以便占领北京，推翻在位的王朝，而代之以汉人的王朝。政府最怕他们，说暴乱者比英国人和法国人更可怕，对英国人和法国人也象对一切欧洲蛮夷一样，靠圆滑的手腕即可轻而易举地应付过去。而对付暴乱者则唯有使用武力才能奏效。中国当局当时结集的军队已达到五万七千人，这是相当大的力量，它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察哈尔蒙古兵	8,000 人
科尔沁盟和其它盟的军队	12,000 人
索伦兵	3,000 人
西线调来的汉军	6,000 人
当地的满汉军队	28,000 人
<hr/>	
共计	57,000 人

其中三万人驻在大沽，而驻在山海关的则为五千人。”

固礼神父接到塔塔里诺夫转来的公使的信后，在复信中写道：“理藩院断然拒绝交出今后由欧洲寄给俄国使团的邮件，说：‘贵方人员都已离去，现在邮件转交何人？或由我方再派人送往英方，唯恐贵方未必乐于照办。’这真是一批畜牲！而肃顺更是一头公山羊，现在他已是内务府大臣，有着极大的势力。”……修士大司祭继续说：“情况变得十分困难，务请大力说服英国人从速前来北京，中国现已极度虚弱。我真为京城居民的安宁耽心：郑王（步军统领）^①的多疑和他部下的愚蠢透顶的挑剔行径，很可能使蠢驴一样的中国人也难以忍耐了。不满现存秩序的人本来就很多，现在满意的人更是屈指可数。据说，暴乱者已占有南方的大部分领土并占领了三个城市：丹阳、苏州和常州。所有的居民都惊慌不已，甚至连勇敢的僧王也忧虑起来，已有十二天未和任何人说话了。对于联军，中国当局还持那种见解，即认为他们是一些坏透了的骗子手；没有公开攻打大沽，乃是由于无能，派几艘船来此则是为了搅乱中国人的视线，而本意则是攻打那些没有设防的地方。”

塔塔里诺夫送去的公文由于中国当局未予接受而被退回来了。

俄国公使耽心美国人会将中国当局拒绝接受公文一事看成是对我们不利的某种征兆，于是向他们解释说，因为与俄国译员进行商谈的中国官员德（祥），除俄方公文以外，他不具有接受其它公文的全权，所以无论是俄国的照会或是美国的照会，塔塔里诺夫都未交给他，而仅转交了公使致固礼神父的信，并将美国全权代表即将前来直隶湾一事作了口头通知。

在公使本人逗留上海期间，他同法国总司令蒙托班过从甚密，蒙托班离别时邀请公使访问驻扎在芝罘的法军大本营。伊格那提

^① 根据史籍，未见有郑王担任步军统领的记载。——译者

耶夫刚好有空，同时觉得认识一下法国将领和他们的参谋部是有益的，于是他便利用了这次邀请的机会，于7月7日乘“德日基特号”三桅快船出发前往芝罘。三桅快船顺利地完成了不大的一段航程，第二天便进入芝罘停泊场，该处停泊着法国分舰队的全部船只。“德日基特号”在法国船舰编成的两列纵队之间迅速驶过，开到了旗舰前，就在它的对面投锚。

法国人极其亲切地迎接了俄国公使。他们十分乐意让他参观了法国的炮舰、陆军的兵营，以及所有多少值得注意的一切。当天，伊格那提耶夫拜访了葛罗男爵、法国海军上将谢尼尔和额尔金勋爵。额尔金是为催促军事准备并同法国方面商定日后行动而特意来到芝罘的。如果对额尔金勋爵的充沛精力、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进取性作一公正的评价，便应当承认，他自始至终都是远征军的灵魂、领导人和毫无疑问的主要推动者。

寻遍中国海域尚未找到公使的卡兹纳科夫中尉正是在此处见到了公使。他向公使报告了关于“列尼号”不幸遇难的消息，该船从彼得堡带给伊格那提耶夫的东西全部遭到损失；幸而，总算把信件抢救出来了。

伊格那提耶夫对芝罘之行很为满意。如果在离开时不发生如此重大的不如意的事，此行确实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是成功的。

“德日基特号”十分顺利地起锚以后，便从停泊场驶出。突然，航速大大地缓慢下来，机器几乎停转了，值班室很快接到报告说，必须停船若干时间。原来，锅炉的水管漏得相当厉害，以致蒸汽不足，使机器不能运转。三桅快船总共走了不过半海里，必须在法国军队和整个分舰队的眼前再度抛锚。真是不幸之至，风也停了，张帆也不行了。外国人好奇地注视着俄国船只的调航，对它的行动感到费解，当他们终于看出三桅快船停在原处未动，便派了一位军官前来询问：是否发生了故障，他们能否帮什么忙。俄国人婉言谢

绝了他们的建议，表示可望很快能把这不大的机件故障修理好。管子修了整整一夜，到早晨仍然没有修复，当时起了一点儿顺风，这才扬帆启航。2日那天^①终于勉强赶上了“斯维特拉纳号”。

一星期以后，北塘停泊场的冷落景象立即改变了。7月17日晚，海面上已渐渐露出整片整片的槐林，而次日晨7时，海军上将何伯率领的英国船舰开到了。两小时后，额尔金勋爵所乘的舰只驶抵停泊场，晚上，海军上将谢尼尔率法国舰队抵港，法国特使葛罗男爵同谢尼尔一起到达。入夜前，在“斯维特拉纳号”周围已停满了舰队，包括一百零七艘英国船舰和三十四艘法国船舰，这些船舰以宽大的队形排成三行。次日，有一些装载登陆队的运输船来港，至此，船舰的数目已增至两百艘，场面十分壮观。联军虽有这等庞大的舰队，但这支舰队所能派出的登陆部队，相形之下，人数并不多：英国兵九千名（包括印度士兵和锡克族士兵），尚有两千名苦力，两千五百名随军人员；法国兵六千名。

联军率领数量如此可观的海军前来决战，使中国政府惶惶不可终日。中国政府觉得无法应付临近的事变，终于向俄国公使求助，据他们看来，俄国公使是采取中立态度的。

中国当局在照复中十分殷勤地告知，公使寄给“大神甫”的信已经送到，并写道：“英国两年前既经同我在天津缔约，上年复带兵船来大沽，同我接仗，并非衅由我启，而法国人当时却并未参与英国随同接仗。今天朝虽未破坏与英国或法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两国竟联合出兵，来此寻衅。

“我大皇帝宽待各国，于洋夷亦如本国之人，一视同仁，并无任何嫌隙之见。今法、英两国，如愿诚心和好，则应遵照美国之例，前来办理《天津条约》换约事宜。我大皇帝尚可以彼此多年来之亲近

^① 根据上下文，此处似应为12日。——译者

关系为念，商酌办理，不致加以拒绝。”^①

收到这件公文以后，伊格那提耶夫甚至认为无须回复。纠缠于同中国政府作这种无休止的公文往来是十分有害的，而向联军自行提议作调停人（显然中国当局希望如此）也决无成功之理，同时反会危及俄国作为中立国以及他本人作为公使和军人的声誉。与俄国公使的交涉遭到挫折以后，中国当局决定强使华若翰担任他们预定的调停人的角色，他们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美国公使欣然接受了向他提出的吁请，而后来他却因此招来很多不愉快的事。一般地说，华若翰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外交官，他对事物的本质了解不深，很轻率地让中国官员同自己拉上了关系。在此之前，中国人曾以阿谀奉承之词很快地使他心向往之，以致他本人同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就连对伊格那提耶夫也讳莫如深。中国官员们总是在运送新鲜食品的借口下（这些新鲜食品是中国人从岸上用帆船载来的）给他带来各种各样有关中国政府的动向的消息（顺便提一下，这些消息都是毫无价值的）。

整个分舰队都知道这些交往，他们目睹中国船在“哈特福德号”和港岸之间经常往来，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相反，联军却认为华若翰的所作所为是极不妥当的。他的行为激怒了两国特使，特别是额尔金勋爵。而中国人也很快证实，美国公使大大辜负了他们所寄予的希望，便终止了同他逐步建立起来的联系。

华若翰的处境后来落得十分难堪，使他无法留在北塘，只得离开，先去芝罘，而后远去上海。华若翰的离开不仅没有损及俄国的利益（象美国公使那样的盟友在场，自然不可能对俄国有好处），恰恰相反，伊格那提耶夫的有分寸的作风与华若翰的不知分寸的

^①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4卷，第13页：《给俄罗斯照复》（咸丰十年六月初四日，公历1860年7月21日）内尚有：“今贵国欲为说合，足见贵使臣美意。在天朝并无失信于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译者

行为相比,就更显得突出了,他在特使们的心目中,特别在军人们的心目中博得了极大的好评。

III

7月20日,陆战队开始登陆。一清早,士兵们乘上了舢舨,由不大的轮船、炮舰和小汽艇拖运到北塘。

联军为了进行行动前的地形侦察,这一天共有四百名法国步兵登陆。但是,这支部队并未远离海岸,除了碰到一些望风逃遁的蒙古骑兵外,什么人也没有遇到。次日,从早晨起,船舰向耸立在北塘河岸上的炮台开火。联军发了八通炮,并确信中国人已经放弃了炮台,于是船舰停止炮击,接着便开始强行登陆。这次登岸的有三千至四千人。他们立即占领了弃守的炮台,同时在炮台上庄严地升起了本国的旗帜。炮台内有十二门铜炮和二十四门木炮。当日,额尔金就来到了由联军占领的北塘。中国人没有隐藏多久,次日晨,约有五千蒙古骑兵出现在联军面前,他们勇敢地开始进攻。英、法方面出动三千人进行反击,立即投入连续射击的猛烈战斗。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没有胆怯,没有溃逃,而勇敢地用自己的土枪(极不象样的中国火绳枪)进行回击。法国人当时出动十门有来复线的阿姆斯特隆炮,也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中国人在正中(横过一条高起的道路)部署了步兵,而在两翼(低处)部署了骑兵。尽管他们的队伍遭到了巨大的伤亡,但仍未退却一步,还是顽强地用对欧洲人来说是完全无害的火力坚持着。

于是,联军首先停止了战斗。他们不愿在全部陆战队和骑兵登陆完毕以前进行决战,遂停止射击,并退回北塘。当然,中国人并没有追踪他们,并同样地撤退了,中国人大概认为是他们自己使敌方遭受了完全的失败,按中国人的想法,他们已将敌人赶向海边

去了。

由于英国特使有时有不正确的看法，所以在他同俄国公使之间很易发生误会，但是从额尔金勋爵从分队移居到岸上以后，造成误会的可能性便大为减少了。额尔金既然是一个精通东印度事务的专家，所以非常清楚，只要略微表现出一种凌驾于别国之上的优势，就会对东方人产生不可思议的魅力。因此，额尔金希望在本地人的心目中使自己和己友军的地位凌驾于俄国代表和美国代表之上，根据英国人观点，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早在上海时，伊格那提耶夫就从普鲁斯和英国的船长们那里听到一种说法，似乎额尔金和葛罗都是被赋予特殊的权能和性质的特使，而俄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只不过是普通的驻办公使，这种驻办公使的地位只能相当于普鲁斯和布尔布隆的地位（顺便提一下，中国方面对此二人均毫不重视）。

伊格那提耶夫自然不同意对他地位的这种看法，当即声明，只有在派赴清廷的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受到清帝的接见，向清帝递交了自己的全权证书，并将此事正式通知他这位俄国公使之后，方能承认他们是全权特使。在此以前，他不认为四国全权代表之间有任何差别，而如果额尔金和葛罗在主桅杆上升起自己的旗帜，他定将同样行事，并要求联军鸣放的礼炮响数，与俄国船只为向联军全权特使致敬鸣放的礼炮响数一样。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当升有额尔金的旗帜的船只驶抵北塘后，伊格那提耶夫没有上船去拜访额尔金，而是作出准备接受英国特使对他——伊格那提耶夫在芝罘的那次拜访作一次回访的样子。

礼炮响数的争执并不仅仅表现于口头的争吵，而作为这一争执的结局的则是一件很可能引起极其不良后果的极不愉快的事。情况是这样的：按照同联军的协议，一艘英国炮舰被指派为维持上海与直隶湾之间的通讯联络，该炮舰不仅应将英、法的信件，而且

还应将俄国的信件送交给分舰队。有一次，当炮舰为递送邮件驶近“斯维特拉纳号”巡洋舰时，炮舰舰长约翰·海勋爵(后来担任海军上将和海军部委员)向公使的旗帜鸣礼炮表示致敬，但不知为何只发了十三响，估计可能是为了试探一下，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礼节。“斯维特拉纳号”得到公使的允许，对此未作任何回答，这样无疑会引起英方表态。果真，过了一段时间，从约翰·海勋爵那里来了一名军官，要求就“斯维特拉纳号”默不答礼的原因作出解释。利哈契夫回答说，他困惑不解，刚才是对谁施放礼炮。如系对特使(他的旗帜升起在主桅杆上)应是十七响礼炮致敬，如系对分舰队的领队长官，则应当只放十一响礼炮，现在却多发了二响。该英国人于是离开了，并在他离开后不久，约翰·海勋爵舰长本人来到了“斯维特拉纳号”，他道了歉，并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俄方接受了道歉，于是，回礼的礼炮向英国旗帜一发接一发地放了起来。随后，炮舰便离开了，而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贬低俄国代表作用的任何尝试。

尽管登陆部队的人数不多，按联军预计三天或最多四天即可登陆完毕，但陆战队的登陆活动却持续了整整十天。

7月3日^①，陆军才向白河方向进发，就在当天，同中国人接火了。经过战斗，出现了许多很有趣的、意外的事情。如果考虑到双方的力量悬殊很大，则应承认，联军的行动是迟钝的、断续的和犹豫不决的。至于中国方面，他们的步兵又一次表现出是一支胆怯的毫不中用的部队。但是，装备很差诚然又根本不懂大规模冲锋的蒙古骑兵，据英国人的看法，却都很勇敢，而在散兵作战时也很灵活。蒙古人面对着强大的来复枪和大炮的火力，支持了很长时间之后，便向英国的炮垒冲去。他们砍杀了三门炮的部分炮手，直到英国骑兵赶来救援时，才将他们赶走。蒙古骑兵被击退后，便向

^① 应是8月1日。——译者

从正面冲来、企图堵住北去道路的那部分敌军的骑兵急驰而去。蒙古骑兵当时企图往该方向退却，其中一部分成功地从英印军队中冲杀出去，其余部分则向相反方向逸去。联军迫使蒙古骑兵逃窜以后，便占领了敌方设防的大兵营，从而取得了他们这一天的胜利。

8月2日，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占领了大沽前白河岸边的两个中国村庄，而且，法国人还控制了筑到大沽北炮台后方用来截断他们去天津的带有城堞的护墙。当蒙托班将军追击逃跑的守墙士兵时，曾企图在追击他们就突击北炮台，当然，如能得手，全部战斗恰好在法皇拿破仑第三的命名日——8月3日之前结束。但是，英国人却阻挠法国人实现这种意图，拒绝支持他们，这在法国人看来，是极不客气的行为。

当天，联军之间的冷淡态度不仅在陆地是如此，而且在海上也感觉出来了。

伊格那提耶夫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主要尽可能地改善同法国的关系，为此他决定利用目下法皇拿破仑第三的命名日这一时机来向法国人表示，他对法方经常给予他的关注是何等珍惜。他命令利哈契夫参加即将举行的海上庆祝活动，并派巴柳泽克将此决定预先告知谢尼尔海军上将。

次日，俄国船只照法国国旗的举动行事，挂起了彩旗，在主桅上升起法国国旗时，并按规定发了二十一响礼炮。早上，伊格那提耶夫同利哈契夫和随员们一起，穿着礼服，带着贺信，前来向葛罗男爵和海军上将谢尼尔表示祝贺。法国人由于他们的英国盟友对他们的国家节日十分冷淡，甚至连彩旗也未张挂，而只在第二节桅上升了旗，所以对俄国人这样的盛情尤其感到十分高兴。

额尔金勋爵和海军上将何伯只派了他们的属下持贺信前来向葛罗和谢尼尔表示祝贺，法国人认为这是十分有伤他们体面的行

为。如果不是因为法、俄之间的友好大大密切了法国人和伊格那提耶夫之间的关系，因而也突出了英国人的不友好表示，那末英国人的这种毫不关心的冷淡态度也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IV

8月8日，英、法的炮艇驶近了岸边的大沽炮台。同日，联军将一部分陆军运往白河对岸，将白河两岸均予占领，抄后路进逼要塞，从而截断了中国人的退路。

8月9日晨5时炮轰开始了。由于害怕陷入炮台的交叉火力（仍然露在水面的去年被中国人击沉的英国船舰的桅杆提醒了这一点），同时由于战线狭窄，只有八艘炮舰（四艘英国的，四艘法国的）能在近岸处从海上进行火力支援，其余的船舰只能停在那里观战。主要火力系由陆上部队从后方发出的，使中国人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晨6时左右，联军的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南端的炮台：在炮台上很快发生了强烈的爆炸——火药库被炸毁了；土块如巨柱腾空而起，落下后盖满了守卫者的身躯；炮台沉寂了。此后，全部炮火都集中于临河的工事，8时许，该处的一座火药库也被炸毁，但中国人仍继续还击。与此同时，法国人对边上的一座已半毁坏的炮台发起攻击，并很快予以占领。殊死的保卫战从清晨5时开始，约至晨9时持续近五小时，中国人开始从所有的工事上拔去自己的旗帜，插上了白色的军使旗。然后，他们派出两名官员，宣布清帝已派来全权大臣，以便与联军立即进行谈判。胜利者要求：无条件交出炮台，并准许船只和军队开往天津，以便特使们能够在十分安全的情况下在该地举行谈判。以下午3时前，作为考虑的时间。限定的时间刚过，中国方面派人来说，他们同意交出炮台，但是只求撤

出自己的驻防军。对此，联军毫不迟疑地同意了。下午6时，英方进驻南炮台，而北炮台则仍由法方占领。据霍普·克灵顿说，在炮台内发现约六百门炮，大部分是铜制的。随英方的先头部队进入炮台的还有额尔金勋爵，他从联军刚开始进攻的时候起直到发动总攻时，一直骑马走在前头。英国方面减员约为二百七十人。

炮轰开始时，伊格那提耶夫从三桅快船（就该船吃水深度尽量驶近大沽）上注视着战斗的进行，然后，当进攻开始时，他便乘汽艇驶近，并和悬挂着霍普·克灵顿海军上将旗帜的英国炮艇并排停靠。晚间，他回到三桅快船上，他决定在形势尚未彻底明朗时，一直留在那里。

次日，即8月10日，为了了解当前局势由芝罘来此的华若翰拜访了公使，同时趁返回上海之前向公使道别。他抱怨自己处境的暧昧，他竭力证明，联军所获得的决定性胜利，已使在交战国之间充当调停人的企图成为完全不可思议的事了。在离别时，俄国公使答应经常向他提供情况，这是为了使他没有任何理由再返回作战地区而起掣肘作用，这样做是必要的。

同华若翰一样，在联军胜利之后，俄国公使的暧昧处境同样没有得到改善。糟糕的是，当时上海的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消息说，似乎中国政府拒绝确认中国与俄国之间的边界图，所以划界一事迄今仍未办妥。该报不止一次地提到，俄国有夺取满洲诸海口的企图。

看来，只好期待有一天各种特别有利的情况都凑合在一起；只好指望联军和中国当局在谈判时各执己见，造成了僵局；指望远征的行动缓慢，如此等等。

此时，伊格那提耶夫的主要任务在于博得双方的重视。必须消除联军在上海接待他时所抱的成见，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必须使中国当局确信，我们是严守中立的，使他们相信我们

拯救清王朝的愿望是真诚的，使他们不得不同我们交往，然后恢复已经中断的谈判，并注意到有传闻说英方与中国当局缔结和约后，想干涉我们的事务，从而采取某种办法阻止英国方面的这一企图。

为了致力于所有这许多任务，公使完全有必要直接靠近联军，为此，首先应解决一项困难问题，即设法随联军溯白河直达天津。1858年，普提雅廷伯爵在这方面的条件比现今大为有利。他拥有一艘吃水浅的轮船“亚美利加号”，而现今该船并未编入利哈契夫的分舰队。于是，决定将“拉兹鲍伊尼克号”快艇试作此用。“拉兹鲍伊尼克号”船上凡能卸去的东西统统拆卸了下来，这样使船的吃水量达到十一英尺后，趁涨潮时将船开过沙洲。快艇好不容易地刚驶过沙洲，就又搁浅了。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言，在曲折而狭窄的白河中航行，快艇将前进得很缓慢并将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14日晚，伊格那提耶夫命令装备好汽艇“斯维特拉纳号”，以便将它开往天津。由塔塔里诺夫翻译官和巴柳泽克上尉负责执行一项任务，即乘该汽艇去天津，以领取俄国发往北京俄国使团的信件为借口同中国人取得联系，并设法请地方当局在城里离白河最近的地方拨一所合适的寓所供使团应用，在万不得已时，也可出金租用。交与的任务十分顺利地完成了。这两位旅客乘汽艇畅行无阻地于15日晚到达天津，他们很容易地同城市当局取得了联系，并在其帮助下，于离白河几步远的地方为使团租了一幢体面、宽敞的住宅。

联军逼近天津后，毫无阻碍地占领了建立在城市周围的堡垒，于是天津便落入联军手中。葛罗男爵于13日抵天津，而额尔金则于次日抵达。他们当即开始同任命谈判的中国全权大臣恒祺和直隶总督恒福进行交涉，而塔塔里诺夫在到达天津后的次日晨也向恒福接洽。总督很殷勤地接见了塔塔里诺夫，对俄国公使的即将到达表示高兴，并一反常态毫未留难地接受了发给军机处的一件公文，又毫不迟疑地交出了他那里所存的伊格那提耶夫的邮件。

塔里诺夫立即派一名基督教王教徒将该邮件面交公使（王某是俄罗斯馆的教习），并附了一封便函给公使：“当王来到天津时，总督曾委托他转恳您前来此间，认为您是能调解事情的人。”

同时，伊格那提耶夫于15日从“斯维特拉纳号”换乘了已经升火待发等候着他的“拉兹鲍伊尼克号”，下午1时，“拉兹鲍伊尼克号”快艇驶进河道。快艇小心翼翼地溯河而上，头两天相当顺利，但17日那天，河道大大变窄了，船搁浅了四次，而到晚间，当离天津总共不过五英里时，快艇深深扎入了河岸，以致迅速到达的希望立即破灭了。正在这时，巴柳泽克派来迎接的小汽艇驶近了快艇，公使为了避免再耽误一天时间，遂换乘小汽艇，很快就到达天津，住进了为使团租赁的住宅。关于“拉兹鲍伊尼克号”，果然不出所料：该船好不容易地脱离了浅滩以后，于19日才到达天津，便立即在那里靠岸，并按照公使的命令，在中桅第二、三节上升起了使节的旗帜。

伊格那提耶夫既已抵达天津，我们分舰队的任务便完成了，继续留在直隶湾已属多余。如果说，公使得以离开北京，然后体面地出现在联军舰队面前，全是“德日基特号”、“亚波涅次号”和“斯维特拉纳号”三艘船及时抵达的好处，那末，姗姗来迟的阿穆尔区舰队船只纯属徒劳无益。我们的船舰在联军舰队出现之前，尚能给中国人留下某些印象，而当在停泊场出现了二百多艘外国船舰时，那我们的三桅快船和海防舰便会象沧海一粟消失在这些船只之间，所以在停泊场上停二艘、三艘还是六艘船完全是无关重要的。这些想法促使伊格那提耶夫解散了分舰队。除了停泊在天津的“拉兹鲍伊尼克号”，决定将巡洋舰“斯维特拉纳号”和三桅快船“德日基特号”留在白河口前，将其余的船只派往长崎和我们在东方的各港口，而将海防舰派往上海，以便与美国公使取得联系。伊格那提耶夫在信中将总的局势告知华若翰，谈到他将随联军去北京的

意图，并提到联军提出的根据新协定开辟天津为商埠的建议，应该认为，美国人对于利用如此有利的市场是不会延误的。

伊格那提耶夫到达天津之后，全权大臣恒福和恒祺立即向他递了名片，并按中国人的习惯送来宴席。他们表示久已盼望同俄国公使相识，并对未能亲临俄国公使处表示歉意，因为是日他们必需出城去迎接新任命的谈判全权大臣桂良。

根据恒福和恒祺的言行，可以断言，老百姓和地方官员是愿意听取俄国人的劝告并请求俄国人出任调停，但是大臣们本人尚未从北京接到相应的指令，看来怕同俄国公使亲近。

伊格那提耶夫事先已收集了有关时局的各种消息，次日便前往拜访两国特使。他从葛罗男爵那里得知，他们意欲在补充协定签字之后立即前往北京交换 1858 年的条约。这次会见时，葛罗男爵不止一次地谈到英国人对俄中关系所持的不信任态度。他们对中国当局何以如此清楚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不解。

伊格那提耶夫指出，英国人大概忘记了有为数众多的欧洲商人住在中国，忘记了在香港、广州和上海英国人出版的报纸是一切消息的极好来源。

公使逐步认识到要过问联军同中国的事情，首先必需克服一些困难，他确信：在与葛罗男爵保持良好关系之后，与额尔金勋爵接近，这对事情的顺利进行将是非常有益的，应该指望于额尔金的，主要是他的独立自主性和首创精神。

为联军出主意和提供情报可以作为同联军接近的一种极好的方式。这样做，丝毫不损于俄国的利益，而通过提供各种有益的情报又会逐步使联军相信，他们不谙中国的风土人情，如果没有他这位俄国公使的间接协助是不行的。另一方面，促进交战国之间缔结和约时，绝不应该超越事件发展的进程。

如果交战双方得以迅速达成协议，这对俄国是极为不利的。

在几乎所有职位最高而有影响的清廷大臣对俄国人都抱有敌意的情况下，如果联军与中国的事务不待俄国方面的协助就在天津顺利结束了，那末，可以有把握地说，清政府便会彻底否认《璦琿条约》，至于对该条约的补充条文就根本不会考虑。

最后对于中国，伊格那提耶夫的任务也是完全确定了。首先必须使清政府相信，俄国对清政府是真诚友好的，只有它才能挽救中国免遭联军的毒手，因为联军的用心之狠毒绝不止于表面所能看出的这一些，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同情和他们道义上的支持，特别是，如果让郑王、肃顺以及其他一些固执己见的和不怀好意的大臣们仍象以往那样左右事态的发展，那末清王朝便会遭到不可挽回的覆灭。

这一计划的执行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俄国公使在天津的那种微妙的处境，一开始就很快地大为好转了。伊格那提耶夫与经常给他以关注的联军之间逐步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最后，还有同额尔金勋爵的私人友情，都对天津当局造成了预期的印象。此后不久，每当他们感到联军有危害之意，或者只是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时，他们总是请求俄国公使代为说情。

例如，英军总司令的大本营占用了城郊的一所庙宇：该庙的和尚立即跑到伊格那提耶夫那里请求命令英国人将马匹赶出庙去。另一次，天津商会派来了两个富商，其中之一是著名的海疆夫^①，请求伊格那提耶夫在联军面前说情，使城市免遭抢劫和破坏。公使竭力安抚代表说，他早已请求联军的部队不要占领天津，而联军已答应只带极少数供侍卫和放哨的士兵进城。当时对两位

^① 此处及本书第三章 I 所载事实均见于《张公襄理军务记略》（第 5 卷，第 11，12，13，15 页“襄办海疆”一节）。本书中提到的“海疆夫”（译音）似为该书记述的主要活动人物张绣岩。张于咸丰三年至十年间于天津襄理军务，当时人常以“夫子”称之，而本书以“海疆夫”名其姓氏，恐作者不谙句读，缘此所造成的误解。——译者

商人说明，有俄国公使在就能充分保障人民的安宁，完全可以劝他们迅速返回自己的店铺，照常营业。但在此种场合，也如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公使总是向中国人表示，他在整整一年中曾不断警告北京政府要当心它所面临的危险，总是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并且定能使中国和联军达成和解，但是，清政府不愿听从他的劝告，甚至当战事即将爆发，他率分舰队来到直隶湾时，仍拒绝由他出面进行调停。而现在，尽管公使愿意出力，但是只有在军机处追悔自己的固执态度，同时正式请求他帮忙出主意和出面调停以前，那他仍然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这一席话给中国人的印象是强烈的，次日商会派五名代表前来使团，对俄国公使所表的同情和愿为说情表示感谢，并称，他们对俄国公使的话比对联军公开发表的一切诺言都更为信赖。

顺便提一下，在同商人们进行这些谈话时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如何缺乏爱国观念：例如，这些商人对他们的统帅僧王的失败和逃离战场感到由衷高兴。他们说：“如果他能够象 1859 年那样击退联军，那末就不可能结束战争。”将自己的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商界，真心实意地愿与联军接近，这在当时是同俄国的利益不相符合的，所以公使便引导他们认清那种情况，即联军的主要目的是控制中国的贸易，攫取垄断权，并压制当地的竞争。

虽然当地的百姓和个别人士看来对俄国公使抱有好感，但政府依旧对他采取冷淡态度。当伊格那提耶夫到达天津时，即已通知军机处，并将他意欲回北京的事告知了该处，而中国政府对此却答复如下：

“二十九日军机处咨复：本月十九，礼部送来贵使臣咨文，以贵使臣欲回至北京商办事件。现已由海口抵达天津。按我方全权大臣肃、瑞，前曾与贵国使臣丕^①议定海口无事时，方可前来。而

^① 即彼罗夫斯基。——译者

贵使臣现竟向我处提出欲从速来京。今因与英、法二国换约事尚未办毕，贵使臣暂可不必进京。贵国之事，应俟英、法二国换约事毕，再行进京办理可也。”^①

伊格那提耶夫在接到该复照后不久，仍然通知军机处说，在联军去北京后几天，他即动身前往北京。

8月20日，桂良带着随从官员从北京来到天津，并于次日双方开始进行谈判。联军为此任命了两名英国人：中文秘书威妥玛和译员、前任广州委员巴夏礼，而法方则任命了法国特使的秘书巴士达伯爵和传教士兼译员马兰神甫。中国方面应参加谈判的，除了桂良和原先的恒福与恒祺，还有刚从北京来的李春寿、查保嘉顺和曾仁清。^②

桂良一开头所采取的措施即明显地看出，中国政府根本不愿俄国代表参加谈判。他一到天津，便立即向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递了名片，却完全无视在津的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徒然等候了两天，便借口给军机处的公文和给我方教会大神甫的信要转到北京，派了塔塔里诺夫去见桂良。桂良当即接待了这位翻译官，对待他十分亲热。他先是佯作不知伊格那提耶夫已到达天津，然后便请他向伊格那提耶夫代致最良好的祝愿。他抱怨自己的体弱和健忘，但是，他倒还记得俄国同中国之间的悠久友谊，并表示，现在当中国岌岌可危之时，希望俄国能予以帮助。他说，俄国公使是能够予以极大帮助的，譬如劝说联军不要向中国提出大量赔款要求，何况国内根本没有存银。塔塔里诺夫听毕全权大臣的话以后回答道，俄国一直是愿为中国出力的，但是，俄国代表迄今尚未接到清政府关于这类要求的任何公文。

^①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9卷，第14页《给俄罗斯咨复》（咸丰10年7月19日，公历1860年9月4日）。——译者

^② 后三人未找到原名，故全系译音。——译者

V

陆战队在北塘登陆后取得了种种成功，在大沽又获得了胜利，联军对中国政府基于 1858 年《天津条约》所作的让步，便感到不能满足了，于是决定向全权大臣提出下列十六条新要求：

1. 公使享有常驻北京的权利。
2. 允许欧洲人访问帝国的一切地方。
3. 开天津为商埠，并在那里驻有欧洲人自己的官员（领事）。
4. 驻在各城市的领事，享有地方当局同样的地位。
5. 规定固定的鸦片进口税。
6. 开放全部海口，自由输入各种商品。
7. 现有关税不准增加。
8. 准许各种银币流通。
9. 中国政府同外国列强达成协议，采取措施消灭海盗。
10. 禁止居民迁入欧洲人居住的地区。
11. 在欧洲人买卖不动产时，当地居民应予以协助。
12. 当地居民有责任保障欧洲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欧洲人的财物如有遗失，地方当局有责任采取措施找回失物。
14. 取消不久前添加的每担茶叶两分银子的附加税，并按原先在上海采用的征收办法课税。
15. 在会商问题时，以在广州议定的条例为依据。
16. 所有上述十五条应在十二年内保持不变。

两国特使派来进行谈判的人都是机灵而能干的，因此通常由于中国人的固执和狡猾所造成的那些困难，便大为减少了，特别是巴夏礼最为突出，他表现了不寻常的活动能力、坚定性和灵活性。

因为巴夏礼精通汉语，又运用了最坚决有效的手段，所以中国官员都很害怕他，不敢与之抗爭，只要他一有要求便照办不误。经过几天的谈判之后，他们劝说桂良接受下列补充条款：

1. 清帝对中国当局于咸丰九年在大沽向英方进攻一事表示遗憾。

2. 根据早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订立的条款，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

3. 对于作为国家代表的英国公使，无论在其进入京城时，或是驻京期间，都应给予相应的礼遇。

4. 除上述三条外，凡咸丰八年缔结的条约中所载各款应一律履行。

5. 咸丰八年对该条约所作的所有补充条款一律作废，而经清帝允准并继续有效的赔偿白银八百（万）两一项除外，其中二百（万）两付给在广州城遭受损失的欧洲商人，另六百（万）两作为军费开支。该款按下列办法支付：天津换约后两个月内偿付一百（万）两。在咸丰十年这一年，不得晚于阴历十月二十日，在广州分期偿付，每次付 333,333 两。其余的六百（万）两从海关税收中按百抽值，每半年一次，每次从税收总额中抽取 20%，从 10 月 1 日（按英历）开始。为使征收无误，在所有海关委派英国官员进行监督；全部偿清以后，两国按照预先的协议委派特别委员检查账目。

6. 从签署这些条款之日起，清帝宣布天津为各国通商口岸：英国的臣民享有在该城居住权，购置不动产权，并一般地享有在其他通商口岸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在北京换约以后，清帝即将条约本文以及六项补充条款明令晓谕全国，为此，要刻成木牌，印成告示在各通衢、要道悬挂张贴。

在 8 月 24 日向中国人宣读了协定条文之后，决定于 26 日由全权大臣们同英、法两国特使先行会晤，而于 27 日签订补充协定，

并于同日去北京。特使们打算除了随员，还带一支庞大的卫队同往。当额尔金勋爵和霍普·克灵顿就卫队的人数问题向俄国公使征求意见时(英国人打算带一千士兵)，伊格那提耶夫回答说，如果英方想对中国人表示信任而不愿有损他们的尊严，那末卫队的数量绝不应超过一百人，而英方如果对他们不信任，那末在此情况下，所带士兵当然不能少于一千人，而且必须带炮兵前往。中国当局向法方表示，他们对派二千名联军进京一事感到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认为这二千名联军士兵的在京必然会严重损害清帝的尊严，于是葛罗男爵和蒙托班便约定所带卫队不超过一百人。这一决定引起了联军之间的激烈争论和严重误会，因为英国人不愿意让步，而仍坚持自己原来的想法，带一千人，而不是带一百人前往。联军之间的关系还在谈判进行期间就开始紧张起来了。中国人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特性，这就是别人对他愈宽恕，他对别人则愈刁难，而当法方缺乏象巴夏礼这样善于保卫自己利益的得力人物时，这种特性便表现出来了。因此，中国全权大臣给葛罗男爵发了一项公文，声称法方在1858年提出的赔款要求比英方少一半，而现在，尽管法方在中国的军队和船只比他的盟国少得多，加之，法方并没有遭到象英方1859年在大沽口所遭受的那些损失，而法方所提的要求竟和他的盟国相等，中国大臣对此表示惊讶。显而易见，只有英国人才会使中国全权大臣产生这些想法，这对英方的盟友说来自然是可猜想得到的。

葛罗男爵对这件公文未予重视，而在回信时将公文一并退还了。他在信中对清政府的困难处境表示遗憾，并补充说，不幸的是，他不能更改他的指令中所规定的赔款数目，因此劝告中国当局收回公文，以免引起徒劳无益的外交函件往来。

译员、秘书同中国全权大臣的最后会见定在8月25日，而于次日则应举行隆重的签订协定的仪式。于此前一日，伊格那提耶

夫在额尔金勋爵处用餐，并度过了一个晚上。这是决定性的时刻：必须利用这最后的几小时谈妥许多对我们极为重要的问题，并且使那些符合俄国利益的观点能为英国特使所接受。俄国公使就迅速和顺利地缔结和约向额尔金表示祝贺，并使他注意到，事情的经过正如他早在上海，以及后来在直隶湾和北塘所预言过的那样。当伊格那提耶夫提到俄国对待联军的善意行为时，他着重指出了一件事，即我们从未唆使过清政府反对英国（尽管有许多机会可以这样做），我们没有离开中立的地位，但同时完全相信，如果英国处在我们的地位，那它也是会这样办的。

额尔金完全同意伊格那提耶夫的意见，并对我们如此熟悉中国及其各地区的情况表示赞许，尤其对俄国公使的作风大为赞赏。额尔金十分坦率地承认，英国人只要认为对自己有利，是不会放过一切机会将武器和火药卖给中国人的。

在进一步商讨俄国和中国的行动时，额尔金对伊格那提耶夫说，从联军在新河^①找到的中国的信件中，他了解到，中国人显然对俄方的行动极不信任，曾经打算在春季阻碍公使从北京同分舰队的联络，他们甚至打算，如果公使想从京城去海边，便将他拘留。但是，从这批中国文献资料中还可看出，后来俄国公使离京时还是充分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伊格那提耶夫乘此谈话之机，使额尔金勋爵相信，对欧洲国家的代表们来说，保持一种独立自主的地位，无需中国政府的帮助和中国官员的伴随，自己花钱旅行，这样做会体面得多和方便得多。否则那些陪同的中国官员绝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向百姓说明，他们伴送的是清帝的贡使，由于清帝宽大为怀，他们才受到官费待遇。额尔金十分感谢伊格那提耶夫的这番劝告，并说以后再不和任何一名中国官员同行了。

这种情形对俄国使团之所以有意义，在于中国人如果向联军

^① 原文为 Сэнь-Хэ。——译者

提供去北京所必需的交通工具，并以适当的礼节接送他们的使团，那末俄国人显然不会从中国当局得到这种待遇，因此便会陷于一种难堪的和与俄国尊严不相称的境地。当谈到美国人的问题时，额尔金将话题一转，谈到1858年原在英国使团担任译员的李泰国，据他说，李泰国具有这样一种特别的本领，能迫使中国人对英方提出的任何意愿都可不加思索地遵照执行。额尔金说：“普提雅廷伯爵和美国公使列卫廉由于听信了中国人对李泰国的抱怨，后来便在我面前为中国人讲情，从而对作为英国特使的我采取了一种生硬的作法。由于这一说情使我只好对中国人说，如果他们直接向我提出请求，那末他们的请求自然是会受到尊重的，但是，因为他们求助于其它国家的代表，所以英方的要求反而要比过去更严厉。”额尔金勋爵的这番话不是无意而发的，显然是为了对俄国公使意欲为英、中两国的事务进行不论怎样的调停，予以打击。

接着，额尔金将话题转到欧洲人在中国的总政策，其间他曾几次表示了一种设想，即在亚洲，将来俄方与英方的联合行动可能比英、法双方的行动更能齐心协力，因为法国人对于如何对付亚洲人是一无所知的。额尔金总是认为促使法国人干涉东方政治的动因是不够充分的，同时提到他最近致巴麦尊勋爵的信，顺便谈到他对法国为在中国传布天主教而如此奔忙，曾向巴麦尊勋爵表示了自己的惊讶。他补充说：“我个人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促使法国人在国外传布天主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从事宗教事业的需要，而在本国又完全不需要他们这样作。”

对额尔金所述关于在亚洲政策中英国自然应与俄国齐心协力地行动这一意见，伊格那提耶夫表示支持，并试图以下述方式加以证明。他说：“在东方，对于我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利害关系，而这是主要的。英国几乎一心只顾自己的商务发展。俄国对欧洲人在中国进行通商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感到高兴，自然不会对此进

行阻挠。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国界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作为中国唯一邻国的俄国是重要的，但是，对于英国或对于任何别的列强，均无任何意义，既然我们两国的利益彼此没有冲突，也就没有理由妨碍我们团结一致的行动。”

额尔金对此表示同意，然后，他就这一话题越谈越远，便向俄国公使抱怨起自己的盟军来了，并对整个军队表示不满说，军事长官的行动不够坚决，两国的军队彼此格格不入，无论是总司令之间，他们的司令部之间，或是士兵之间，都没有良好的关系。他补充说：“这两支军队本来的目的是互相厮杀而不是结成联盟；人们对于以友好协定为基础而进行的那些远征，现在全都厌倦了。”^①

在谈到当时在欧洲组织这支联合远征军的情况时，额尔金记起了拿破仑皇帝在两位特使赴中国之前同他进行的一次谈话。皇帝曾表示担忧，如果特使们不服从总司令，远征便容易拖延下去。当时他说，特使们既然都不是军人，如果他们不适时地干涉军事长官的行动，并有时表现出不够果断，那末自然就会延缓远征的进程。额尔金竭力反驳这种观点，而现在他要伊格那提耶夫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在目前的战役和 1858 年一样，他比自己的军事助手们英勇和果断得多，对于他的这些军事助手们，他几乎常常得使劲拉着他们前进。

谈到中国的财政状况时，伊格那提耶夫提到，清政府现有的存银是比较少的，例如去年，经常因各种原因而遭盗窃的北京国库，净收八百万两（一千六百万卢布），而朝廷、禁军、皇宫等等无不靠此维持。额尔金回答说，他本人一直相信中国的中央政府是贫穷的，但是要使国会确信这一点却不可能，因为几乎所有的国会议员

^① 引号中的这段文字原文系法文：sont des tinées plus tôt à se battre qu'à être alliées, tout le monde est las de ces expéditions basés sur l'entente cordiale. —译者

都完全相信，中国是一个金窖。因此，如果在这次战争中，英国从中国只得到相对来说不大的一笔赔款，那对英国倒是极有好处的，以便使在欧洲的人最终明白，同中国进行战争的代价绝不是低廉的。

不幸的是，在许多英国人中间存在着一种顽固的信念，即认为四十年代同中国的战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其他方面对英国政府都是非常有利的。在这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往往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并鼓励那些甚至在中国并无直接物质利益的国家，也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对这个国家进行远征。有的是为了使自己的军队不致无所事事，有的是要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远东，最后也有为了争得荣誉并捞到一笔赔款。

伊格那提耶夫没有忘记如果联军在中国的事务略有迁延，那对俄国倒是很有好处的，同时知道外国特使觐见清帝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于是，他在同特使进行的谈话将结束时，他劝额尔金向中国当局要求在北京受到隆重的接待，以便使中国当局对该欧洲国家的代表引起应有的尊敬，并迫使它承认女王和清帝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不是象中国当局直到现在还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低于他的，是中国的附庸。额尔金非常赞同这一见解，并表示不得到清帝的隆重接见决不罢休。

当额尔金将话题转到俄国舰队，并对利哈契夫海军上校不在场表示遗憾时，他谈到他在新加坡听到的一项传闻，即将有三十四艘俄国军用船只前来中国。他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摧毁了一支不足为害的应用风帆的黑海舰队，非但未因此而赢得丝毫胜利，反而在将来因此惹出不少麻烦，因为这就迫使俄国注意增加靠轮机发动的舰队，并不再将分舰队驻在黑海，而是驻在对英国来说更加危险的地区——太平洋上。

VI

事态开始逐渐明朗了。8月26日，翻译官塔塔里诺夫受命携带公文往见中国大臣们；伊格那提耶夫在公文中将他从天津启程的日期通知了对方。当时塔塔里诺夫既未遇到直隶总督，也未遇到桂良，于是遂将公文交给了两位较高级的中国官员，同时口头向他们声明，如果再过一天，我们教会的一名成员（俄国公使已在两星期前为他签发了通行证）尚未由北京来到此间，那末便将派遣一名军官率领卫队前往北京。这一断然的声明对中国人起了作用。中国人急忙告知说，虽然他们尚未接到正式的消息，但是他们确悉俄国的一位传教士即将从北京来此。果真在下午一时左右，早在四天前即由教会派出的波波夫来到了此间。为了不致引起人们的注意，波波夫穿了中国服装离开京城，但是当他快到天津时，两个形影不离地护送他的中国官员为了向他表示特别殷勤，建议他仍穿欧洲服装，于是他也就照办了。

波波夫随身带来了修士大司祭固礼的一封很值得重视的信。在信中固礼神甫先说了教会的状况是良好的，然后他便说到清政府对俄国仍抱不信任态度，而且根本不愿与联军修好，因此，不应指望天津谈判会有好的结局，其所以要进行谈判乃是为了一个通常的目的，即赢得时间。瑞麟和僧王（尽管已有明令将僧王降职，但他现今仍担任统帅）正在通州集结重兵，皇帝的全部重炮队已从北京调往通州；而在京城和京、津之间的道路上则布置了大量的步兵。

伊格那提耶夫知道，波波夫从京城来此一事定会为联军所获悉，同时为了利用此事向两国特使再次表明我们的坦率态度，他便于当天拜访了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向他们转述了从北京得来

的最新消息。当公使来见葛罗男爵时，正遇上他十分焦急不安。原来8月25日的前一天晚上，在同中国全权大臣会见时，恒祺向英国译员声明，在协定签字之前，必须将协定草案奏知清帝裁夺和批准。当时葛罗特使对这几个中国人是否取得了谈判的全权产生了怀疑，并觉得中国人的行为是想以一种欺骗的方式来赢得时间，于是便派巴士达伯爵带了译员往见桂良，以便澄清疑虑。这个狡猾的中国人却在派去的使者面前扮演了一出完整的传奇剧：他几次装作糊涂，推说自己有病，年事已迈，对所有提出的问题只是表示诧异，说联军居然不知道他们的基本条规，即只有奉清帝谕旨派往京外边远地方的大臣才有便宜行事之全权，如不合此种情况，则均需事先奏报皇上。在桂良作了这一解释后，他们便宣布，他是一个冒名的骗子，并声明，谈判就此终止，将立即命令联军总司令将军队开往北京。

葛罗男爵按照他的看法，对这一不大有利的转折极为不满，这显然使他很难执行本国政府的下述指令：“避免军队进入北京，勿使事情发展到推翻现王朝。”他最耽心的是，清帝会逃离北京，因为这必然会使局势更加紊乱。谈到这一点时，葛罗男爵几次向俄国公使明白表示，他希望公使利用自己对中国当局的影响，使中国当局不要失去理智。他在谈话将要结束时说道：“您要是能和我们进行公开的合作，从而对共同的事业作出贡献，那就再好不过了。”伊格那提耶夫对此回答说，他从未放过机会对中国人作相应的劝诫，但他认为，物质上的帮助是无从谈起的，因为首先，没有军队；第二，各国政府之间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而第三，俄国没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宣战。他还说，但他始终准备给予道义上的帮助，而在目前，他建议尽快进入通州，不使僧王有在这个城市设防的时间。

伊格那提耶夫往见额尔金勋爵时，正值他在作进军前的准备。

他对这种看来似乎向不利方面转化的情况非但毫无不愉快的表示，反而说，对于有机会向北京人显示一下他的出色的军队，感到很高兴，而且非常感谢中国当局，因为他们迫使他向前推进。特使补充说，阅读了最近从欧洲发来的邮件以后，我相信英国的社会思潮是过于爱好和平了。因此，在对当地局势全然无知的情况下，如果英国内阁立即给我发来正式命令，不让我率领天津的军队继续前进，并无论如何必须就地签订和约，那末，这对我来说，便毫不感到意外了。

额尔金显然欲向伊格那提耶夫表示他的至诚之意，遂将在新河发现的几份中国文件的初译稿交给他看。在关于一般欧洲事务的三、四份文件中间，有一份是军机处于3月15日发给僧王的廷寄，其中写道：“由于伊格那提耶夫所提有关吉林划界之议未获朝廷应允，致使夷酋伊格那提耶夫^①恼羞成怒，以派遣俄国兵船数艘来北塘相要挟，为此，必须采取措施，俾使彼方兵船不得驶过拦江沙。”

从另一件，即由僧王递呈军机处的公文中可以看出，根据当时已经作出的安排，凡在北京至海口之间发现的俄国人，均将被捕入狱。额尔金非常清楚，俄国公使恰恰是从这一地区通过，丝毫未失尊严，所以这些文件对额尔金并未留下多大的印象，尽管如此，不过他觉得，它们毕竟能够成为俄国政府的宣战的理由^②。伊格那提耶夫对此回答说，我们同中国有着一万俄里长的共同边界，这便使我们随时可以找到发动战争的理由，但是，俄国不找这些理由，因为它认为战争对俄国是完全不必要的。

额尔金在和公使告别时，请求他就便向蒙托班说明真实的局势，劝说他 and 法国特使必须尽快地前往通州，以便较为容易地击溃

① “夷酋伊格那提耶夫”原文系用英文“barbarian chief Ignatiew”。——译者

② “宣战的理由”原文系拉丁语“casus belli”。——译者

中国军队。他补充说：“我相信您说的话比我和英军总司令说的话对他们更有效，因为我知道，他们也象我们大家一样，对您是充分信任的。”

俄国公使以为，他同中国官员的往来信件至多只是落到肃顺手里，但阅读了额尔金提供的文件以后，他才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设想，恰恰相反，军机处全都知道他所提出的要求，至于否认《璦琿条约》和拒不接受向它提出的各种建议，原来都是有意这样作的。这一情况更坚定了伊格那提耶夫原先的一种看法：如果清政府遭到屈辱和经受震荡，甚至清政府被推翻，这都无损于俄国一丝一毫，而且事实上，任何掌握了政权的新政府，对我们都不会抱有如此强烈的成见，而会比较冷静地对待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的边界问题。公使趁陪送波波夫到天津的中国官员返回北京之便，托他们将一封密码便函带给固礼神甫。

伊格那提耶夫将最近发生的事件，谈判的中断，联军行将开赴北京，以及清帝所面临的危险，告知固礼神甫，同时请他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保全使团的文件免遭抢劫，以及劝说中国当局必须将他们的档案库迁至最安全的地方。

伊格那提耶夫觉得，波波夫从北京来到此间（正好那天谈判破裂），会引起各种对我们不利的议论，而且会见疑于两国特使，于是他建议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让他们的译员同波波夫相会，以便从他那里得到关于北京的消息，这些消息对于联军可能是有益的。联军感激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在联军从天津出发之前，美理登、德拉乌、威妥玛和巴夏礼被派到我们使团来，在那里他们同波波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此外，伊格那提耶夫同意蒙托班将军和施米次上校的请求，答应向他们出示什姆科维奇绘制的北京平面图，并让某些法国军官除了看平面图外，还让看使团由北京至北塘时所绘制的路线图。

葛罗男爵和蒙托班对俄国公使给予他们如此重要的种种帮助表示热忱的感谢。从此以后，联军经常就各种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从而使公使更便于密切注视联军军事行动的进程。为了判定俄国公使和联军之间所确立的关系如何，只须提及下列有关事实就足以说明：当联军从大沽刚一登陆，便开始了战争期间所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居民、房屋、庙宇都遭到士兵的抢劫；一些和平居民被杀害，不少妇女被奸污；就中锡克族士兵、种族庞杂的印度部队和苦力们（来自中国南方的雇工）表现得最为猖獗。

伊格那提耶夫利用自己同军事长官的良好关系，善意地警告他们要防止发生各种麻烦，甚至是危险，而这种危险在刺激了当地人民，特别是在触犯了恰好位于联军进军途中的那些有名望的庙宇时，是很容易引起的。蒙托班对伊格那提耶夫提出的警告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请求他指点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以防止联军部队进行骚扰和抢劫。伊格那提耶夫为此建议采取下列办法，即：印制一些公开张贴的保护证，证上有英、法双方总司令的签字，并载明，凡有进入门上贴有此种保护证之房屋者，立即枪决，并将这些保护证分发给位于联军进军道路上的寺院和庙宇。为了便于散发这些保护证，伊格那提耶夫向他们表示愿意进行协助。

两位总司令听到了如此中肯的主意，感到非常高兴，遂将保护证印制出来，并交给了俄国公使，而俄国公使则吩咐通过塔塔里诺夫和巴柳泽克将这些保护证分发给曾要求俄国使团保护以免联军侵害的那些寺院和有影响的中国人。

由俄国公使分发保护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这件事情，对本地人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百姓很快就议论起来：俄国人大概比联军更有力量，只要看贴在房屋和寺院门上的俄国人的保护证对他们所起的多么神奇的作用，就容易确信不疑了，如此等等。

VII

中国当局为拖延时间和遏止敌人进攻而采取的这一计谋，看来似乎颇为得手，其实，联军的打算并未因此受到丝毫破坏，对事情的总的进程也毫无影响。不管英方主观愿望如何，但是在奈皮尔的第二总队的最后梯队到达以前，即使想进军也不可能，而该梯队直到谈判中断的前一日才到达大沽。

此时已决定，英军先头部队（由密契尔将军的步兵师，一个龙骑兵团和一个锡克族骑兵团组成，共计约四千人）将于 27 日晚沿前往通州的道路出发，次日有三千法军部队随后进发。全部粮秣和军需物资均须取道白河水路运输，为此，谢尼尔海军上将在谈判中断后，立即将他所统辖的木划全部由天津开往白河上游。在联军出发的当天，双方军队之间发生了一件十分妄诞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英、法两方之间的关系。

为了装载辎重行李需要运输工具，英、法使团曾要求地方当局向他们提供马车和脚夫，而地方当局也已按照必需的数量拨给。但在出发前的最后时刻，英方忽然发觉，拨给他们的马车辆数不敷应用，于是他们未经多少考虑，便命令从拨给葛罗男爵的那批马车中扣下十三辆，这是一种极为无赖的作法。法国特使亲自处理了这件事，为了避免发生争吵，他不许索还这些马车，而是命令从别处另找一些车来。

从 8 月 26 日谈判中断之后，中国方面对俄国人的态度大为好转。天津的老百姓议论道，政府（大人们）未接受俄方早在争端初起时提出的帮助，这是虑事极为不周的作法。而现在巴夏礼已严厉警告大臣们，在谈判结束前不得去找俄国人出主意，否则便以造成最坏的后果相威胁。在此情况下再来谈论此事，当然是为时

已晚。

从当天傍晚起，富商、官员和其他人士通宵达旦络绎不绝地来向翻译官塔塔里诺夫请求，请他代为向联军说情，使联军部队留在天津，以免继续战争。对于所有这些请求的答复是一致的，即俄国方面已经不止一次提出出面调停的建议，但每次均遭清政府拒绝，而俄国代表无须硬要为人出力，故不打算再提这一问题。但他仍以劝告或警告的方式对他们补充说，如果大臣们仍不醒悟，如果中国政府仍不改变对俄国人的态度，那它定会灭亡，至少会使京城陷落，而联军夺得京城后，定会将它彻底破坏。

次日清晨，几名低级官吏来到使团，他们通过各种暗示表示桂良和恒福很愿意结识俄国公使，并想前来拜访。塔塔里诺夫劝他们转告中国全权大臣，如果他们愿意会见公使，请派他们的官员前来商定会见的日期和时辰。官吏们离去了，而在联军出发后次日的晌午时分，直隶总督恒福的一位幕僚前来使团求见。伊格那提耶夫表示同意并吩咐转告这位幕僚，两小时后接见总督。稍过片刻，便有一些官吏和富商来到使团，非常卑躬屈节地请求公使立即接见恒福，其所持理由是，联军业已出发，亟须派遣急使向北京飞报，而在此之前，该大臣很想先向俄国大人征询关于局势的意见。公使对此未予同意，但是过了十多分钟，总督还是在一大群随员的陪同下到达了。

公使让他在客厅等了二十分钟，当用毕午餐后，才非常随便地接见了。在寒暄之后，恒福当即坦率地提出问题，并直截了当地向伊格那提耶夫说明了自己的请求，希望俄国公使担任双方之间的调停人，劝说联军将军队暂留天津，即使暂留三天也可，如果他同意担当此任，请他将此情况书面告知桂良。他说：“那时，您为我国造福的磊落胸怀和诚挚愿望才会使大家深信不疑。”

根据总督的最初一席话便能猜想到，当时中国的全权大臣已

接到谕令，无论如何要设法使联军在天津再耽搁一些时日，其目的或者是如中国方面所保证的那样，是为了等候赋有更大权力的新的全权大臣的到任，或者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是为了使守卫北京的军队能够完成一切守城的必要准备工作。中国方面所以要将俄国公使卷入其中，看来是想在本国政府无须表示申谢的情况下，便能如愿以偿，而这种想法根本不符合伊格那提耶夫的心意。因为这样作可能会使公使同联军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完全遭到破坏，更不必说正当联军进军之际，俄国公使干预此事是如何不适宜了。

公使完全意识到必须拒绝恒福的建议，但他想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示，以免往后中国当局再也不愿意向他提出这类请求。公使听总督将全部理由说完以后，便首先问道，他为何要向他提出这类请求？他是根据清帝谕旨行事，还是完全出于他本人的动机？这个问题倒使恒福窘住了。沉默了片刻之后，他便十分坦率地承认，他并未得到清帝的任何谕令。于是俄国公使回答他说，由于俄国公使已向清政府提出过出面调停的建议，而军机处的正式答复是：请他不必操心，因此现在，如果中国当局想要俄国公使参与他们同联军的事务，必得由俄国代表一般能够与之联系的唯一机构军机处同样正式地向他提出这项请求。恒福对此表示异议说，他不仅无权将此事函告军机处，而且，由于害怕承担责任，就连他对公使的请求也不能用书面形式提出。

伊格那提耶夫说，贵方明了，由于我国皇帝陛下对贵国艰难状况的真诚同情，我早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即已向贵国大臣表示愿意出面调停，而当联军后来进军北塘时，我又再次提议，然而贵国政府仍如前次一样予以拒绝，且不接受我的劝告，诉诸了武力。尽管如此，由于我并未离开作战地区，因此于大沽失陷后便进入白河，并且颇费周折地说服了联军留驻在天津。但停止进攻并未给

贵国带来任何好处，因为你们不善了解自己的处境，所以对于如何改善处境，也就同样无所作为。当联军决定进军北京之后，我费了不少力量才说服他们不使军队越过通州，但是，我担心贵方也不会因此而受其利。如果贵大臣此次尚不醒悟，则使中国京城陷落的罪责将由贵大臣自负，而联军占领京城并予以破坏则是无庸置疑的事。贵大臣不信我的预言，然而这些预言却正丝毫不爽地全都得到应验。现在贵大臣想要我为缔结条约与联军进行斡旋，甚至为贵大臣作保，但是，既然贵大臣不久以前还那样拒绝履行俄国和贵国之间缔结的条约条款，如今我岂能办到此事。当前，宜由桂良和恒福上书军机处，于此尚为未晚之时，请我出任调停，然而，首先需要履行俄国的正当要求，唯有如此，我才同意为解决贵国与联军之间的一切事宜而进行斡旋，并使满洲皇室从其所面临的厄运中摆脱出来。

果然不出所料，恒福耍了一个司空见惯的手腕，开始肯定地说，他不能向军机处转告他们适才谈话的内容（虽然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对此次交谈的细微末节都是会知道的），然后，他再三要求公使相信，近来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了，在北京对俄国公使寄予的希望甚于任何人，因此，公使若主动出面在交战国之间进行调停，则比任何人都更为适宜。

由于此时葛罗男爵尚在城里，他不可能不知道俄国公使和中国大臣之间的这次会见。为了避免因这次会见而容易引起的议论，伊格那提耶夫在恒福离开之后，立即派了巴柳泽克去告知法国特使：直隶总督拜会了他，并请求说服联军再等三天从天津出发；公使乘机向中国大臣作了一些有利于联军的劝诫；而现在，他并非将恒福的请求作为建议来转告（他本人也认为不能接受这一建议），而是为了将这件事情的原委对葛罗男爵全部公开出来罢了。特使对伊格那提耶夫的这一行动非常满意，并请求巴柳泽克转告

公使，一俟任命进行谈判的中国大臣取得了应有的全权资格，他当即命令他的军队停止前进，如果当时还未远离天津，那末他定当立即返回。但是，此刻为了不致落在英军之后，他是非出发不可的。从巴柳泽克同葛罗男爵的谈话中不难断定，法国特使是迫不及待地希望停战，以便及早举行真正的和谈。

公使从巴柳泽克处得悉葛罗男爵的答复后，旋即派出塔塔里诺夫去见恒福并向他声称，由于俄国公使的说项，法国部队的前进速度将尽量减慢，并且一俟接到关于从北京派来新的全权大臣的通知时，他便立即暂停攻势。塔塔里诺夫告知说，至于公使本人，为使居民免遭抢劫，他打算随联军前进，他请求恒福提供必需数量的马车和脚夫供旅途使用。恒福答应了这个请求，但却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8月29日，他偷偷地回到了保定府他平时的府邸，便避而不见了。桂良也照此办理，回到了通州，但是，他避开联军，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临行前，他接到清帝的一项谕旨，其中对该两名蠢材（桂良与恒福）在天津逗留半月之久，尚未能将与欧洲人的事务办理妥善表示不满。桂良回答道，他深知自己庸碌无能，倘系罪有应得，则请求惩处，但同时又请允予指出，1858年他与之交涉者亦系此辈欧洲人，当时颇为顺利，而如今他竟不能取信于彼，实非其一人之过也。



第三章

I

8月26日,更确切地说还有30日,在俄皇陛下加冕和命名典礼的那几天内,停泊在内河及碇泊场内的所有外国船舰都按照“斯维特拉纳号”和“拉兹鲍伊尼克号”的行动,悬挂起各色彩旗,并在主桅杆上升起俄国国旗;及至中午时,停泊在大沽的所有分舰队,鸣礼炮二十一响向俄国表示庆贺。

在俄皇陛下命名日这一天,海军上将谢尼尔率海军军官数人赴伊格那提耶夫处致节日的祝贺。被成群成群的中国人当作热闹看的三桅快船“拉兹鲍伊尼克号”的全体船员及哥萨克骑兵们,列队在使团的房屋前。公使在随员和赴会的外国人的陪同下庄严地步出屋外,迎着排成列队的人们走去,向他们问好并致节日的祝贺。

各国船舰均在主桅杆上升起俄国国旗这件事*,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晨至暮,中国人聚集在河岸边来观赏那些装饰得十分漂亮的船舰;至晚,全城已在传说,俄国无疑比其它各国要强大些,因为在俄国人的节日里,其它各国人都要向俄皇陛下致敬,同时升起本国国旗和俄国国旗,而且还必须将本国国旗挂得略低一些。

* 船舰用各种彩旗装饰(或以各种彩饰花灯点缀),借以庆贺别国的节日;受到祝贺的该国国旗被悬挂在主桅杆上,而本国国旗则悬挂在其余的桅杆上。

总而言之，中国的大臣们过于愚昧，迄今为止，竟还不能看出外国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即使在俄国公使尚在北京居住的期间，对他也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恒福离开天津以后，全体官吏都步其后尘四散奔逃，于是天津城由地方官吏海疆夫^①和某些富商管理。

谢尼尔海军上将是联军留驻城内的一位较高级的将领，由于他的在场，城市秩序在表面上得到了维持，但是在城外那一边，驻扎着英海军第二总队的兵营，队长奈皮尔对于那些对联军极不友好的中国人简直毫无办法。

当时，要避免使用严峻手段几乎已不可能。在中国当局拒绝执行英方命令，未供应他们所需要的车辆、马匹时，奈皮尔于是立刻将地方官吏逮捕，并宣称，如果英军司令部所需要的大部分得不到供应，将继续予以拘留。

过了数日，在额尔金离去后，奈皮尔遣使来见伊格那提耶夫，约请他前来商讨当前的事情。从侍从武官的言语中不难理解，在这一事件中，奈皮尔是按照额尔金的主意行事的，看来，就是要他在遇到困难时，去请求伊格那提耶夫帮助解决。采取这一行动，不仅不是英国将领的本愿，而且，一般说来，也不合乎英国人的本性；因为这容易使人认为英国人与俄国人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

当海军总队队长的这位侍从武官还未离开公使的住所时，海疆夫恰好进入，开始奴颜婢膝地请求伊格那提耶夫为知府（地区长官）说情，同时还当着英国人的面央求将他开释。但是公使断然拒绝所请，推说他本人对知府的行为也甚感不满，因为他答应提供的马车至今尚未送到俄国使团。

次日，奈皮尔往访伊格那提耶夫。他一开口便抱怨中国人，据

^① 参考本书第二章IV译者注。——译者

他说，中国人罢市停业，并停止向英国人供应食品。

看来，这位海军总队长官耽心人民的骚动，他承认，他全然不知如何应付业已开始的这一混乱局面。伊格那提耶夫对此立即回答道，既然对中国人采取应有的强硬手段，并在他们犯了过失时就严加处分，那就无需怕中国人了。

再次日，伊格那提耶夫前往兵营回访奈皮尔。伊格那提耶夫有机会欣赏了印度士兵和锡克兵的壮丽的军容；这位海军总队长官就此事顺便谈到，英政府打算缩减开支昂贵的印度土著军队，而代之以中国人，他们似乎比印度士兵更有可能被训练成为优良的士兵。奈皮尔说：“我们对中国人的花费要低廉得多，主要是他们比印度土著居民更为可靠；在最近这次征讨中，建立由苦力组成武装工人分队的尝试，这是成功的。……”接着，他补充道：“我以为，我国政府对我们所取得的良好成果还是满意的。”

9月1日，公使收到军机处发来对他8月27日通知的书面答复。军机处以婉转的措辞请他不要太急于前来北京，并说，只有等到与联军签订和约以后，才有可能同意他来京。在中国人的公文中，明显地透露出不让俄国外交使团利用清政府的困难境遇的意愿，而大臣们可能仅仅是为了俄国公使不致因提前进京而遭受危险。

当然，一纸公文并不能使公使改变他前往北京的初衷；何况，他已觉察到，英国人居心要将他阻留在天津。

他们于六日晨登程。尽管现有的运输工具十分缺乏，但是使团仍得以合乎礼仪地（从中国人的意义上说）顺利安排了这次出行。一名哥萨克骑兵军官、一名译员带着两名哥萨克骑兵走在前面，其后是六名普通轿夫抬着公使乘坐的一顶绿呢官轿，官轿旁徒步跟着两名押轿的老头，同时还有使团的秘书、翻译、巴柳泽克上尉和地形测绘队的官员骑马随行；在公使的官轿之后，四名轿夫抬

着海军上校利哈契夫乘坐的一顶便轿，六名骑马的哥萨克骑兵带领一些哥萨克军士跟随其后；为这支壮观的行列殿后的是十二辆中国式大马车，载着仆役、换班的轿夫和使团的什物。

这支出行队伍是完全按照老百姓的口味和观念来安排的，而这种排场远非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过去出行时的场面所能比拟。例如，英国特使前往北京，全程均为骑马，而这在中国人看来，只符合于最起码的武官的身分；至于葛罗男爵竟安于乘坐最一般的四抬轿舆。

第一天，使团一行人以极快的速度前进了四十二俄里，并在蔡村过宿。

次日，他们一清早就出发，又通过了蔡村和河西务之间十六俄里路程，预定在河西务作不定时间的停留。河西务一半已被毁，一半为英军占领。他们由于不愿安顿在市内，于是住进了一座不大的、几乎是被洗劫过的寺庙；该寺庙完全隔离于城垣之外，紧挨着河边，因此便可与我国的海上人员沟通联系；同时随时可以得到马匹和在小船上堆得整整齐齐的各种物品。巴柳泽克上尉立即被派去寻找额尔金勋爵。他到达英国使团以后，才知道特使不在，但是秘书接待了他，并极有把握地向他说，当天晚上，特使一定回城。伊格那提耶夫决定等他回来；但是直到次日晨，额尔金仍未回城。伊格那提耶夫再派遣巴柳泽克去张家湾找寻联军的部队，并探清事态发展的情况。在张家湾，巴柳泽克搜集到不少很有意义的情报。

II

8月30日，当额尔金到达杨村，打算在该地宿营时，接到任命怡亲王和穆荫为新的全权代表的官报。清帝命令他们无论如何要

在天津使谈判获得结果。

由于中国政府已表示同意接受联军方面提出的几乎全部新提议，所以全权大臣们在和两国特使第一次会见时便允予订立条约，并且请求为了避免耽误时间，不要向通州推进，否则，据他们说，将会在百姓和军队中又引起新的疑虑和不安。两国特使对此答复道，和约只能在通州签订，并正在继续不停地前进。

次日，额尔金勋爵接到中国方面的第二件公文，文中怡亲王和穆荫对联军无视他们提出的停止进军的建议而继续推进一事，以极其粗鲁的方式表示感到惊讶，而且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要求联军撤回天津；同时，全权大臣们还通知说，只要尚未从英法特使方面获悉联军撤回天津的消息，他们自己就不从马头（距通州二十五俄里）出发；在此之前，他们也就不能出面作进一步的谈判。在公文结尾警告说，在马头前方十八俄里和距离杨村四十八俄里处的河西务城郊，驻有中国的重兵。全权大臣们的威胁当然得不到反应；当中国方面确信自己的要求不会有效时，中国人按照通常的习惯便胆怯起来，立即让步，并极其恭敬地提议联军若能停留在杨村也就行了。这个提议在联军内部引起了意见分歧。额尔金坚决主张，在占领通州以前决不开始谈判，葛罗男爵则倾向于立即恢复谈判。此时，总司令部作出了决断，认为企图占领设防坚固的通州城未必能得手。于是，便不得已重开谈判。

威妥玛和巴夏礼被派去向全权大臣递交一项对他们全部提议的书面答复，并口头转达联军方面提出的一些新要求。会晤地点在通州，在该地和中国方面进行了八小时极为激烈的会谈后，议定联军的军队停留在距张家湾五华里（约二俄里半）处；英法两国特使前来该城签订补充协定时，其所带卫队不得超过一千人；协定签订后，联军的军队立即撤回天津，而英法两国特使则径直前往北京，交换 1858 年条约的批准书。两国特使经与联军总司令部商讨

后，决定于9月5日由河西务出发，估计通过两小站的路程即可到达约定的地点。

在指定的那天清晨，巴夏礼再度被派去怡亲王和穆荫处，陪同他前往的有秘书洛奇、威妥玛、武官诺尔曼以及额尔金的卫队长（卫队由二百名锡克族骑兵组成）、陆军中尉安得森（他曾受托为使团寻觅住房和雇用交通工具）；葛罗男爵为此派遣了总秘书长巴士达伯爵和翻译官美理登男爵。联军总司令部也趁此机会派出几名司令部和军需机关的官员前往，以便观察地形和准备军需给养。在前往的其他人员中有瓦耳克上校、埃斯凯腊克·戴·劳特伯爵、德吕克神甫和《泰晤士报》社记者博尔拜。为这一行人派出一支人数可观的英、法卫队护行。在秘书们送致中国全权大臣的公文申通知说，英、法两国特使对威妥玛和巴夏礼已经口头商谈的所有条件均予同意，并通知说，部队将于9月5日开赴张家湾。同时，秘书们还必须提醒中国方面：两国特使都赋有各该国政府的委托，需亲自向清帝面交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函。

巴夏礼到达通州以后，旋即和中国的全权大臣会晤，而中国大臣立即和巴夏礼就下列三项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1. 关于两国特使打算带往北京的卫队人数问题；
2. 关于联军主力撤回天津的日期问题；
3. 关于两国特使觐见清帝的问题。

虽然中国方面逐步同意了巴夏礼提出的头两个问题的理由，但是对于必须亲自觐见清帝一事，却认为绝无考虑余地。并提出，两国特使的文书或由朝廷重臣、或由某位亲王代为转交。同时，中国方面还要求，该问题无论如何要在两国特使到达通州以前从速解决。巴夏礼当然不能承担此事，因此便以没有必要的指示为借口，建议将该问题暂予搁置。在英国人之后，法国秘书和中国全权大臣们几乎商讨了同一些问题。

次日，即9月6日，巴夏礼认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于是便于

清晨五时，偕同瓦耳克上校、洛奇和翻译官美理登赴张家湾，去迎接联军的部队，以便告知他们指定的设营地点。当这一行人通过了张家湾，在距离自己部队不远的地方，他们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清军，在该城的偏左前方摆开阵势；显然，它对临近的联军部队抱有敌对的意图。当时，巴夏礼全不考虑自身的安危，决定折返通州，以便揭穿正在发生的情况，责成中国全权大臣对可能发生的冲突承担责任，并竭力说服他们下令撤军。巴夏礼请求洛奇疾驰通过中国部队，奔向英军，以便将事态预先通知英将霍普·克灵顿，并请其暂缓发动进攻，即使推迟二小时也好，他指望在这段时间内将带回某些确凿的情报。洛奇相当快就找到了英军总司令，急忙将情况向他报告后，这时就得到命令，要他尽快返回通州，去找留在该地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于是洛奇便和新添的同伴炮兵连长布拉巴宗以及两名锡克兵（其中一名打着军使的旗帜）回马疾驰。

此时，巴夏礼和全权大臣所进行的谈判也破裂了。中国方面对他的答复是：和约尚未缔结，在英方提出的两国特使觐见清帝的问题尚未获得彻底解决以前，中国的部队便不能撤离自己的阵地。于是巴夏礼急忙去找留在通州城里的英国人，途中遇到洛奇，他们这一行共二十四人（包括锡克兵），便离开通州。这些骑士顺利地通过了张家湾，当他们到达离安全地带不过一俄里时，突然枪声大作，一队蒙古骑兵向他们拦腰冲来。当时的情势非常紧急。可以料想，如果这些英国人纵马疾驰，他们也许能从敌阵中杀开一条出路，使自己受一些轻微的损失，但是英国人轻信了他们那面军使旗的作用，全然忘记了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并非某个文明的民族，而是中国人；他们停住了，因而陷入了包围。开始时，中国人十分客气地让这些战俘去看统帅僧王，但是在途中却不知不觉地将他们分为两组，后来又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加以逮捕。

法国人受到了和英国人同样的遭遇。他们和英国人同时离开通州城，也落入了中国人手中，遭到逮捕。只有巴士达伯爵和美理登男爵得以逃脱这一共同的遭遇。天刚破晓，他们便从通州出发，因此得以在接火前半小时，顺利地通过了中国的大部队；但是，他们遇到的危险却如此严重地影响了巴士达伯爵，致使他精神受到刺激，后来竟得了精神病，而且是极恶性的，所以只得将他捆绑起来送返欧洲。

此后联军和中国方面发生的冲突，其罪责应由联军自负。怡亲王和穆荫曾不断以口头与书面警告两国特使，说他们本人虽赋有重大的全权，但对武将们却无丝毫的权力，请避免和武将发生冲突；而且还说，极细小的误会都可能造成最坏的后果，但联军丝毫不顾这些预先的警告。

联军总司令部深信，中国方面议和心切，因此便毫不怀疑地于9月6日（公历18日）晨向双方约定的野营地进发。此时，担任先头部队的英国人突然发现前方有大量的蒙古人、炮队和摆开战阵的中国步兵。先头部队立即停止前进，并派出一名军使前往中国方面，了解进行这些军事部署的原因；而把军队集中编成两个战斗纵队，并将殿后的辎重车队聚集在一起。

前任全权大臣恒祺坐轿前来接见对方派来的军使。恒祺竭力使来使相信，联军所看到的军队调动系出自误会，而现在一切将予以澄清；然后，为了防备万一就躲到他们的军队中去了。后来，英国人对此次未想到逮捕恒祺，深感惋惜，因为这对以后的谈判极有裨益，但当时还根本不知巴夏礼已被逮捕。敌人方面在这样简短的、莫名其妙的解释以后，面面相觑地停止不动，他们不知所措并等待情势的进一步发展。过了整整四小时以后，战斗突然爆发了，这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而其原因则是微不足道的。

晨10时左右，法方联合勤务部的一位官员从通州返回时，遭

到了一批蒙古骑兵的袭击(后来英国人报导说,这位法国官员和他部下的一名法国兵,当时抢夺他们遇到的一个蒙古人的一头驮载用的骡子)。当时在附近的瓦耳克上校,及时赶来救援这位法国官员,但却无计可施。这些蒙古人用强力夺下他的马刀,一刀便砍下了法国人的脑袋,而瓦耳克本人则得以冲出敌阵,疾驰而去。中国的炮队向他开火追击,共赏了他四枚炮弹。

率部驻扎在通向马头道路左侧的蒙托班听到枪炮声后,派人询问驻扎在道路偏右的克灵顿:是不是他在开火?而他本人则立即调动部队准备投入战斗;而且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未及等候答复,便发出进攻信号,下令“前进”,于是,当瓦耳克前来解释射击的起因时,为时已晚。法国人绕过了中国的左翼阵地,向它直逼,其右翼逼向运河,而后卫则逼向白河,并以军事上惯用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最近的军队(他们当时被快速进攻和出其不意的迂回策略弄糊涂了)发起攻击。英国人看到法国人行动了,便仿效他们,摆开阵势,从正面向蒙古人发起攻击。遭到联军最初一次进攻的是一支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的蒙古骑兵队,他们立即退向右翼阵地,并将原先巧妙地加以伪装的七十八尊炮一齐发射。僧王模仿欧洲的野战炮队,将他们的全部小炮(其中一部分系木制,另用铁箍加固)安装在两轮中国式的骡马大车上。僧王的阵地选得相当好,它挡住了通向北京的所有道路,绵延二至三俄里,其左翼以白河为险阻,其右翼以张家湾城为屏障;但是它的主要优越性还在于背负运河,这就大大增加了本国军队逃跑(这是极有可能的)的困难。在中国人的阵地正面,有一条高出地面的沙土道路,炮兵队就直接隐蔽在它的后面。看来,僧王的计划就是先用这支炮兵以及处于左翼和中央的步兵的火力箝制住联军,然后由蒙古骑兵组成的右翼转入进攻,迫使敌人退向白河。但是,这位中国统帅的所有这一切盘算都被法军的快速进攻和出其不意的行动粉碎了。

法军从左翼沿着阵地进攻，并调集他们的全部炮队进行纵射，于是粉碎了敌军，虏获了全部大炮，并将工事一一予以占领。法军为了虚张声势，故意拉长了连队之间的距离，并把他们的所有军队开上了第一线，既不设第二线，也不留后备队。幸而高粱(含糖的稷属植物)挡住了中国人的视线，使他们未能辨出在这一小群法国步兵之间有这样大的距离，而中国人还以为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支强大的兵力。大批的中国人在遭到袭击时，特别在逃越运河时丧命。英军赶到时远比法军为晚，但是他们却使中国方面的大部队全军溃逃而遭致失败。联军损失极微：死一人，伤十八人；如果战斗持续下去(法军炮兵每门炮平均发炮三十八发)，伤亡可能要比这大得多。胜利者当即就地宿营。法军驻扎在运河旁的战场上。英军一部分驻在张家湾城郊，一部分驻在张家湾城里，同时将大本营也迁到城里。

次日，额尔金勋爵来到，并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经过短时间的会商，决定首先派威妥玛率领一队英国骑兵前往通州，努力打听失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下落。这支队伍携带的军使旗也和上次一样，并未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中国方面对此毫不理会，而当威妥玛接近通州上游地方的中国营地时，他们便向他开火。威妥玛好不容易终于使城市行政长官来到城门口和他会见。威妥玛便向他转达说，联军司令部要求立即释放由于他们背信弃义而被抓去的俘虏，同时应允，如果居民不加抵抗，对该城将予以宽容。但是，这项保证仍然无济于事。城市行政长官回答说，城内并无俘虏，而且解释说，昨日在城内的英、法两国人员，早在战斗爆发前即离此前往作战地点，此后，并无一人回来。次日，英军再次侦察，这次侦察查明，全部被俘的欧洲人已被解往北京。这一消息使额尔金极为伤心；在此次被俘的同胞中，有他此刻最需要的一些人，例如他失去了洛奇这样一名管理他的私人事务和总务的忠

实秘书。而巴夏礼，他是一名最有活动能力、精力最充沛的助手，在和中国人办交涉时是不可缺少的，而中国人对他则畏之若火。此外，额尔金还担心这项消息必然会在英国造成恶劣的影响。

中国人在9月6日所遭到的惨重失败，对中国政府完全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它惯有的那种狂妄自大，在阴历八月初五（即1860年9月6日〔应为俄历9月7日——译者〕）清帝发出的一项极其典型的上谕中，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该上谕的内容如下：

“朕抚驭寰海，一视同仁。外洋诸国，互市通商，原所不禁。英吉利、佛兰西与中国和好有年，久无嫌隙。咸丰七年冬间，在广东遽启兵端，闯入我城池，袭掠我官吏。朕犹以为总督叶名琛，刚愎自用，召衅有由，未即兴问罪之师也。八年间夷酋额尔金等，赴愬天津。当谕总督谭廷襄，前往查办。该夷乃乘我不备，攻踞炮台，直抵津门。朕恐荼毒生灵，不与深较，爰命大学士桂良等，往与面议，息事罢兵。因所请条约，多有要挟，复令桂良等，驰往上海，商定税则，再将所立条约，讲求明允，以为信据。詎夷酋普鲁斯，桀骜不驯，复于八年，驾驶兵船，直抵大沽，毁我防具，经统兵大臣僧格林沁，痛加轰剿，始行退去。此由该夷自取，并非中国失信，天下所共知也。本年额尔金、葛罗等复来海口。我中国不为已甚，准令由北塘登岸，赴京换约。不意该夷等，包藏祸心，夹带炮车马步各队，抄我大沽炮台后路。我兵撤退后，复至天津。因思桂良等系前年在京原议之人，又令驰往，与之理论。犹冀该夷等，稍知礼义，但使所求尚可允准，亦必予以优容。岂意额尔金等，肆意要求，竟欲婪索兵费，强增口岸，陈兵拥众，入我郊畿，凶狡情形，至于斯极。爰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前往再三开导，并命将所请各条，妥为商办。逆夷犹敢逞凶，带领夷兵，逼近通州，称欲带兵入见。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现已严飭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

飭困练，阻截路途。无论员弁兵民人等，如有能斩黑夷首一级者，赏银五十两。有能斩白夷首一级者，赏银一百两。有能擒斩著名夷酋一人者，赏银五百两。有人焚夺夷船一只者，赏银五千两。所得资财，全行充赏。天津百姓，素称义勇，务各敌忾同仇，明攻暗袭，以靖逆氛。朕非好武穷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至该夷所掳闽广等处内地人民，皆朕赤子，如能自拔来归，或斩夷首来献，朕亦必予以厚赏。至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并当谕令各海口，一律闭关，绝其贸易。其余恭顺各国，令其各安生理。经此次割切明谕，该夷倘能醒悟，悔罪输诚，所有从前通商各口，朕仍准其照常交易，以示宽大之仁。如尚执迷不悟，灭理横行，我将士民困等，惟有尽力殄除，誓必全殄丑类，共毋后悔。”^①

在“谕批”的这次战役开始后，联军总司令部决定继续进攻。当他们获悉由胜保和瑞麟统率的大批蒙古骑兵和部队驻扎在距张家湾四俄里的八里桥前方时，他们决定向对方进行袭击。但是，这项策划未能在预定之日执行。在发动的前一日，中国方面打算纵火焚烧张家湾的额尔金勋爵的住所和英军大本营的房屋，并且烧着了与之毗邻的一所房屋。因此事而被激怒的英军总司令部，下令纵容本国军队对该城进行二十四小时的洗劫。贪婪的英国人肆行掳掠、制造暴行，他们为了寻觅珍宝，往往掘地掀顶、翻箱倒柜，

^① 载《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2卷，第18页。俄译文与《始末》基本一致。其中有个别出入处，如上文“赴愬天津”，俄译文是“突然在天津附近的海岸出现”。“不与深较”俄译文是“不想和他们认真地打仗”。“复于八年”，俄译文是“复于九年”，“我中国不为已甚”，俄译文是“我们未予以特殊重视，并装着已忘记了去年的争执”。“因思桂良等系前年在京原议之人”，俄译文是“前年，桂良曾和他们进行过谈判”。“强增口岸”，俄译文是“他带兵来到海边”。“凡此大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俄译文是“不管谁人，如果处于我现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象我这样做”。而其中“桂良等系前年在京原议之人”，与事实不符，显系“在津”误刊为“在京”。——译者

或是将房屋内的一切家什尽行捣毁，并驱逐居民；因此，当限期届满时，所谓的旧城、新城均已被洗劫一空。

9月9日，八里桥畔的战役打响了。此次战役的起因是：大批密集的蒙古骑兵力图从他们借以掩蔽的树林后面向一队法国步兵和炮兵猛扑，当时后者正从距运河三俄里许的一个村庄中出发。枪炮的火力，主要还有照明弹迫使这一群阵容杂乱的骑兵不得不折回原地；而当时，他们正驰向英军，开始向其侧翼迂回，显然企图突入后方；这一行动在锡克族的骑兵团中造成极度的惶惶不安，对于皇家龙骑兵团来说，营救自己的同伙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当阻拒联军进攻的最初尝试遭到失败以后，中国方面又在八里桥前沿的墓地一带，而后又在寺庙附近重新发动攻击；但是，这两次他们都被为数不多的法军击退了。最后的、但也是十分顽强的抵抗，是在该桥桥堍一带进行的。在桥的另一端，布署了拥有二十七尊炮的一个炮兵连，同时还有从北京调来的正黄旗的满洲禁军，在此次战役中负伤的指挥官胜保也亲临阵前。八门来复式的法国大炮把中国的炮兵队摧毁了，接着步兵又以刺刀对该桥进行了扫荡。满洲人英勇搏斗，并未立即撤退，但是当法军渡过运河以后，他们便溃不成军了。一部分军队奔向北京，而大部分则向北跑回草原老家。后来，为了保卫北京和保卫通往清帝热河行宫的道路，中国将领们费了很大气力才将这支打散了的队伍重行聚集起来。胜利者攻陷了中国方面的全部阵地，鹵获了许多营帐、旗帜，其中有满洲正黄旗禁军的军旗和大量的火药（战役刚一结束，联军便立刻将这些火药销毁）。整个重炮队，共计四十八尊大炮，也即僧王的最后希望，终于落入了胜利者之手。中国军队在离京城约十八俄里处所遭到的这一惨重失败，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惊；它终于相信，如果继续固执下去便会带来危险，而且明白，再也不能对清帝和人民隐瞒这不幸的局势和胜利的洋夷业已逼近的事实。就在9月10日

战役后的次日，英、法两特使接到恭亲王，即清帝幼弟的一项照会，内称他已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以代替因与联军办理不善而被撤换的怡亲王和兵部尚书穆荫。

恭亲王立即提出缔结停战协定，并开始谈判，但英、法两特使答复他道，如果于9月6日被俘的欧洲人尚未获释，缔结停战协定的事就无从谈起。在作出上述答复的同时，额尔金通过恭亲王发给居于北京城内的所有英国臣民一项命令，要他们立即前来英军大本营。两日后，恭亲王向英、法两特使发出第二道公文，满有把握地说，丝毫无需耽心被俘人员的命运。他在文中写道，他们全都十分安全，任何一人都不会遇害；但是关于放回他们的问题，在联军的海、陆军尚未撤离天津和大沽之前，那是不可能的。在该公文中，新任全权大臣竭力申明，通州谈判所以未获结果，完全是因为英方在最后时刻提出了英、法两特使觐见清帝的如此重大问题。英、法两特使对此答复说，9月6日的战役，除僧王外，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至于被俘人员，无故将他们逮捕，纯属非法。因为被俘的欧洲人所以来到通州，第一，系得到中国全权大臣的同意；第二，系在军使旗的保护下。与作出上述答复的同时，还向恭亲王发出如下最后通牒：如果三日内被俘的英、法人员尚未获释，而恭亲王对前已交与桂良的协定文本又无画押的决心，届时联军当立即向北京推进，并将证明，英、法两国臣民是决不容许任何人破坏国际法而不受惩罚的。

III

为了避免引起通州居民的波动，联军总司令部将军队驻在城外，并允许城市行政长官紧闭城门。顺便提一下，这位城市行政长官曾宣称决不战而降。

这个勇敢的中国人是一位具有忘我精神、克尽天职的难得的楷模。在中国军队的所有长官中，只有他，还有在猛攻大沽时牺牲的僧王的助手，是对自己的国家效忠尽职的。城门一直关闭到12日，这时联军要求打开城门，以便将食物供应兵营。这位城市行政长官照办了，而且，自该日起，中国方面，每天都往城门附近的市场运送必需数量的粮食、肉类以及其它产品以供联军之用。俄国使团人员由于住在河西务之便，掌握了许多事实可以用来证实联军军纪何等败坏，大肆抢劫的恐怖达到了何种程度。从南方带来的那些原系壮工班的中国苦力，很快便学会了欧洲人的习气，而且比士兵更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俄国使团的脚夫们也突然启意效法这些苦力，但是在无特殊事故不得走出使团占用的寺庙这一禁令下，他们的企图立即遭到了阻止。

在军队发动的当日，河西务便成了一片大瓦砾场；看到起初曾以欧洲文明为名的进入这个国家的英、法联军留下的这些痕迹，令人感到憎恶。在这座荡然无存、满目疮痍，几乎是一座死城的墙垣上，东一张西一张地还遗留着联军总司令部的皇皇布告，郑重其事地宣称，此次战争只是为反对清政府而进行的，至于人民，决不给予伤害，他们可以平静地过其和平生活和照常进行买卖。这些布告恰恰成了对他们自己的谴责。马头、张家湾以及通往通州的整个途中，无处不是受到此等破坏的景象；乡村和城镇空无一人，只有饿狗还未离开这片瓦砾场，它们成群地哀号着在街头游荡。

9月2日，俄国使团迁抵张家湾。仅仅这一件事即起了安定民心的良好作用，抢劫者不再进入使团所在地的这一部分城区，许多和平的中国居民也逐渐返回老家。

次日，巴柳泽克被派往通州搜集有关最近事变的情报。他在离城不远处联军设营的地方找到了联军，他们正在等待供应军需物资和粮食的运输部队，而这些物资在最近一段时期内已消耗殆

尽。在城郊，一切都很平静，联军每天向四面八方派出一些小股部队，但是他们从未遇到一个中国兵。额尔金勋爵的军事秘书克里洛克上校骑马直抵北京城墙，在他到达偏东的城门约一百步处，仍未发现任何军事戒备；看来，全城一片平静。

遇不到敌手以及中国方面对联军的一味退让，打破了他们的全部预计。蒙托班愤懑异常，并发誓说，如果中国方面那怕杀害一名被俘的欧洲人，他定将北京城里的一切彻底摧毁。看来，他十分害怕对9月6日他提前发动进攻一事负责，因为这次进攻造成了英、法人员被俘这一损失。加之，法方总是释放中国方面的一切被俘人员，而且确实对伤员总是悉心照料，所以敌人的卑劣行为便更使他感到恼怒了。葛罗男爵怀着极大兴趣详细询问巴柳泽克有关北京的一切，城墙的高度，通常驻扎在城内的军队情况，就中也谈到清帝逃出京城的可能性。尽管发生这种事情是很自然的，但是，对此事的设想却使这位特使极度不安，而当巴柳泽克推测说，皇帝极有可能已逃出北京前往热河的山庄时，葛罗痛苦地叫嚷说：“须知，我们如此冒险地拼命冲往北京，结果倒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谈判的人了！”巴柳泽克依照事先得到的训令回答道，当然应该准备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尤其是，应当设想到所有当权者和主要官员都会步清帝后尘四散奔逃。巴柳泽克补充说，万一在京城不留一个可以管理国事的清王朝的官员，那末，法、俄、英三大国的特使则不得不彼此商定，将某个知名而又有影响的中国人推上皇位，此事是易于办到的，因为清王朝在本国人民中已不得人心。葛罗男爵对这项主意未表示任何支持，但是显然可以看出，只要有利于签订大家焦急期待的和约，他都同意。巴柳泽克和这位特使告别时，向他转达了伊格那提耶夫的一项请求，即将联军所要采取的一切行动通知俄国使团。葛罗男爵对此表示一定照办，但后来从未履行过这个诺言。

巴柳泽克辞别了葛罗男爵后，就去见住在距法军军营两俄里处的额尔金。额尔金对他十分冷淡；看来，俄国公使的来到使他极不愉快。他详细询问了有关伊格那提耶夫的情况，他今后的打算，他有多少护卫队，等等；同时，额尔金对那些不幸被俘人员的命运看来从未忘怀；突然他向巴柳泽克提出一个问题：“一旦中国当局将我们住在北京的传教士全杀害了，俄国将怎么办？”巴柳泽克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俄国想必会向中国宣战。

在霍普·克灵顿邀他进早餐时，谈到拟议中的对北京征伐，联军司令而且希望俄国使团能将京城及其四郊的地图给予一阅，而据他所知，俄国使团是有此项地图的。次日，克里洛克上校前来俄国使团，转致额尔金和霍普·克灵顿的问候，说他们都想前来探望公使并和俄国公使磋商，同时又谈到了北京的平面图*。

该平面图在天津时就向蒙托班提供过，而且当时曾对他说明，这是俄国公使对法军司令表示的特殊情谊和个人关切。后来，霍普·克灵顿打听到有这项文献，他请求蒙托班予以一阅，但这只是友军之间的一种“诚挚的谅解”^①，至于英军司令部则根本不可能从法方得到此种待遇。两天后，额尔金由霍普·克灵顿、罗伯特·奈皮尔和大批随员陪同，往访俄国公使。额尔金坦率地承认，他来此是向公使征询有关今后行动的意见，他宣布，联军原则上已决定夺取北京，至于具体作战行动已交由第二海军总队队长奈皮尔负责，奈皮尔及其助手们都认为如能获阅俄国使团保存的京城及其四郊的地图将大有裨益。伊格那提耶夫慷慨应允了将领们的要求，他不仅允许他们仔细地观看地图，而且还让他们复制了若干份。伊格那提耶夫和英国人共同研究了平面图，并向他们提了某些符合于俄方利益的建议。在说明北京四郊各地区的特点和指出

* 此项平面图系什姆科维奇在俄国使团羁留于北京的十一个月中绘制的。

① 此处原文为拉丁文：“enente cordiale”。——译者

城防最薄弱的据点时，伊格那提耶夫力图证明，首先攻其南部——即所谓中国城，较为有利。无论如何，必须把联军的注意力引离开皇城北部，在北城有我们的馆舍、清帝的冬宫^①和主要的档案库，英方一旦夺下该城，首先必定会扑向这些处所。此外，在京城西北面，有海淀的夏宫^②，其中藏有军机处有关现代部分的档案，而这更需向联军保密。在谈到关于防御手段和较好的进攻方法的意见时，伊格那提耶夫说道，战争一开始，就必须尽可能地坚决行动，而在城墙和城门既被攻克以后，他建议暂停一下，而且不要进入城内，以避免巷战；更主要的是不要放纵军队抢劫，因为那将迫使中国人走到绝望的境地。

额尔金在谈到不幸被俘人员的处境时，试图得到俄国公使的协助，要求他是否可以通过俄国教会探听有关他们命运的消息。

伊格那提耶夫认为过问此事的时机尚未成熟，便拒绝了英国特使的请求，并且向他说明，类似这样的调停现在完全不是时候。他说：“联军司令部曾威胁过，如不交出被俘人员就要捣毁北京，而今俄国代表又去为释放他们而进行说情，那末中国政府将作何想法？中国方面自然会将此事看成是联军的软弱无能，又会趾高气扬起来，就更易把事情拖延下去。”公使最后说：“如果等贵方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已为决定性攻击作好最后准备，那时由我来履行您的意愿，向中国政府进行交涉，那末其影响将会强烈得多，而效果也更会显著。”额尔金对伊格那提耶夫向他提出这一切忠告表示深切的感谢；这时他又将他以前说过的意见重复一遍，说英国人在中国将永远和俄国人采取一致行动，因为他们比谁都了解亚洲政策的真正的实际道路。

与中国方面就俘虏问题打交道无论如何是不符合俄国利益

① 即包括北海、中南海在内的当时的西苑。——译者

② 即圆明园。——译者

的；当时的中国政府尚未就范，还没有足够的低首下心，对俄国公使的调解可能不予理会，这反而会在联军心目中暴露了我方的软弱无能和同中国的令人不快的不好关系。

伊格那提耶夫在将北京地图交给英方时，并未忘记向他们指出我方馆舍的地点，并希望他们开炮轰击时，不要瞄准这些目标；不言而喻，当时英方毫不踌躇地表示允诺。英国人在俄国使团应邀进早餐后，伊格那提耶夫领着他们巡视全城，让他们亲眼一睹联军军队在城内进行令人发指的抢劫所留下的遗迹。英国人徒步走了一会，便骑马告别而去。张家湾的居民好奇地注视着来到该城的一批体面的骑马的游人，他们对所看到的一切，按自己的看法，作出各自的解释。当他们提到俄国人早在天津就禁止外国人抢劫时，便纷纷议论，正是由于避开了俄国公使的监视，这批外国人便又操起旧业来了。他们谈论俄国公使如何马上就去追赶这批外国人，而当他来到张家湾后，如何立刻就派了一个大胡子的官员巴老爷（中国人对巴柳泽克的称呼）去请英国特使，当后者来到后，伊大人（伊格那提耶夫）就军队的恶劣行径对英国特使进行了申斥，为中国人鸣不平，后来还领他巡视全城，指出抢劫的遗迹，而且看来伊大人发怒了，并感情激动地和额尔金谈话。

俄国使团利用和张家湾居民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亲善关系，获得了有关作战地区的军情的一些确切情报。例如，获悉欧洲人被拘捕一事，完全是前任全权大臣怡亲王、穆荫和清军统帅僧王所策划的。他们想在清帝面前将俘虏几名高级官员说成是一项光辉的功绩，照他们看来，这便可以抵销他们在外交上的失利，同时还能够在与联军讨价还价中取得较为有利的条件。

僧王比全权大臣们对此尤感必要。人们对战争造成的灾难怨声载道，僧王因此惴惴不安；大家责难他布署失当，使百姓白白流血，家破人亡。中国军队的屡战屡败已司空见惯，因为军士们十分

了解，他们无力阻止联军前进，在遭到大炮的一阵轰击之后便溃逃了。

9月6日，由于张家口的步兵中很多都吸食鸦片，他们身体羸弱，跟不上其它部队逃跑，因此中国军队的大量士兵被打死。在谈论到北京城内的情况时，居民都说京城城门紧闭，守城的一切必要准备均已就绪。在城内集结了旗人、京城的步兵和大量的蒙古人达六万以上。清帝本人当时还住在皇宫中，在获悉联军已从天津向通州进发时，他便决定离此前往盛京（或称沈阳，满洲的旧都）；为了使人民相信，清帝离京并非出于畏惧，而是为了他早就准备进行的秋狩，并下令沿街张设许多帐篷，借以证明京城内有足够的军队，不必畏敌；但是在出走的前夕，8月30日，各部尚书和大臣们一齐向他进谏，认为他如果放弃京城，则王朝定将覆灭。皇帝听从了大臣们的劝谏，于是留驻于城郊海甸的宫中。

9月15日，俄国使团迁离张家湾，移驻于通州城东南郊一座事先选择好的富丽堂皇的寺院内，这座寺院紧靠白河。这次迁移出于多种原因：1. 大大便利了与停泊在天津的三桅快船“拉兹鲍伊尼克号”的直接联系。2. 通州有充足的存粮，而在洗劫一空的张家湾，存粮即将告罄。3. 靠近联军，对于注视他们的行动，一般说来，对于注视当前的事变，均很方便。4. 在张家湾没有一个中国官员，而在通州则驻有中国官员，可以有理由想象，关于俄国公使来到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北京大臣们的耳内。

次日，伊格那提耶夫在四名哥萨克骑兵的伴随下前往会晤两位特使和联军总司令。他在距八里桥半俄里处、与法军军营毗邻的一座半倒塌的庙宇中找到了葛罗男爵。这位特使对近日来发生的事变感到大为苦恼，显然他不知如何办才好。在寒暄了几句以后，他立即开始对恭亲王抱怨起来，恭亲王为答复联军的最后通牒曾发出一件公文，公文的语气甚至连深知中国外交奥秘的人也

不能不感到惊讶。恭亲王皂白不分地将已经酿成的一切祸害统统归咎于他的几位前任全权大臣。他保证从他被任命进行和谈之日起，被俘人员在北京的生活将比以前大为改善，力图借此博得联军的信赖。恭亲王知道英方对巴夏礼人身安全的关心超过一切其他被俘人员，便随公文附去巴夏礼的一张名片，借以证明他还活着。

在为继续进行和谈要求确定会谈人员会晤的日期时，他主动提出愿为转交英国女王致清帝的信函效劳，并答应为此项大典安排应有的礼仪。

中国全权大臣对联军在最近一件正式公文中扬言要毁灭北京，要推翻当今王朝这些言辞进行了驳斥，并提醒说，一旦联军进攻京城，被俘人员在大乱之下很易被杀，而满洲军队也将殊死捍卫，拚到最后一人，应召而来的无限数量的蒙古人将突入联军后方，甚至将危及停泊在大沽的联军的舰队。

中国的这位全权大臣竟会在遭到如此失败后，在中国已真正处于绝望境地时，还向英、法代表发出这样的公文，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英、法两特使为了回答这一蛮不讲理的照会，于当日向恭亲王送去完全同样的信件，再次肯定，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被俘人员尚未回到联军军营，军队将立即进抵北京城下。

但是，这项严峻的最后通牒并未执行，由此便铸成了一个大错。在和亚洲人的交涉中，威胁而不执行经常导致不良的后果，而与中国人进行交涉，则后果尤为可怕。

在对当前事态进行总的分析时，葛罗谈到了一种下意识的反感，照他的看法，这种反感一直存在于英、法双方之间，并且总是不顾任何政治上的考虑，使它们的一致行动受到阻碍。

他说：“我们天生是面对面的，而不是肩并肩的，正如几年来

我们所做的那样，这是一个已经被证明了的事实。”^①

葛罗而且对中国人至今还未象他们 1858 年对待普提雅廷那样请求俄国公使出面调停一事表示惊异。根据这位特使的口气，可以推断他对于这类调停的事早已深思熟虑，而且显然他要伊格那提耶夫出面干预，希望通过他为解决有关俘虏的问题找到某种端倪。

公使看到额尔金勋爵比葛罗男爵处境更窘。他已被中国当局激怒到了顶点，但是仍须使自己炽烈的感情不致因这种耽心（即陷入绝望境地的敌人可能突然将仇恨发泄在被俘人员身上……）而失去控制。在他所想象的这些不幸的阴影背后，呈现出以英国议会、报刊和社会舆论为代表的一幅可怕景象。额尔金勋爵——这位英国贵族的高傲、自豪和彬彬有礼的残酷心肠的化身，这个对全人类抱着冷漠的蔑视态度的人——含着泪，并且带着十分沮丧的表情，谈到他失去了不可缺少的巴夏礼、忠心耿耿的洛奇和干练的《泰晤士报》记者。“其实”，他接着又以普鲁斯家族的傲慢姿态补充说：“一个英国人生下来必需懂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他应当为祖国而死，公众的福利永远应该高于个人的利益。”^②

额尔金情不自禁地以某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注意到中国全权大臣在写给他和葛罗的信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差别。葛罗男爵大概以为和亲王平等地书信来往感到十分荣幸，因此他在致恭亲王的复信中也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态度；而英国人则相反，他们的信写得很尖锐，甚至很粗鲁。这种方式上的区别却导致了完全出乎意

① 此段原文为法文：C'est un fait avéré, que nous sommes plutôt faits pour nous mettre l'un, en face de l'autre que de nous tenir l'un à côté de l'autre, comme nous le faisons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译者

② 引号内原文系法文：la première chose qu'un Anglais apprend en naissant, c'est qu'il doit mourir un jour pour sa patrie et que le bien public doit toujours prévaloir sur l'intérêt particulier. —译者

料的结果，而受损失的并不是英国人，倒是法国人。中国人的脾气总是如此：谁凶过他们或是谁有力量，他们对这样的人也就恭顺、和蔼、退让；如果在另一些情况下，当他还未认识到这种力量，而相反却看到谦逊和愿意友好的态度时，那他们就立刻会耍起无赖和变得倔强起来。

俄国公使来到通州以后，再次试图和军机处取得联系。他在告知自己业已到达，并向清政府重申了他的中立地位以后，明确提出他以前的要求，即于最短期间前去北京。

公使的公文由波波夫送致通州的城市行政长官，后者转发该项公文时规定以一天六百华里（三百俄里左右）的加急速度送到。而发送公文的速度在中国是与公文的重要性相当的，例如送发有关重大胜利的捷报这类最重要公文的速度才不过比这稍快一些。可以推想，城市行政长官对俄国官员交给他的这项文件认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俄国使团来到通州的头几天，额尔金勋爵就来找伊格那提耶夫，按他自己的说法，想就当前的事态作一次最坦率的交谈。额尔金深知关于觐见清帝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他说，他从未打算以此作为“宣战的理由”^①，所以当他早在天津和通州时，就总是嘱托他的译员们一开始就先将有关订约的所有问题办妥，然后，如有可能再提出觐见的问题，正象这位特使后来在北京决定所做的那样。他认为在万不得已时，甚至可以完全放弃亲自递交信件的要求，尤其是会见这样一位优柔寡断和软弱无能的清帝，对英国的事业不会有所裨益；当然，如果在位的是一位明哲睿智而且敢作敢为的君主，这会是大有好处的。

最近的事变，特别是巴夏礼这样一位由官方任命，在军使旗的保护下，因而是不容侵犯的人物的被俘，显然给额尔金留下了如此

^① 此处原文为拉丁文：casus belli。——译者

强烈的印象，以致在他决定是否留一位英国大臣常驻中国京城时，竟产生了犹豫。但另一方面，他认为有几位公使留驻北京，对加强正常的国际关系和避免今后发生战争却是最可靠的办法；而普鲁斯是坚决支持他这样做的。额尔金说：“我的兄弟未必同意在沒有这种条件的情况下，作为英国代表留驻北京，因为他深信，使臣留驻京城，是使事务得以妥善办理的唯一方法。”额尔金极其重视普鲁斯的意见，因为普鲁斯许多年来一直办理中国的事务，因而从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此外，在1859年的失利和对普鲁斯的纷纷责难（其中大部分均确凿有据）以后，额尔金勋爵对他更应予以支持，并在议会面前为他造成最良好的印象。

同时，还必须尊重社会舆论。这位特使耽心，这次远征中国如果不能在北京设置常驻公使，那末，英国国内会再次提出进行远征的要求，而在议会和群众中则会喧嚣起来，对于印度总督（这是额尔金长期以来朝思夕慕的想望）的问题也就更无从考虑了。

伊格那提耶夫对欧洲各国代表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未来关系作了一番考虑以后，确信在中国京城设置外国常驻使团，对俄国绝不会带来好处。俄国人所拥有的手段与别国人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英国代表住进北京后，凭借金钱、人事关系、强大的分舰队和经常受其调遣的陆战队，对各种事务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法国使臣可以利用为数众多而又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的强大势力；美国公使可以依靠美国和中国之间广泛的贸易联系；而俄国代表除了可以举出握有茶叶专卖权的少数三姓商人的利害关系外，完全无所凭藉。

以上这些想法促使伊格那提耶夫竭力阻挠在北京设立各国公使常驻代表机构。由于他了解外国人很难觐见清帝，于是竭力使额尔金相信，如果他不能受到皇帝的隆重接见，那末常驻北京的代表机构也就失去意义，而使节的尊严也将受到损害。他说：“与社

会隔绝、不受朝廷接待的欧洲各国代表，既见不了清帝，也见不了他的顾问和各部尚书，并且必须限于和那些专门指定的大臣打交道，而这些大臣直到现在还只是在官办的宾馆或庙宇中接待欧洲人，以便在人民面前把这些欧洲人看成是一些有求于清廷的人。由于了解这套诡计，所以在我居住北京时，从不到任何一个政府机关去，虽然我只有十五名哥萨克骑兵，却总是迫使全权大臣们到馆舍来找我。”公使接着说：“须知，阁下如果不能亲自见到清帝，那末英、中关系，当然还有欧洲和中国及其诸藩属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依旧未获解决，而中国人（他们还未忘记当年在这里如何很不礼貌地接待过马戛尔尼勋爵和阿姆赫斯特勋爵的外交使团，同时也未忘记阁下本人在1858年甚至连北京尚未进入）就会将阁下的新的失败说成是联军软弱无力。请阁下不要忘记，在过去来此的特使中，没有一人能稍稍具备阁下现在所拥有的如此广泛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使我们有理由对阁下比对别人寄予更大的希望。阁下向清帝呈递国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要使清帝在对其他国家君主和政府的关系上，不再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视自己为天子；要使他终于承认其他国家君主与自己是平等的，从而同意外国使节在北京享有如在世界各地那样的同等地位；要做到这一切全有赖于阁下。”

后来，当话题回到他先前曾在北京居住过这一问题时，伊格那提耶夫提醒额尔金注意这一事实，即他在和中国政府交往时，除了我们在欧洲所理解的那种基于完全平等的关系外，从不存在其它的关系。

他在结束谈话时说道：“根据我当时的处境，我可以放弃，而且确实也放弃了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但是您作为女皇的一位特使，既已提出了觐见的要求，就不能不亲递国书了。”

额尔金对所有这些无疑是合乎逻辑的理由未表示异议，但是

听完这席话以后，他承认他耽心中国人会愚弄他，例如会在外交使团已经进入清宫这样的最后时刻，宣布清帝有病，或者比这更糟，可能由某个显要的大臣代清帝来接见他，以至使整个外交使团遭到嘲笑。伊格那提耶夫竭力消除这些疑虑，并且指出，如能从原则上解决问题就很不了不起了，至于亲自觐见并无重大意义，而使中国人承认欧洲各国代表有权根据书面规定的某种仪式向清帝呈递国书，这才是必需的。在谈话结束时，伊格那提耶夫提醒道，他从经验中体会到，外国代表来北京只作短期居住才是比较有利的。俄国早就可以在北京设置一位驻办公使，但是直到现在，它总是宁愿在急需时才派遣一位全权代表去中国京城。他补充道，不言而喻，如果其他国家在北京设立常驻的公使馆，那末我们也将在该地留驻一位外交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立即就各使团之间友好协调的行动进行磋商，否则无论对于履行条约或对于外国代表在中国北部的地位，都不能认为是有保障的。在所有亚洲国家的欧洲人的使团之间一直保持着某种团结一致的精神；而在尚须使其政府习惯于正当外交关系的中国，对这种一致行动就感到更有必要了。额尔金对此也不能不表示同意。

伊格那提耶夫在英国特使一再询问如何安排进京事宜最为合适时，他根据中国人关闭城门过夜的习惯，乘机劝告额尔金派卫兵前来；额尔金答应照办。由欧洲籍的卫兵占据城门，对俄国公使本人来说，是使其能进城的必要保证。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中国人很可能毫不客气地不予放行，甚至在联军进入京城以后仍会如此。

额尔金再次感谢向他提出的各项建议，并答应一定照办。在告别时，他请求伊格那提耶夫不要将他们最近这次谈话的内容告知葛罗男爵，因为在和这位法国特使进行会商的期间尚未提到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IV

9月22日，额尔金派他的侍从，海军上校约翰·海勋爵给伊格那提耶夫送去一则消息，即联军的主力将于次日向北京推进。霍普·克灵顿也将他出发的消息通知了俄国公使，同时善意地建议，为了比较安全起见也劝他离开通州，或者和他们同行，或者径直前往紧靠北京城的额尔金的军营。伊格那提耶夫认为两项建议皆不可行，他向联军总司令表示感谢，回答说，他打算在签订和约以前一直留在通州。

根据当前事变的进程推断，尚不能很快进入北京。由于“斯维特拉纳号”必须开往上海，伊格那提耶夫于是便让利哈契夫离去，而派了一支由“拉兹鲍伊尼克号”上的水兵代替的仪仗队重返大沽。法国特使也采取了同一行动，他早就将谢尼尔上将以及由他率领的海军分舰队的水兵调离了外交使团。

俄国公使对他送往军机处的关于他打算赴京的照会的答复，已经等得急不可耐了；他委托波波夫去探听明白造成耽误的原因。波波夫见到的那位地方官毫不迟延地交给他一份兵部致司道的书面通知。兵部的通知说，俄国公使的公文已于9月17日在京收悉（因此复文应不迟于19日送到），军机处已随清帝及其内廷离开北京出走，而公文当即按应有速度追送军机处。

伊格那提耶夫获悉此事后，立即让波波夫回到地方官那里，严厉斥他竟敢将兵部通告清帝离京出走如此重要的消息隐匿不报。该司道象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人那样对此答复道：“本道书班（即司书）无知，不悉兹事体大，致令兵部文书延误日久，日后定当明察，凡属涉及使团之文书，一经本道达阅，当即送致贵使不误。”波波夫从这位司道处还获悉，除恭亲王外，北京城里已没有一个大

臣，现今一切国家事务全由恭亲王负责办理。伊格那提耶夫获悉这些重要消息后，立即将它告知葛罗男爵和额尔金。他对未能打听到有关俘虏下落的任何消息表示遗憾，同时赶紧告知他们：清帝、内廷、军机处和各部尚书在八里桥战役的第二天均已离开北京。

巴柳泽克被派将伊格那提耶夫的便函亲自送交两位特使，同时竭力打听清楚，他们在此种情况下打算如何办。

葛罗和额尔金回答道，他们已知道清帝逃出京城，但是他的兄弟恭亲王在京，可以根据同样的原则和他签订条约，他们认为情况并未有所改变。

联军总司令部通过了炮轰北京的最后决定以后，认为必须首先找到僧王的军队，将它预先消灭在战场上。29日，联军从军营出发，寻遍了四郊，但是连它的踪影也没有见到。第二天，为此又派出两个独立纵队。下午，联军到达北城墙的西门以后便分开了：英国人停在城墙外，而法国人在进军时已向右偏离，此时朝海甸方向继续前进；关于这一情况，无论是两位特使或是英军司令均未预先得到通知。因此，他们很快便到达清帝的夏宫。法国人顿时想到可以捞到什么财富，于是不等指挥官的指示和命令，便乱七八糟地扑向由几个内宫太监守卫的宫门，顷刻就将这支微不足道的卫兵消灭，冲进了夏宫的内室。异乎寻常的富丽堂皇和神话般的财富使他们大开眼界，全都感到惊讶不已。如果确如中国人所说的，主要珍宝真的已装了千百辆大车提前运出夏宫，那末对于战争开始前这里的情况就更难以想象了。而英国人在最近的暴动中虽然看惯了印度的豪华，并且是抢掠富饶城市的老手，但是对于他们在海甸发现的这些宝藏，同样感到欣喜若狂。这些珍宝中有无数为欧洲人从未见识过的宝石、玉器、瓷器、珐琅制品，有大批珍贵的时钟、珍珠、丝织物等等。他们异口同声地赞叹，圆明园的宫殿真

称得上是上天的儿子——三亿人的统治者——的居处。

不到两天，这座宫殿就被洗劫一空了。

英国人在城下整整停留了一天，越来越不知友军的去向；为了弄清他们在何处，同时也为了使他们知道自已的情况，于是英国人便发炮二十一响；过了短暂的间歇，从圆明园方向传来了回答的声音。额尔金带着随员立即骑马赶到那里，但是为时已晚，这时抢劫宫殿正达到高潮。英国人的第一件事就是占领档案库，并将中国政府的外交来往文件加以查封。这后一消息很快传到了伊格那提耶夫那里，使他感到极度不安。由于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取得的这种比联军有利的地位将会毁于一旦。联军发现我们从1858年以来和中国交涉的有关函件，会使英国人得到一项用以反对我们的何等有力的武器，使我们和中国签订条约终于成为不可能。但是，万幸的是，抢劫时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混乱，使英国人未能完整地掌握全部档案。在一片混乱中，无疑有许多重要文件落入了个人手中，仅举一例便足以说明此种情况，即我国驻巴黎公使基谢列夫伯爵，后来曾从远征回国的某个士兵手中，仅以二百法郎的代价买到一份我国所签订的《天津条约》的原件。

伊格那提耶夫惯常总是只在条约的俄文文本上签字，而中文文本上则没有他的签名；他的这一习惯作法于事不无裨益。在当时情况下，中文字比俄文字母更易受到联军的重视；一件没有俄国公使签字的文件显而易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次日，伊格那提耶夫用一个合乎情理的借口派秘书沃尔夫前往联军军营。沃尔夫到达时，适逢两位特使的关系显得比以前更为紧张。葛罗男爵抱怨额尔金独断专行，竟认为办事不必先与他——一位法国特使商量；而额尔金则斥责法国人在海占占领并抢劫清帝宫院的放肆行为；他并且说，现在中国人完全有理由称欧洲人为蛮夷了。在两位联军总司令之间也发生了争执：蒙托班坚持

要进攻北京，而受到额尔金支持的霍普·克灵顿则不想将军队开进京城，以免它遭到洗劫。

在两位特使最坚决的要求下，中国人终于释放了一部分被俘人员。在联军规定的时间，下午四时，巴夏礼、洛奇、埃斯凯腊克·戴·劳特、一名锡克兵和四名法国兵来到了英军大本营。他们由恒祺派了几辆中国小车出西北门送到英军哨所，然后，俘虏们便步行归来。他们备受折磨，面容消瘦，形状十分凄惨。英国人至少还衣着清洁，而法国人则穿得又脏又破。由于额尔金无时不在想念他的不幸的同胞，因此总是通过恭亲王的关照，给他们送衣服、被褥以及各种必需品，而法国人对自己的同伴从未尽过一点力。戴·劳特最为狼狈，他的镣铐在五天前才被取下，因痛楚而引起痉挛的手足都已溃烂。

获释归来的英国人所叙述的那些故事是很有趣的，但是比起以一种特有的感染力和爱好夸张而吸引人的法国人来，就显得大为逊色。额尔金和巴夏礼的会面颇为有趣，这是一次纯粹英国式的会见：冷淡而毫无热忱。人们都知道，额尔金是如何钟爱巴夏礼，他对巴夏礼获释该是多么高兴，尽管如此，他只是在和他握手时说了一句：“我亲爱的巴夏礼，你好吗？”^①后者回答道：“很好。”^②他们就立即走开了，以便进行事务性的谈话。对海甸宫院的抢掠实在达到了不成体统的程度。为了制定分配抢掠到的财物的某种办法，联军在侵占宫院的第二天成立了一个由军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它将较好的器物挑选出来作为礼物，以军方名义赠给英国女王、法国皇帝、皇储阿尔培特亲王。蒙托班则向葛罗男爵、法国的头面人物送去一些精美的礼物；当然，他更不会忘怀自己和他的部下。

^{①②} 这两处引号内的原文均系英语：“Oh! how are you my dear Parks?”，“All right!”。——译者

要使人人都满意，这是一件难事；未曾参与抢劫的部队对他们的长官发出了怨言，这时额尔金为了平息他们的不满，便和霍普·克灵顿共同想出这样一条妙策：凡参与占夺海甸宫院的人准予由本人自行选定留下一件器物，而其余抢劫到的器物则必须交到大本营进行拍卖，在拍卖结束后，将售得的全部款项在未亲自参加洗劫清帝居室的士兵中进行分配。

所有营房、军官住所和两处军营都堆满了抢劫来的物件。

霍普·克灵顿是唯一没有参与同流合污的人，而且也不愿从这项属于别人的财产中将任何一物占为己有；他大声斥责，对这次不义的抢劫行为表示极度愤懑，他丝毫未因我方秘书沃尔夫在场而稍留情面，要求海军第一总队队长密契尔将军，至少不许将英军总司令的司令部变成堆放赃物的仓库。

为了尽可能密切注视事变的发展，俄国公使迅速派出一名为使团所熟悉的中国和尚，前往北京探听京内的动向。这个和尚于27日离京返回时报告说，僧王及其大部分军队已沿张家口的道路退向南口，因此现在留在北京的只是一小部分军队，而由在八里桥战役中负伤初愈的胜保负责北城一带的防御。清帝的后妃早在9月6日即已前往热河，随同出走的还有清帝的近臣：肃顺、郑王和皇叔惠亲王。这个和尚虽然未见到当时尚未获释的那些俘虏，但是他说，中国人对巴夏礼的行为颇为惊异，后者尽管处境艰难，但是并未因为想早日获释而有些微表示，而是一如既往，态度傲慢，不可接近。原来，就在他这次获释以前，他曾在清帝的皇兄和军机处领班大臣恭亲王^①处，并竭力劝说后者登上皇位，但是恭亲王严辞拒绝了这种荣幸。巴夏礼的这一建议，使中国人更加确信他们以前的推断，联军进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颠覆当今皇帝的王位，

^① 旻宁(即宣宗)共有九子，共第一、第二、第三均早卒，第四子奕訢，即文宗，恭亲王奕訢系第六子，此处称皇兄，显属错误。——译者

并由他们的特使或是某个重要的中国大臣来登极。按照中国人的概念，拥立某人登极是件最容易不过的事：只要进入皇宫将一位预定的人选扶上空着的王位，并迫使周围的大臣以规定的方式向他宣誓效忠就行了。

由于此事如此容易办到，它便成了满洲人惧怕英国人闯进京来的主要原因。而普通百姓对此则抱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俄国使团的成员在他们来往经过中国各地时，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老百姓对于谁登极都无所谓，只要他们的处境不要每下愈况，只要他们受的罪不要比以前再有所加重。

为了就近观察联军的行动，伊格那提耶夫派巴柳泽克担任此项任务。

他在我方墓地住下后，一有机会便和我国的教会取得联系，并在炮轰北京城时，提醒联军不要忘记保护我国教会馆舍的诺言。同时，巴柳泽克还要打听清楚，在我方和中国之间的外交来往信件中，哪些部分落入了联军之手，并尝试把这些信件从他们手中弄回来。俄国公使准许巴柳泽克在联军占领城门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情势或由他本人亲自进北京城对我方教会的状况查明验实，或是派波波夫前去办理此事。

巴柳泽克率领一名译员和两名哥萨克扈从来到教会的墓地以后，便立即前往联军军营。他碰上了一件使他大为惊异的事，额尔金勋爵正在从事一项荒唐透顶的工作：拍卖由海甸抢劫来的物品。看来，英国人对于他们的特使如此积极地参与这一活动，丝毫不感到奇怪，而只是责备法国人，说他们将所有抢得的东西全都归为己有了。

葛罗男爵盛情接待了巴柳泽克。他刚刚谈及有关中国档案问题时，就将已经发现的我国与中国之间来往函件共七宗交给了巴柳泽克。其中三宗系由前全权代表彼罗夫斯基签署，两宗出自伊

格那提耶夫本人之手，而且是寄交军机处的。其余的系由普提雅廷和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签署的。葛罗男爵同时还应允，在进一步整理档案时，如发现涉及俄国的所有公文都将交与俄国使团。在海甸发现的全部文件当时装成四箱，由英、法两方的总司令加封后交由英国人保管；而后来进行分类整理时，使我们幸运的是，并未发现俄国使团的任何文件。这项消息对于伊格那提耶夫来说，不管是一大喜事，这样使他摆脱了新的和极为沉重的忧虑。

当巴柳泽克偕同随行人员刚一到达墓地时，关于他到达的消息便在北郊的居民中传遍了，于是从附近四郊跑来许多中国人，他们跪着呈献食品，并哀求保护他们免受敌人和寇盗的危害。最初来见巴柳泽克的是一批基督徒，当时他发给他们一些印着“基督徒”^①字样的小纸片，让他们贴在自己住房上，以保护不受抢劫和暴行的危害，于是中国人便成群成群地蜂拥到墓地来，硬说他们全都是基督徒；不言而喻，谁也不会遭到拒绝。在前来的中国人中，有一位姓金的、原在传教士那里服务的老相识，金某报导说，我方的教会已根据步军统领衙门的命令予以封闭，所有来自南馆的教师和仆役均受到严密的检查。由于流传着一项谣言，说俄国人似乎已与联军合谋，在城墙脚下暗掘地道，便于敌人入城，因此步军统领郑王^②下令在城墙和俄罗斯馆之间掘了一道深沟。据这个中国人说，北京城内已无一个重要官员，甚至连总督和受托管理该城的其他两个大臣也住在城郊，只是有时才进京城。

金某自告奋勇愿为巴柳泽克送信给我方教会，他果真于次日将固礼神父的一封复信带来。这位修士大司祭告知说，上帝保佑，全体传教士均平安无恙。固礼神甫写道：“百姓对清帝和大臣们使

① 这里的原文为法文 chrétien 与英文 christian。——译者

② 按郑王此时已随清帝前往热河。——译者

京城罹难极其愤懑，而对满洲王朝先期出亡的怯懦行为，则满街咒骂不止。”

固礼神甫要求采取措施，以免北馆在联军攻城时遭到危险。他还告知说，不幸的阿尔巴津^①人（即信东正教的中国人）住在北城的其它禁兵之间，正对着法方的炮兵连。金某于是立刻返回京城。巴柳泽克通过他通知修士大司祭，已经采取保护俄罗斯馆免于危险的一切措施，并请他吩咐全体妇女（即女基督教徒）于攻击一开始，便到北馆去躲避，同时必须将北城墙下的阿尔巴津人也集中到该处。

10月2日中午，正当炮击的一切准备已经就绪，一位军官突然骑马赶到法军总司令部，他带来一项情报，说安定门现在即将开城，于是蒙托班立即命令值勤部队派出哨兵占领城门。巴柳泽克得悉此项命令后，请求准予加入该值勤部队，于获得准许后就立即和译员波波夫驰往，他带了兩名哥萨克骑兵，随法国人一道进了城。巴柳泽克通过了内城门并赶到士兵的前面，顺城墙向左转，以全速沿着城墙向我方的北馆急驰而去。

仅仅法方部队逼近城门这一件事，即足以迫使驻扎在城墙上的满洲军队逃跑了。当城门上树起英、法两国国旗时，北京城的勇敢的捍卫者便悄悄地各自归家了。

巴柳泽克顺道来到北馆，将一名同行者留在该处担任警戒，然后便穿过整个皇城径直前往南馆。

俄国人从满是人群的大街通过，看来是件冒险的行动，但是心地善良的大群的中国人只是感到惊讶和表情迟钝的好奇；许多百姓彬彬有礼地鞠躬，没有一人表现出敌意。当这批骑士顺利地到达我国教会的住所时，他们对警戒人员毫不理会，下马后便去寻找修士大司祭。当时确是欣喜若狂。全体传教士在几分钟前还惊恐

^① 即雅克萨。——译者

万分，在等待着中国人对他们的最可怕的奸诈行为，而此时却象欢迎他们最亲近的人那样来欢迎自己的同胞了。

巴柳泽克在馆内过了一宿，次日晨便将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报知伊格那提耶夫，同时还给他送去波波夫从英国译员威妥玛处弄来的两份文件，其中一件包含有俄国公使提出批准《璦琿条约》和《天津条约》的补充条文的要求。

在这同一天，巴柳泽克前往葛罗男爵处。法国特使刚刚得知北京根本无人当权，这一情况显然使他感到极大的不安。联军的处境确实不佳。他们虽然费了很大力量，而且目的不明地到达了中国的京城，但却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该如何办；肯定谁也不可能甚至大概地将中国全权大臣们的住处告知他们，甚至连他们一直寄以如此厚望的恭亲王，也为了避免遭到突然袭击而不时东移西挪。他从各处向联军送发的公文，不仅意思相同，甚至辞句也完全相同，但他从未注明此项公文发自何地。

葛罗男爵在和巴柳泽克进行的一次诚挚的谈话中，表示打算尽早迁入北京，以便结束这场使联军脱离远征本意越来越远，而前景却是危险莫测的战争行动。葛罗对俄国公使能如此巧妙地在各盟国之间保持这样有利的中立地位的本领表示惊叹，同时还说，如果俄国公使现在同意出面充当中国和联军（联军如果没有他的巧妙的协助是不行的！）之间的调停人，情况就会有很大的进展。巴柳泽克利用葛罗无意中流露出的这一想法，随即回答说，此类建议除了他——法国特使，是不可能由其他任何人提出的，又补充说，如果正式提出此项建议，俄国公使大概是不会拒绝的；葛罗就此表示说，向一位外国的外交官正式提出这类请求，这对一位特使说来是不体面的，但他又补充道，如果您转告伊格那提耶夫将军，我们全都恳切地请他离开通州前来此地协助我们缔结和约，那末我们将十分感谢您。当话题回到他想尽速前往北京时，葛罗请巴柳泽

克指点一处适宜于法国外交使团用的住房，尽可能和俄国公使准备居住的那处馆舍接近一些。

V

最近所出现的这一切事变使伊格那提耶夫深信，久已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将是那种消极的、旁观的、一般说来是如此难堪的局面中（他身临其境已达数月之久）摆脱出来的一天。这是必须介入中国问题的解决，并担当起名副其实的俄国代表的这个角色的时刻。要赶在交战双方达成和解以前插手其间，就必须利用处于混乱状态的这几天，并尽快地进入北京。俄国公使与联军方面两盟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大大地便利了这一任务的完成。

伊格那提耶夫指望法国当局对他出面调停给予最大的赞助，因为后者由于和中国迅速媾和，将会体面地结束这次远征。而英国当局则可能会是另一种态度：他们既然轻视俄国人的帮助，由于忌妒其成就，当然也就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排斥俄国公使参与和中国的谈判，并且只要一不需要时，就会将他推到次要地位。至于中国人，已经完全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因此难以作出任何阻挠。

根据这些想法，公使遂于10月3日离开通州，以便事先和英、法两国特使会晤，使他们对俄国的意图不致产生猜疑，并取得他们对他干预这一共同事业的赞助。

翻译官塔塔里诺夫被直接派赴北京，以便在京内搜集有关事态发展的确凿情报，探听还有哪些大臣留在京城，如果进行谈判，可与何人交涉，等等。

当时派了一个由五辆大车组成的车队，在三名哥萨克骑兵和三名水兵的护卫下，通过安定门前往距离该处七俄里的我方南馆。车队通过全城，这不仅使政府，而且使京城的百姓都预先知道俄国

公使要抵京了，这也是对居民情绪的一种试探。

公使于下午1时左右到达安定门附近的我方墓地，然后，便在秘书和两名哥萨克兵的伴随下，骑马前往拜访两位特使。

他到达时，适逢额尔金勋爵正因获悉9月6日为中国人所俘获的那批失踪俘虏的悲惨遭遇而感到十分抑郁。他说：“经过多次坚决要求，对方于昨晚将博尔拜、诺尔曼和安得森交还了我方，但是他们并未生还，而是装在棺材中的几具尸体；这些尸体的形状都很可怕，连最亲近的人也难于辨认。据几名象是奇迹似地幸免于死的锡克兵的讲述，所有被关押的人都备受饥饿之苦，他们被抛进寒冷而潮湿的地下室，白天则被置于烈日之下，他们任凭虫子和老鼠肆虐，其中一人，即博尔拜还为猪所缠扰。”额尔金说：“一想到我们要和制造这类惨案的政府建立正当的外交关系，真令人不寒而栗。我们正在为平等对待其它欧洲国家的君主的权利与该政府进行说理，而就在这时，就在离清帝咫尺的地方，就在他自己的宫中，就在他最亲近的大臣的监视下，竟然发生了这一切。”

额尔金向伊格那提耶夫详细说明了近日来他和恭亲王之间通信来往的情况，并将他打算向中国方面提出的最后通牒草稿念给伊格那提耶夫听。英国特使在致恭亲王的通牒中写道：“联军曾答应保全中国的京城使其免遭惩罚，其条件是释放9月6日被僧王捕获的俘虏，并在指定的日期打开一处城门。恭亲王一再写信向我方表明，俘虏平安无恙，已得到妥善安排和适当的照料，可是这一切全是谎言。

拘捕二十六名英国臣民，是不正直的，是违反国际公法的，在被拘捕的人中，只有十三人获释，而且全都带着受过惨痛折磨的伤痕，其余十三人则被野蛮地杀害了。

清政府究竟要以何种方式履行它现在所担负的义务呢？在发生了这种事情之后，难道还要英国履行以移交城门为条件的那些

义务吗？你方如要避免受到应得的严惩，你方政府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接受下列各项条款。

1. 必须将英国臣民受过折磨的圆明园残址彻底捣毁。

2. 必须在10月9日晨7时以前将三十万两白银（合六十万卢布）送到英军司令部，以便由大不列颠政府斟酌情况，将该款发给遇难的英国臣民及其家属。

3. 在天津议定的并须立即签字的协定中，应补充一条，即在英、法政府认为有利的情况下，联军部队有权留驻天津。

4. 必须在英、法领事馆的警戒下，立即在天津城内兴建一座纪念碑，用满文和两种欧洲文字刻上清政府表示低头认错的铭文，以纪念被俘死难的欧洲人。

5. 为转运在天津遇难者的遗体而举行的隆重仪式，以及纪念碑在天津举行揭幕式时，必须有中国方面最高的大臣到场参加。

6. 对逮捕持有军使旗的英、法人员这一不义行为负有罪责者，均须受到最能起警戒作用的惩处。”

英国特使继续写道：“如果10月7日上午10时，额尔金勋爵尚未得到恭亲王通知同意于9日交付该项赔款，并同意于次日签订协定和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那末联军司令部将奉命恢复军事行动。那时，北京的皇宫将被彻底捣毁，战争不仅限于陆战，还将在海上坚决地进行；中国政府目前在南方各港口尚能得到的海关收入，将由联军掌握；英国军队将占领广州；载运大米和其它食物的帆船目前尚能通行无阻地开往北京，届时将遭到扣留并被击沉；总之，清政府的王位将被推翻。”

额尔金念完这篇草稿后又补充说，法国特使可能会在定稿时要求作某些改动，但目前他还不知道草稿的内容。额尔金最后请俄国公使对此发表意见。伊格那提耶夫十分坦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对该草稿的逻辑性和合理性给予公正评价，那是无

懈可击的，但是对它的內容他却不能赞同。公使指出，首先，对满洲皇族说来，要求他们在短期间内付给你们这一大笔白银，那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政府从北京出走时，将它昔日所掌握的财宝已全部带走。此外，根据对清政府的了解，还可以有把握地说，它永远不会自愿贬低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不会同意毁去清帝的夏宫，树立蒙受耻辱的纪念碑，以及派大臣参加葬礼。

在人民受屈辱，在标志这种屈辱的纪念碑将要垂之久远，以及在宫殿遭到破坏和人民的财宝被掠夺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和平，是不可能持久的。满族人和津、京地区的居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糟蹋、破坏他们世代相传的建筑物，抢劫和制造暴行，这就是欧洲人的文明、力量和强大的表现。

后来当话题转到他本人的预定步骤时，伊格那提耶夫表示耽心，如果联军决意炮轰京城，或摧毁北京的皇宫，就会破坏他进京的决定。他说：“我由通州来此时，满以为能在北京见到您和葛罗男爵；现在我已不打算重返通州，同时我还认为在城根露宿，等待战争结束，对我这样一位中立国的外交官来说，是不体面的。”

额尔金勋爵被这番突如其来的表白弄得极其窘迫，同时他显然不愿俄国公使比他先进北京，于是他装着一副关切的面孔，试图说服公使不要冒如此重大的、而且照他看来还是不必要的风险。

公使回到墓地以后，立刻差遣巴柳泽克上尉前往京城，将他打算于次日进京的消息告知大司祭固礼神甫。这一夜便决定在墓地度过。由于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只好派人到四郊去觅食。自入暮以来，即未曾住雨，墓地的景象阴森可怖。寻找了很久仍一无所获；附近的所有村舍空无一人；老百姓害怕遭到抢掠者的危害，都四散逃跑了。最后，只好不顾夜深，派人前往北馆，弄些面包来为大家充饥。

度过了不愉快的夜晚，又是令人难受的阴沉而寒冷的早晨。公

使盼望着塔塔里诺夫和巴柳泽克回来，他们会带来有关京城情势、驻在京内的军队和百姓的情绪的消息。所有这些重大的问题对于立刻要办的事都是很有意义的。中午时，这两位被派去的人终于回来了，并带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说他们未曾见到任何人，也未探听到任何情况。但是，伊格那提耶夫并未因此而延缓进京，不过他决定先去会见葛罗男爵，向他打听前一天两特使商议的结果，同时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他。

葛罗男爵对这一通知所抱的态度和他的同事完全不同；他与额尔金相反，他以急切的心情请伊格那提耶夫尽速入城，寻找那些躲避的大臣，劝说他们重开谈判来拯救王朝和京城。伊格那提耶夫再次强调他的决定是无可变更的，同时还向葛罗男爵详细说明了与打算要办的事互相牵连的那些困难。他说：“自清帝出走和恭亲王远避以来，京城内一片混乱，因此需要作出巨大努力，主要是要花很多时间来澄清事态，取得中国方面的信任，劝说他们在对他们正是最为有利的时刻罢兵停战，因为严寒的霜冻和凛冽的西北风好似他们的天然同盟军，此时正要降临肆虐。”可是，额尔金勋爵在致中国方面的最后通牒中规定的复文时限却是太短了；葛罗男爵对此立刻作出反应，他热诚地向伊格那提耶夫保证说，时限可以延长，现时可以指望至少要等八天后才会发炮攻城。后来额尔金迫使葛罗男爵放弃自己的意见，将炮击北京的时间不是定在第八天，而是定在俄国公使进京后的第五天。

尚待解决的问题是从哪一方向进城。在北京的所有城门中当时开放的只有离北馆最近的安定门（由英、法哨兵作为前沿哨所予以占领），而京内一切百姓人等来往通行的西南城门，这些城门都由清兵防守，作为同胜保军营和僧王军营联络之用，这两处军营驻扎在城郊，也是恭亲王临时居住的场所。所有其它城门一律关闭，一部分被用土堵塞，一部分则构筑防栅。如果从开放的两处城门

中选择一处，公使当然宁愿由西南门自由进入，以免求助于守卫安定门的联军哨兵；但是，这样就必须在城外绕行若干俄里，由于军事行动尚未停止，并不安全。而由安定门入城则有另一种危险。额尔金勋爵对俄国公使打算先于他进入北京一事深为不满，而现在他是该城门的主人之一，就能轻而易举地命令守城哨兵不许任何人入城，并且完全可以将这说成是一项军事预防措施；万一俄国公使果真由于这类命令而被英方哨兵拦阻于城门口，那末额尔金完全可以将全部责任推到管理城门的营指挥官身上。但是，对公使来说，这个问题却具有重大意义；预计公使进北京时一定会有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出来观看，将此事安排得隆重非凡和尊荣备至，这对他就成为头等大事了；而任何混乱、任何来自联军方面的阻碍，即与联军前沿哨兵及散兵线的微小冲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足以有损他的名誉，甚至将全部事情搞糟，因此公使还希望至少能取得法方的间接协助，以获得保证。

为了使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岗哨习惯于这种想法，即俄国人有权通行无阻地进出安定门，曾于10月3日这一天和4日晨，派遣了几名使团成员和普通的哥萨克人几次往返于北京和城郊之间。

果然不出所料，蒙托班和葛罗男爵一样，对伊格那提耶夫的打算表示同情，但是蒙托班劝告他不要去南馆，而住在北馆，还说，法方在城门一带值勤的营队将完全任他支配，而且一旦需要，就立即前往援救。

在得到不受阻碍地进入北京这一保证后，伊格那提耶夫又回到墓地，以便写几行字送交霍普·克灵顿和额尔金勋爵。伊格那提耶夫在致英军司令部的信中写道，他同意将昨天谈及的那些死难的英国人的遗体安葬在俄国的墓地。他通知说，他们的坟墓将由我方教会保护，并请他派遣一位军官前来商谈，决定安葬的地点和时间。伊格那提耶夫通知额尔金勋爵说，他希望查明在北京

城内是否还有清王朝的代表和政府机关，这一愿望促使他马上入城。

使团于2时30分登程。在伊格那提耶夫所乘的大轿前，有地形测绘队的官员什姆科维奇带领两名哥萨克兵，轿旁为秘书沃尔夫和译员巴图曼库耶夫，轿后跟着两名传教士和六名哥萨克兵，再后是塔塔里诺夫和大司祭乘坐中国大车随行（蒙托班军营的负责长官施米次骑马引导公使至城墙下，并劝告他勿冒险入城）。进入北京城门的庄严时刻终于来到了，一直阴沉的天空象是特意放晴了，而阳光也不时透过云层照射下来。在内外城门之间的空地上，英方和法方的营队站立在城墙旁边。当公使的轿子走近他们时，先是法方岗哨的士兵，而后又有英方岗哨的士兵，均立正并举枪致敬。欧洲国家的军队是当着感到惊异的中国人的面表示致敬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公使一行迅速通过城门以后，不知不觉来到一些拦街拉起的绳索前，在绳索后面架着大炮并集结着中国军队，周围是一群看热闹的人。什姆科维奇按照事先约定的信号，带领两名哥萨克兵向这些绳索奔去，并将它们放倒在轿前；这样便通过了中国人所设置的障碍，人群中豁开一条路，于是使团便沿着一条主要街道扬扬得意地向南馆进发。

自墓地到南馆，全程约走了一个半小时。教会成员迎接使团时表现出的喜悦之情就无需详述了。南馆是一派辉煌的节日景象，这里显然是为接待贵宾而准备的。

当他们刚一作完祈祷仪式，坐下就餐时，就有人来请固礼神甫；当时前来找他的是两个中国人，一个姓高，是俄国传教士团的一位教师，另一个姓关，是个官员，他们都是由清帝出走后负责管理北京的临时军事委员会（巡防处）派来的。该委员会负责处理军事、外交和行政事务，其组成人员有老相识，原任刑部尚书，全权大臣瑞常，现在他是京城的提督（步军统领），还有刑部尚书文祥、户

部尚书宝某、麟魁、成某、礼部尚书贾某^①以及其他一些人，总共有八名高级大臣和几名普通大臣；其中最出众的是恒祺和崇纶。高某和关某于是向固礼神甫探听俄国公使来此的真实原因，并力图弄清公使是否同意担任中国政府和联军之间的调停人，能否拯救北京城免遭蹂躏和洗劫。固礼神甫早已得到授意，知道对中国人该说些什么，于是便回答道，俄国公使很久以来就想帮助清政府，对它劝说媾和，但政府不听他的劝告，以致国家遭受目前这种灾难。

关某全神贯注地听毕固礼神甫的话以后，向他转致巡防处官员的请求，邀请他在当天晚上前往彼处会商。

当固礼神甫到会时，所有大臣均已在座。与会大臣再次要求他说明公使前来北京的真实原因，固礼神甫对此作了答复，他说：诸位十分明了，俄国对贵邦帝国的命运一向深表同情。值此帝国濒于灭亡，贵国京城遭此严重威胁，从而可能完全被毁之际，俄国公使对于贵国政府的前愆概不计较，赶来北京，谋求最后一次拯救贵国王朝和京城。大臣们于是卑躬屈节地请求固礼神甫劝说伊格那提耶夫为他们与英、法之间的争端出面进行调停。固礼神甫建议他们直接去找公使，正式提出出面调停的请求，同时他表示，如果他们在提出请求时，同时允诺履行他们所知道的俄国的全部正当要求，那末他们大概不致遭到拒绝。这一暗示在委员会的成员中引起了热烈争论。他们分析了伊格那提耶夫在他首次来京时提出的所有要求，最后得出结论是，至多只能同意沿阿穆尔河确定中

^① 文祥历任吏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署刑部左侍郎等职。在清帝出走热河时系户部左侍郎。于此期间，据历次上谕，曾著文祥署理步军统领，又曾负责办理与军机处有关事宜，未见担任刑部尚书的记载。宝某即宝璠，为户部右侍郎。成某可能系成琦，亦为侍郎，也可能为陈孚恩，当时系外城办理团防大臣，后补授吏部尚书。贾某似系贾祺，为体仁殿、武英殿大学士，曾管户、工、兵等部，并任吏部尚书，在清帝出走期间，留京办理外城团防，也未见有担任礼部尚书的记载。——译者

俄边界；至于从满洲境内，即从当今王朝的策源地再割让大片土地，那是没有讨论余地的。

在大司祭神甫离去后，中国的大臣们商议了一通宵。清晨，委员会的全部成员来到了南馆。

中国人在祝贺公使顺利到达之后，又说了许多客气话，他们对在如此惶惶不安的时刻，能在北京见到友好邻邦的公使表示高兴，并请求公使指点他们，如何才能摆脱他们的困难处境。大臣们凭借大清帝国和俄国二百年来的友好关系，表示希望公使不致拒绝解决他们和联军方面的问题。中国人说：“联军口口声声侈谈和平、通商、友好，但同时它们的军队竟不断向北京逼近，到处对我们进行烧杀抢掠，致使生灵涂炭，国破家亡。我们已几番议和，签订条约之功垂成，然而又都归于失败；我方此刻即便已决心接受联军方面的全部要求，但实不知应如何行事，方能圆满解决问题，结束战争。诚望贵公使能以事实证明贵国确系本国的善邻，贵国确恩造福于中国并帮助本国缔结和约。”

于是，伊格那提耶夫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将事变的一般过程向委员会作了一番描绘。他向他们论证了俄国所提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叙述了俄国沙皇的强盛，沙皇在欧洲人心目中所享有的威望，然后，他向他们说明，清政府的昏庸实属不可原谅。伊格那提耶夫说：“俄国对贵国一向深表同情，曾不止一次地向贵国提出忠告，指出如何方能摆脱贵国近年来所处的困境，但是贵政府非但不顾这些劝告，反而听信肃顺之流那些不中用人的主张。我在北京虚度了十一个月之久，虽曾屡次提出显然是偏向于贵国的建议，然而贵大臣对此不予重视，而且可能竟未将这些建议向清帝具奏。当你们拒绝接受俄国建议提供的精良武器和军事教官以后，我们应如何对待此事呢？俄国可以因你们不履行其合法的要求对你们进行残酷无情的惩罚，也可以因你们怠慢其代表而进行报复。对俄国来

说，如果要在—万俄里的中俄两国边境线上对你方任何—地发动—次无法抵抗的打击，那是轻而易举的。你们知道俄国有多少陆军，知道直隶湾停泊着我国的分舰队，尽管如此，但是俄国仍然不仅不愿利用你们现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而且还决心向你们证实它对贵国所抱的善意。

“你们十分明白我国政府所提的要求，这些早在致军机处的许多公文中早已写明。贵国倘任命全权大臣来解决贵国事务，并答应在对联军的一切行动中，按照我们的劝告行事，这样我就能保证北京不致遭劫，清王朝将继续保持其王位，并使贵国的一切问题均可得到最妥善的解决。”伊格那提耶夫将欧洲人的雄厚财力、中国军队的低劣、威胁北京和皇帝宝座的厄运——指明，然后在结束他的谈话时说道：“如今你们该明白了，唯有俄国才是对清王朝真诚亲善的，唯有它才能拯救你们。”

这些往日高傲自大、叱咤一时的大臣们现在是卑躬屈节、羞愧交加，于是苦苦央求伊格那提耶夫尽弃前嫌，并将—切过失都归咎于肃顺的刚愎自用，由于他的固执、粗鲁和对待问题的荒谬见解，使中国遭殃。他们答应恪守和俄国所订的—切条约，并且再次请求公使出面调停。

于是，伊格那提耶夫向他们说明，良机已经错过，现在已不可能指望取得会谈开始时所能达到的那些成果，而只能在使北京免遭毁灭和维持清王朝的王位这两桩事上作些关照。伊格那提耶夫在答应办这两件事时，对这些大臣们并不掩饰他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他说：“贵大臣经常自食诺言，使联军方面对你们缔结和约的诚意难以相信，至于你们对待俘虏的行为，连我也不能以为是无罪的。你们对俘虏所采取的野蛮行径不仅在英、法两国，而且在俄国和其它—切文明国家中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愤懑；我作为—个俄国公使理当同情—切欧洲人，所以也将和别人—样，要求为死

难者雪耻。”

伊格那提耶夫最后说：“无论如何，如果要我同意你们的请求，出面充当贵国和联军之间的调停人，那末你们必须满足我的下列要求：

1. 恭亲王必须立即向我提出进行调停的书面请求，使我能和他建立起正式的关系。

2. 中国政府在和欧洲人进行谈判时，必须就谈判的全部内容事先征询我的意见，不得稍有隐瞒。

3. 中国政府必须同意我首次在北京逗留期间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即：(甲)承认并批准《璦琿条约》；(乙)同意在东部顺乌苏里江以迄于朝鲜国境划界，而在西部则沿中国的常驻卡伦划界；(丙)同意在喀什噶尔、库伦和齐齐哈尔设立俄国领事馆。”

伊格那提耶夫在结束其谈话时说，如果当我着手在联军和中国之间进行调解，为那些与俄国毫不相干的贵方事务进行斡旋时，首先不关心我片刻不敢忘怀的保障本国自身的利益，那我就对本国政府承担重大责任。所以，在我还未获得恭亲王的满意的答复，言明此次定会接受我的要求时，我不能着手处理贵方的事务。

中国的大臣们未曾和公使抗辩，并答应将这一切立即告知恭亲王，据他们说，恭亲王住在城外，离城不远的地方。

10月5日，在我方墓地上，为被中国人俘虏时折磨致死的英国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由于考虑到亲自参加这次典礼对自己有所不便，伊格那提耶夫并未接受霍普·克灵顿的盛意邀请，而是派了巴柳泽克、沃尔夫和使团的两名成员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接到同样邀请的法国人，不知为何没有任何人参加这项仪式。送殓的行列安排得极其隆重：前行者为一队倒持着枪枝的士兵，其后是乐队，演奏着哀乐，后面则由士兵抬着一些炮架，炮架上安放国旗覆盖着的棺柩。送殓行列从英军大本营附近的黄寺旁开始，在这

样整齐的队列形式下走到我方墓地，由修士大司祭亚历山大手捧十字架在该处相迎。

10月6日晨，临时委员会成员携带恭亲王的书面答复前来俄罗斯馆。全权大臣在信中向俄国公使表示，当获悉俄国公使愿意参加解决中国与联军之间的事宜时，感到欣慰，然后写道，他认为公使同意进行调停，是二百多年来存在于俄中之间的友谊的最好证明，并完全相信，与英一法之间的问题定能在双方完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得到妥善解决。大臣们在递送全权大臣的公文时还口头补充说，恭亲王由于害怕和联军见面，所以决定不入城，但是如果俄国公使同意在俄罗斯馆接待他，那他就立即前来。当然，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伊格那提耶夫在向来使表示十分高兴亲王前来作客时，便向他们解释说，采取这种措施，会使英国人的自尊心受到强烈刺激，而且丝毫无补于事。恭亲王诉说了时局动乱的艰难，劝说公使将有关俄国的事宜留待与联军的谈判结束时再行解决，并恳请他相信，届时一切当照他的要求办理。

伊格那提耶夫对此反驳道，其实，条约的草稿早经拟就，现在只需任命全权大臣加以审订即可。接着他又答复道，他考虑到清政府所面临的危险，同时也不愿加重恭亲王本来就已经够大的困难，他决定从缓办理，以便先使京城摆脱危险，并表示完全相信全权大臣会恪守自己的诺言。

关于偿付死难俘虏的恤金的问题，遭到了委员会成员的极端反对。负责过户部的宝某声称，国库的全部存银均被肃顺及其兄郑王运至热河了。宝某还负责掌管城外的宫殿圆明园，由于圆明园被焚毁，他曾受到降级的处分^①。宝某请求说服联军尽量将废园加以保存，但是伊格那提耶夫认为提出这类问题反正不会有满意的结果，纯粹是多此一举，并指出，最为重要的是尽力挽救北京的

^① 宝某即宝璠。事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5卷，第33页。——译者

皇宫。如果满洲皇族仍旧那样固执己见，它将会遭到与圆明园同样的厄运。

大臣们与过去相反，对俄国公使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们对他表示完全信任，并且毫不迟疑地奉行他的一切劝告。只有恒祺一人持怀疑态度。他享有夷务老手的声望，而且是明显的亲英分子，所以他总是在大臣们面前，非常巧妙地将英国人形容得比法国人好得多。

恒祺的爱好不符合俄国的利益。伊格那提耶夫由于耽心英国人会利用这位大臣的友谊来监视他的行动，便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临时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暗示后，于是恒祺从任命进行谈判的人员中被除了名。而且，大臣们还答应决不让恒祺和欧洲人单独会面。

就在当天，恭亲王将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的最后通牒的原件送给伊格那提耶夫审阅。将这些原件和额尔金在公使进北京前夕念过的那分草稿相比较后，不能不使人感到伊格那提耶夫的批评对他所产生的某些影响。

伊格那提耶夫曾坚决反对的，为死难俘虏树立有辱中国尊严的纪念碑的条文，现在被取消了，而其余所有要求几乎未予改变均保留下来。在额尔金提出的偿付死难俘虏恤金三十万两之外，又增加了付给法国人恤金二十万两，这样，总数便将近一百万卢布。

大臣们等到伊格那提耶夫读完这些文件，便开始声称，英、法两国特使提出的要求过分苛刻，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但伊格那提耶夫却力图使他们认清，在当前情况下要提出异议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劝告说，不管政府是否愿意，对英、法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都必须接受，并答应只能为求得如下一些让步而进行斡旋：
1. 劝说联军延迟赔款的期限，并建议以海关税收抵偿；2. 暂不急于要求归还以前曾为天主教士所有的土地，而是提请中国政府逐

步地、尽可能地予以归还；3. 联军部队不在北京附近过完冬天，并尽快地将其调往上海；4. 不要求惩办对俘囚英、法人员一事负责的官吏，而且恭亲王在英、法两国特使提出这一要求之前已采取了措施，将酿成此事的主要祸首僧王和瑞麟予以革职；5. 劝阻联军决不毁坏北京皇宫；6. 葛罗男爵原拟用作法国使团住所的一品王公大臣肃顺的公馆，同意不予占用；7. 请求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尽速进京，作为联军结束军事行动诚意的证明；8. 劝说英、法两国特使进京时所携带的扈从卫队不超过二百到三百人。

联军在等待他们的最后通牒答复时，并非无所事事，而于10月7日开始进行他们的恫吓——将海甸宫殿的残存部分彻底捣毁。

惊恐万状的大臣们急忙跑到俄国公使处，忧虑地向他报告说，在圆明园那边发现了大股大股的浓烟，还发现在联军军队占领的城墙上大有活动。公使尽力安慰他们，并答应亲自前往联军军营，就所有这些问题与英、法两国特使进行谈判，并劝告他们不要采取任何断然措施。

伊格那提耶夫首先顺道来到他尚未来得及过访的北馆，然后遵约前往和联军会晤。两国特使高兴地迎接了他。他向他们详细讲述了北京城内的现状，表示希望尽快在京城内建立秩序，并以应有的信念表示，如果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不过分坚持己见，并放弃炮轰京城的打算，以证明真诚媾和的愿望，他答应说服中国大臣们同意联军提出的要求。两国特使很乐意同意照此办理，答应只要伊格那提耶夫通知他们说，中国方面对他们提出的最后通牒届时一定给予满意的答复，那末，原拟于次日炮轰京城的决定即可暂缓执行。特别是葛罗男爵表示热烈支持伊格那提耶夫。他确信伊格那提耶夫能够遏制额尔金的过份好战的意图。伊格那提耶夫竭力使联军相信，中国的财政状况极其不佳，同时还提出一项建议，

即在分配赔款的份额时，应使其主要部分不是由普通百姓们负担，否则他们必定会对欧洲人更为愤懑，而是由那些以野蛮态度对待俘虏的罪魁本人，象郑王、肃顺以及其他一些大臣们来负担。

伊格那提耶夫利用这次同英、法两特使的会晤，再次提出，在北京建立常设公使馆是无益的。额尔金方始同意，即使普鲁斯现在住在京城，对英方的利益也毫无好处，并倾向于让他暂留天津，但保留在必要时前来北京的权利。

但是，对葛罗却不大容易说服。他受天主教教士们的怂恿，希望争得天主教传教活动方面的优惠待遇来为使团争光，因而坚决认为，和议一经达成就应让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住进中国的京城。葛罗还用此种观点去影响额尔金勋爵，劝说他不能只让一个俄国的教会团体留在中国京城。伊格那提耶夫下了不少功夫才使葛罗确信，布尔布隆在天津再呆数月将更为有利。

VI

公使刚刚返抵俄罗斯馆，中国的大臣们就立即前来求见，他们怀着迫不及待和惊恐不安的心情详细询问他前往联军军营的情形，询问他由该处所获得的印象；他们恳切地请求公使给予最明确的建议，应当如何行事，方能使京城避免原定次日进行的炮轰。

城郊的宫殿圆明园上空烟尘滚滚，说明该园的墙垣也被炸毁；圆明园被毁给那些垂头丧气的中国大臣们带来了极为强烈的印象。显而易见，只要能够拯救北京的皇宫使其免遭同样的厄运，他们决心作出任何让步。

伊格那提耶夫通知他们，英、法两国特使对他们所要求的那些让步大部分已予同意，这使他们感到高兴，但同时他又提到英国人坚持要让军队留在北京过冬的主张，并说，他们还决定将常任公使

留驻北京，以便隆重庆贺他们的胜利和达到侮辱清政府的目的。

公使利用这一最新消息给中国人造成的印象，安抚他们说，只要大臣们向他保证，所有关于俄国的事务都能得到充分圆满的解决，他就竭力劝说英方放弃这项既定的主张。伊格那提耶夫补充说：“倘若联军暂时收起他们的主意，并在开春前不派驻办公使前来，那末这种行动对清帝就不会有任何不敬之处。反之，如果外国特使现在就作为胜利者住进北京，那末，清帝要返回京城就非有损自己的尊严不可。”

大臣们恭敬地听毕公使的解释后，请公使将答复联军最近这次最后通牒的公文草稿阅读一遍。草稿丝毫没有放弃那套陈词滥调，没有一句肯定的话语，这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伊格那提耶夫向大臣们说明，象这类答复必定会引起联军极其强烈的愤懑，而且立即会招致对京城的炮击；于是对他们重新拟稿作出了必要的指点。随后，大臣们收起这份草稿，去见恭亲王，并答应劝说恭亲王按照上述意见修改公文。九时，他们再次前来俄罗斯馆。他们在向伊格那提耶夫转达了恭亲王的深切谢意后，便将此次写得完全令人满意的复照交给了他，并且口头补充了下述一些新的要求：

1. 请转告英方，由于国库毫无存银，所以将由各位大臣凑集，因此银子的成色不可能完全一致。

2. 请派出几名哥萨克兵听候户部差遣，以便押解运往联军军营的银锭。

3. 由于不能指望在联军限定的时辰内将其最后通牒的复文送到，故请先期告知联军，勿因时限届满而向城内开火。

4. 请联军勿将他们的死者（被中国人俘获的）的尸体运进京城，因为这将使宗教习俗遭到亵渎，全体大臣将因未能防止破坏习俗，造成耻辱而受到惩处。

这一切请求对伊格那提耶夫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当然允诺

予以实现。而谈到死者的问题时，他说，他早就预见到所有这些难处，因此早就向联军建议过，将他们的死者的尸体安葬在俄国的墓地。会晤结束时，中国的大臣们再次请求公使向他们作一肯定无疑的答复：如果他们表示愿意接受最后通牒的条件，他能否担保，不致象在天津和通州时的情况那样，又和联军方面发生新的破裂；能否担保联军行为正直，而不致利用军队和平进城的机会，背信弃义地占领皇宫和政府机关。

伊格那提耶夫当然满有把握地向他们作了答复，并补充说，只要他——俄国公使还在城里，只要大臣们听从他的一切劝告，他保证京城和皇宫都不会受到触犯，和平是有保障的，而一俟两国特使率领卫队进城以后，军队便撤往天津。中国的大臣们十分满意这个答复，于是立刻赶去见恭亲王，将最后定稿并经伊格那提耶夫完全认可的复文送去请他画押。此时已是半夜。公使送走大臣们以后，便将他所取得的成果通知葛罗和额尔金，并请他们采取措施，以免清晨因某种误会而向城内射击。中国方面全权大臣们的答复也及时送到，并按照伊格那提耶夫的要求，于早晨七时前即已送达大本营。一切都很顺利，在联军军营中未发生任何骚动，于是炮轰北京的问题终于作罢了。

当天中午前后，中国的大臣们群集在南馆，向俄国公使齐声称谢，感谢他协助与联军议和，并拯救城市和居民免遭灾难。

从此时起，缔结和约的谈判又重新开始。英方任命的还是那几位：威妥玛和巴夏礼；法方的有在葛罗男爵那里工作的来自四川的一位天主教神甫德拉马，还有使团的翻译官美理登。中国方面则任命了恒祺和其他两名职位不高的官吏。谈判是在逐渐具有完全平和而正常的性质下进行的。每逢在谈判各方之间出现误会或争执时，双方总是去征求俄国公使的意见。一般说来，中国方面则更是遇事无不先和伊格那提耶夫商量，这就使他完全可以左右谈

判的全部进程。对于联军，伊格那提耶夫则严格遵守只作私下诱导，绝不进行正式劝告的原则。这种行动方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第一，他不致触犯联军的自尊心，也不会招致他们对俄国人过分有利的地位产生妒忌；第二，使中国人以后不能责怪俄方，说他们纵容西方列强进行勒索，而使中国受到巨大损害。此外，还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英国特使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会很勉强地同意俄国正式介入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事务。如果没有有关各方的一致愿望，自己硬要担任这种角色，这与俄国的尊严是不相称的。

正式调停人的地位只能满足无谓的虚荣，却绝不能给俄国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好处。由于操纵了谈判这条总线索，俄国公使本来就可以非常自由地注视欧洲人的一切意图，既卓有成效地保障了俄国的利益，同时又不会破坏无论是和英方、法方或是和中国方面的友善关系。

在谈判各方所争论的各点中，仪式的问题最为突出。额尔金要求在景山这样神圣的地方（该处当时寄放着已故的帝、后的棺槨）举行签约仪式，并要求在两国使团出入北京时，由联军军营鸣放礼炮。

中国人对这两项要求一个也未予同意。中国人为说服英方放弃这些条件曾作了一番徒劳的努力，最后还是去求助于俄国公使。公使便向额尔金解释道，如果在景山举行签约仪式，中国人将认为是对人民的重大侮辱，同时也是严重违犯宫廷惯例的行为。最后特使终于同意中国方面先前的主张，在礼部签订条约。关于进出北京城鸣放礼炮的要求，当向额尔金一经解释，说炮声会引起京城居民的惊慌不安，他也就立即放弃了。

额尔金勋爵还在天津时提出的条约草案，此时作了某些修改。对第五条作了如下增补：中国政府不得阻挠本国臣民前往英国属地和中国本土以外的其它地方作工，并不得限制其与英国臣民订

立契约；对第六条补充道：“大清帝国将九龙司地方一区划入香港境内归英国女王。”这样，新约便将英方对香港的领土权落实下来了；而中国方面则保有迁徙权。

英-中条约的签订仪式定于10月12日在礼部隆重举行。此日前夕，中国的大臣们再次前来南馆向公使表示，由于恭亲王对联军仍旧极不信任，所以不敢返回京城。尤其是，将有许多士兵随同英国特使前来北京，这更使他感到害怕。在最后时刻，额尔金勋爵改变了他原先将使团的卫队限制在五百人以内的主意，而决定率领整三千的士兵，以便让他们在街道上夹道列队。

恭亲王偕同他的大臣们于约定时刻准时来到礼部，但是英国特使却姗姗来迟。整整过了四个小时，还不见使团的影子。中国人于是耐不住了。最后，恭亲王终于派主管礼部的庆英来到俄罗斯馆，询问俄国公使：既然英国特使如此明显地表示不愿前来签约，是否让大臣们回去为宜。

这里的人们尽量劝庆英放心，同时立即派佩舒罗夫前往英方军营，打听延迟的原因，倘有可能，则催促额尔金勋爵赶紧前来。佩舒罗夫在北京城内街道上就遇上了使团的队伍。又过了一小时，英国使团终于进入礼部。

使团行进的队伍极为庄严：额尔金勋爵坐着富丽堂皇的肩舆，乐队不知何故走在轿前，跟在特使后面的是五百人组成的扈从和卫队。签约本身进行得很快，并未发生任何困难。额尔金勋爵非常傲慢、自矜，而恭亲王在刚见到特使时虽然表现得很窘和恐惧，但仍完全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次日，下午二时，完全按照相同的程序举行了法-中条约的签字仪式。礼仪完毕，法军大本营司令官施米次上校率领几名军官来见俄国公使。在转达了葛罗男爵的诚挚问候以后，施米次自己又补充说，法国远征军全军都十分清楚，他们所以能迅速而顺利地

结束这次他们视为战绩辉煌的远征，应如何归功于他这位俄国公使。下一天，葛罗给公使送来一份条约批准书的副本。

联军和中国之间的事务的了结，只不过是完成了伊格那提耶夫的准备工作的。现在是着手执行其主要任务，即批准中-俄条约的时候了。首先应该办到的是使联军的军队和两位特使本人离开京城；他们留在北京会妨碍谈判的顺利进行。当时尚无一个稳定的和当权的政府，联军部队又近在咫尺，英国特使住在京城内，便可利用这些条件，很容易成为决定中华帝国命运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而且，如果使团在京长期拖延下去，那末在此情况下，我方使团的微不足道的地位当然就瞒不过特使，而这对我国利益会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应。

为了加速从北京撤军，伊格那提耶夫利用他对英军总司令霍普·克灵顿逐渐形成的影响。并竭力用即将到来的严寒和凛冽的西北风季节(当时正好刮了起来)来恐吓他。

霍普·克灵顿非常重视俄国公使的劝告。他认为北京的严寒气候对士兵，特别是对习惯于印度炎热气候的锡克族士兵的健康会引起不良的影响，根据这一理由，他坚持要求额尔金尽速着手撤军。额尔金终于不得不让步，并定于10月18日，联军军队撤离北京。

VII

中国政府和联军刚签订完和约，感到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伊格那提耶夫便立即提出就俄国事务重开谈判的问题。公使就事情顺利了结向恭亲王表示祝贺，并提醒说，他本人也是参与其事的，然后便表示，现在清政府既已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希望该大臣根据原先的诺言，允予任命全权大臣，以便会商有关俄国的事务。

恭亲王立即答复道，公使的愿望他早已得悉，因此已让奉命办理此事的刑部尚书瑞以及顾问麟、宝和成^①等尽速前往俄罗斯馆赴会。

为了对这次即将举行的谈判尽可能保守秘密，伊格那提耶夫关照说，希望不要任命恒祺为协商委员会的成员，因为他有根据怀疑，认为此人不可靠。他向其余的全权大臣则明白声称，如果外国代表们获悉他们和俄国方面进行谈判的内容，那将会给他们本人带来多大的危害。公使说道：“联军对我方与贵国之间的事情毫无所知，所以他们完全相信，全部滨海边区久已归属于俄国，而现在如果他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那末由于对我方嫉妒和不甘落后，他们会不顾业已签订的条约，而向你方提出新的要求。”

10月15日，中国的全权大臣们首次来到我馆。大臣们以恭亲王的名义对在他和联军交涉时得到公使帮助一事向公使表示深切感谢，大臣们并表示准备立即着手研究俄国公使所希望提出的所有一切问题。作为对这一表示的反应，伊格那提耶夫交给他们下列三项文件以备查考：1. 阐明俄国要求的实质的简明纪要一份；2. 由总参谋部布多戈斯基上校在现场测绘的、附有精确图例的东部疆界地图一份；3. 条约草案一份，该草案载有新提出的十五项条款以代替1859年向肃顺提出的六条。

为了明确起见，这些文件都译成了汉文和满文，而地图上的地名则均按满语标定。

伊格那提耶夫的主要要求仍和先前一样，包括精确划定中俄两国在东段和西段的陆上疆界；在两国通商贸易方面取得一些新的权利；旧约的条款与现在情势不相适应，以新约来代替旧约。

与中国的全权大臣们的首次会商是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的。

^① 即尚书瑞常、侍郎麟魁、成琦、宝璠。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7卷，第23页，《给俄罗斯照会》。——译者

中国人热心捍卫自己的利益，无论如何不同意根据布多戈斯基的地图划定东段疆界，虽然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的许多不同意见，其出发点都不过是为了保持他们所固有的那种高傲自负的尊严。会谈是逐日进行的。全权大臣们于9—10时到馆，直至午后5—7时离去。为了避免大臣们与常来南馆的欧洲人偶然相遇，俄方从不邀请全权大臣们去公使的住所，而是在教会主持人的房间内和他们进行谈判。同样为了防范起见，俄方还建议他们，凡在会谈时间，将他们所乘的肩舆打发回去，而不让停放在使团的院落内。大部分谈判均由塔塔里诺夫和固礼大司祭出面。他们依次向公使报告谈判进展的情况，转达中国方面的答复和不同意见，然后在获得公使的相应指示和命令后，再继续进行暂告中断的会谈。

伊格那提耶夫在领导和中国当局进行谈判的同时，一直密切注视着联军的动向。在中国京城设立常驻公使馆的问题转变得有利于俄国利益以后，该问题的性质竟意想不到地变得与原来截然相反了。显然，从额尔金的书信的语气中，普鲁斯窥测出了俄国公使对其兄的影响过分巨大，因而耽心时局会发生不利于英方利益的转变，于是决定前往天津亲自证实此一情况，他于10月14日（公历）完全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天津。

普鲁斯在此获悉联军部队不顾他最坚决的要求，业已撤离北京，他大为震惊。他在天津总共只呆了几个小时，便带领由二百名骑兵组成的护卫队，和一支规模不大的辎重车队继续向前进发。10月17日，他已到达北京。

同日，额尔金引其弟往见俄国公使。与普鲁斯的这次会见既不是事先约好的，也不是令人愉快的。伊格那提耶夫马上意识到，由于他长期努力而取得的英国特使对俄国利益的全部有利影响，可能毁于一旦。

在含糊其辞地解释了促使普鲁斯突然来到京城的原因以后，

额尔金立即说到，其弟根本不愿听返回天津这类话，而且他无论如何现在就要在北京住定。额尔金一面请伊格那提耶夫劝说普鲁斯，使他相信这类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同时却承认，其弟所提出的理由对他来说竟是如此举足轻重和言之成理，因此就连他本人对延至明春再提此事这一不可移易的决定也产生了动摇。

这一请求使伊格那提耶夫陷入了十分困难和棘手的境地。他立刻申明，他认为自己无权向英国公使提出什么建议一类的意见，但是他表示愿意就英国和全欧洲都如此关心的问题，十分坦率地发表他自己的意见。

伊格那提耶夫说：“关于外国列强在北京派驻常设代表对该国的意义，我十分同意您的看法。我深信，只有这些代表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和得到同意住进京城，才谈得上与该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如果普鲁斯现在就留在北京不走，那末，这个条件很明显地被破坏了；以后中国方面一有机会就会说，英国公使是靠强占城门和仗仗联军部队进入京城的。

万一清帝听信大臣们的意见，决定永不回到这受尽蛮夷蹂躏的京城，而在与俄国领地相毗邻的蒙古或满洲境内某地另择一处驻蹕之所，那末时势就会愈加恶化。

我们的共同任务首先是使百姓安宁，繁荣贸易，而当务之急就是促使清帝、军机处以及各部尚书尽速回京。

而现在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足以妨碍实现普鲁斯的愿望：一位外国特使不以应有的尊荣，不按照严格规定的礼仪、不事先约定时间而径行进京，这对中国人是不能设想的，他们很难相信，率领二百名黑夷（中国人对锡克族士兵的称呼）如此突然进京的普鲁斯，他真是英国女王的全权代表，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将领。

经历了1858年变事的普鲁斯应当特别谨慎地对待中国人，因为他当时在天津和大沽所扮演的那个角色，不可能在中国人的记

忆中消失。伊格那提耶夫在谈话结束时说：“至于我本人，虽然由于俄国传教士团驻京由来已久，使我与英、法代表有着完全不同的处境，但我仍然不愿在北京过冬。由于深信我暂时离去对我们国家的利益更有好处，所以我决定动身回俄国，并且无论如何数日后就要离京，而不管英、法两国特使将作出何种决定。”

最后的结局是一切照旧。普鲁斯按照建议在天津过冬，等到来年春天，为英国使团提供的宽敞适宜的住所准备就绪后，他才由该地前来北京。

为了彻底消除额尔金受其弟拨弄而产生的疑虑，伊格那提耶夫在上述谈话后的第二天便前往葛罗男爵处，他毫不掩饰地向葛罗说明，如果现已在北京的普鲁斯在此过冬，那末留在天津的布尔布隆将陷于何等尴尬的境地。葛罗同意伊格那提耶夫的意见，于是他也跟着说，派驻常设公使的问题必须延至明春解决。

联军部队撤离的时间一再拖延。由于额尔金对中国人仍旧不信任，他们向他们宣称，只要与清帝签订的条约尚未予以公布，联军的军队将继续留驻北京。此后，中国政府为了尽速摆脱这些令人讨厌的客人，于是便急忙将条约的条文用大张纸赶印出来，张贴在房屋的墙上和城市的通衢要道。10月24日，军队开拔了。第二天，中国政府为了庆祝它摆脱了欧洲蛮夷并向人民表明，它是靠自己赶走了敌人的，于是特意下令在城郊的军营内发放火炮。

与此同时，公使和全权大臣之间的谈判，却以中国所惯有的那种缓慢步伐进行着。伊格那提耶夫对此种状况深为不满，后来终于向大臣们提出了以下声明：“由于我要将沙皇陛下所关心的中国与英-法之间战争业已结束的消息告知我国皇帝，因此，我必须同时将我为敌对双方进行调解的情况告知我国政府，而且还要报告有关我国和中国之间的切身事务的谈判进程；但是，时至今日，贵大臣们尚未作出任何决定，这将使我如何汇报呢？我国皇帝如果

获悉，诸位曾请求他的公使给予帮助和庇护，但是却不知感戴，也不执行他的合理要求，那他将感到非常难过。你们的犹豫不定使我陷于极其难堪的境地。日益临近的寒冬最能妨碍我取道陆路经蒙古返回俄国，因此我将不得不在北京过冬；而此事一旦为业已决定返回天津的联军获悉，他们出于妒忌，就会效法于我，立即折返北京，那时清帝要返回京城就不能不使自己的尊严蒙受损害了。”

在谈话结束时，伊格那提耶夫提醒大臣们说，正是他而不是别人说服了联军将军队撤回天津，而现在，要将他们召回北京，对他说来也是最容易不过的：只需致函两国特使，说他们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靠不住，需要修改，此事即可办到。

用这些理由劝说大臣们是最好不过的办法了，因而使问题的解决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为了加速结束谈判，伊格那提耶夫本人也作出了一些让步，并放弃了：1. 先前提出的在齐齐哈尔设立领事馆的要求；2. 同意在同一时间内在北京居住的俄国臣民的人数限制在二百人以内；3. 同意现住在乌苏里江沿岸的中国臣民留住原地，与先前一样承认其为中国的臣民。

我们所作出的这些实质上毫无损失的让步，对谈判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全权大臣们刚一获悉这些让步时，他们便立刻表示愿意确认所有其它条款，并呈报恭亲王说，条约已最后拟就，并可以由双方签字了。

次日，将条约草稿奏请清帝审阅和批准。

10月28日，英、法两国特使终于离开北京。在他们启程前数日，伊格那提耶夫首先为额尔金勋爵，继后又为葛罗男爵举行了告别宴会。伊格那提耶夫初次在北京逗留时，就是准备在南馆接待外国人的，此次为了体面地招待贵客，该馆布置得非常富丽堂皇。额尔金也为伊格那提耶夫举行了答谢宴会，只是葛罗却推说不具备适当的环境而未这样作，并以打趣的口吻说他邀请伊格那提耶

夫来巴黎郊区圣日尔曼市作客。额尔金在去恭亲王处辞行时，同时还向他介绍了普鲁斯，后者曾表示，如果连清帝的兄弟也不得见，那就不离开北京。两位特使离京前夕都在伊格那提耶夫处，象最亲密、最知心的朋友那样依依惜别。

在两位特使离京的次日，恭亲王前往拜会伊格那提耶夫。二十六岁的年轻的亲王举止十分端庄，因而博得大家一致的良好印象。他进入客厅，迎着公使的面，就公使帮助中国与联军议和一事转达了清帝的谢忱，并表示歉意说，因纷繁事务的羁绊，致使他未能早日来拜访公使。他说完这些话以后，便在一张为他准备的椅子上就座，并开始谈一些题外的事，只是稍微提到了一些政治方面的事件。由于不习惯欧洲式的环境，恭亲王明显地感到发窘，并以十分好奇的目光环顾他周围的东西和俄国人的服装。

次日，伊格那提耶夫对他进行了回拜。两天后，全体参与谈判的全权大臣们都来到俄罗斯馆。不同寻常的是他们这次到馆仪式特别隆重。为首的大臣瑞常将一只黄缎包裹的小匣高举过头，走下轿来。他这样一直进到使团的内室，郑重其事地把小匣递给伊格那提耶夫。封藏在小匣内的是新签订的条约和清帝的上谕，上谕内容如下：一品大臣恭亲王奕訢等已将俄国政府拟定之条约十五款开单呈览。瑞常等受恭亲王之命会同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将军，逐层商酌定义，尚属妥协，即著照所议办理……钦此。^①

咸丰十年阴历九月（1860年10月27日），一俟上谕宣读后，便立即着手进行条约文本的最后修订工作并将其译成汉文。当俄、中两种文本均已定稿后，便开始编写会议记录，双方商妥，应于11月2日下午二时在俄罗斯馆内进行这项工作。

尚待办理的就只有批准条约事宜了，但得先解决一项问题：是遵照欧洲批准条约时所依据的那些普遍原则办事，抑或援英、法当

^① 参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8卷，第18页。——译者

局简便行事的成例，从而免去那种不必要的形式。既然第二种方式连中国人的战胜者英、法两方都已欣然采纳，说明这是完全合法的，当然更受到欢迎了。这种批准方式不致遇到象《天津条约》和《璦琿条约》所反映的那种偶然情况，所以伊格那提耶夫当然选择了这一方式，不过要求援英国和法国的成例，与俄国订立的条约一俟清帝签署，即予印制并马上分发至各政府部门；中国方面也予以照办了。条约是用象军机处出版的称作《京报》那样大小的开本印制的，并分发至各该部门。

在签订条约的那天，英国翻译爱金斯给使团造成不少麻烦。额尔金将他留在北京，看来似乎是为了就近监督英国使团房屋的建造工作，但实际上是为了监视俄国公使的活动。为了麻痹这个英国人的警惕性，伊格那提耶夫提出，要他以后长期在俄罗斯馆用膳，而他每天也都过得兴致盎然。11月2日，这是举行签约仪式的日子，必须让他整天离开南馆；修士司祭伊萨叶和教会学习生佩舒罗夫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邀请爱金斯去参观喇嘛庙雍和宫，然后便将他从该处带到北馆就餐。在北馆他们将他灌足了酒，因此当他回到南馆时，诸事均已办毕，而中国人也都离馆了。

恭亲王不是按约定的时间于下午二时到达，而是照中国的礼节晚到了一个半小时。见面寒暄以后，便立即着手核对条约文本和阅读会议记录。当放在特制托座上的俄国公使的全权证书和放置清帝上谕的匣子端出来时，全权大臣们均离座起立。恭亲王让伊格那提耶夫先在条约上签字盖章，然后他自己也照此行事。

根据前一天的约定，疆界地图不予签字，而用一支在伊尔库茨克即已特制好的、清晰地雕绘着俄国各省省徽的银管封套着交给恭亲王，由他负责转呈清帝。全部礼仪就此告成。接着，端出了香槟酒，伊格那提耶夫为诸事顺利结束向恭亲王表示祝贺，而恭亲王也十分机灵地作了回敬。在和公使告别时，他答应在使团离京前

夕，再次前来拜访。

伊格那提耶夫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的使命业已完成，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所订条约的实质是，中国政府批准和补充了《璦琿条约》，还以最肯定的方式承认阿穆尔边区和乌苏里边区，也即以乌苏里江、兴凯湖、绥芬、图们两河直到海边为界的广大土地全部为俄国所有，而我们如果仅仅根据中国大学士桂良于 1858 年告知普提雅廷伯爵的清帝的上谕，那末我们对这片土地实际上是根本无权过问的。

根据第二条，我们得以将边界线任意向中国的西部推进，并可以占据通向小布哈拉诸城的关隘。根据第五条，确认我国商人进行商队贸易和自由前往北京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根据《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都早已有所规定，但由于时间的推移，它的内容已为人们所遗忘了。

第六条解决了在喀什噶尔设置领事馆的问题，由于这一地点接近印度，所以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第九、十、十一和第十二条补充了《天津条约》中表达不完全的地方，并消除了前此在边境上发生的误会。

根据这些条款，中国政府承认我国军事省长享有与该国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同等的权力；据此，我方的边防长官可以和中国边务当局进行来往，将来能对他们扩大我们的影响。

第十二条规定我国商人在其认为对自己有利时，有权在蒙古境内以私资自设邮路，它不受政府设置的邮路管理。由于第十四条规定，东西伯利亚总督有权和中国边务当局商订有关陆路贸易和商队贸易的新补充法规，因此便取得了一项非同小可的特权。

根据第十条，废除了先前的一项规定，即凡接受劫盗或失窃赃物者，得处以相当于该物原价十倍之罚金；由于这项规定消除了过去在边境上经常造成的许多麻烦和弊端。

在办完和中国方面的事务后，伊格那提耶夫并未忽视迄今为各国驻华公使遵行不误的一项东方的习俗，即向全权大臣赠送礼品。此次，由于英国特使和法国特使均未奉行这一常例，所以他这样做就更有其特殊的价值。在条约签订后的次日，使团将其所有的全部礼品分送恭亲王，四位全权大臣，即瑞常、麟魁、宝鋆、成琦和参与签订条约的其他一些中国大臣。全部礼品几乎均系俄国制造，其中有呢绒、德拉德达姆呢、玻璃料器、瓷器、钟表、绘画等等。赠给恭亲王的是一件貂皮筒，一支转轮手枪，两支步枪，若干瓶香槟酒以及其它物品。再次日，所有受礼的人也立即还礼，他们向伊格那提耶夫赠送了各种绸缎、瓷器、扇子等物品。

11月5日，巴柳泽克将在北京缔结的补充条约送往彼得堡；公使本人打算于10日启程。在他动身前夕，恭亲王再次前来我馆，感谢伊格那提耶夫的赠礼，其中他最欣赏的是枪支，即转轮手枪；他于是对俄国士兵的装备大加称赞，并对1858年他的政府拒绝普提雅廷提供武器和教官一事深表遗憾。

恭亲王说：“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本国接受俄国政府的建议，而现在，当中国备尝和欧洲军队作战的痛苦教训后，本政府就会另眼看待这类建议，并将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接受这些武器。恭亲王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于是伊格那提耶夫急忙表示遗憾说，武器和教官均已撤回俄国了，不过同时又补充道，如果清政府就该问题向俄国提出正式请求，那末他允予代为向俄皇陛下转达此意，料想陛下对中华帝国的特殊厚待，当不致置该请求于不顾。

在预定的那天上午10时左右，使团离开了北京。好奇的百姓群集在街头，友善地目送公使的轿舆。

VIII

这次旅行看来并不轻松。严寒凛冽袭人，经过了三天的旅程，来到张家口；该地已遵照恭亲王事先的吩咐，已准备好隆重欢迎俄国公使。该城负责长官的助理在距城十四俄里处迎见公使。在使团经过的街道上满是人群，在为使团下榻的住所门口，扎了一座彩牌楼。地方官都为使客人们在城里住得无比满意而操心，并设法为他们以后通过蒙古草原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仍和第一次一样，需乘坐由蒙古人骑马拉曳的、很不舒服的中国式两轮车，来结束这段令人厌倦的旅程。公使一行共有十四辆车，车行十分迅速，每天走过四至六个驿站，各驿站之间的距离约为二十至三十俄里。

公使决定在库伦停留一昼夜，以便乘此时间来行使刚刚缔结的条约中的一项条款，即准许我方在该城设立领事馆的那项条款。

使团在所谓的俄罗斯馆内下榻，该馆通常是供途经库伦的俄国人使用的。

当时该城的办事大臣是色克通额（蒙族人），此人在三十年代曾在恰克图担任过扎尔固齐^①的职务。他立即借同一名助手来见伊格那提耶夫，欢迎他的来到，并向他表示敬意。此事是值得重视的。在此以前，库伦的办事大臣们不仅从未先来拜访过途径库伦的俄国人，而且即使是对前来谒见他们的教会负责人、甚至是公使也从不进行回访。而现在，看来有时已经不同了。

公使提议要揀一处适当的地方为将来建立俄国领事馆，库伦的官员们同意这一要求，并立即着当时在他手下的一名蒙古官吏与塔塔里诺夫一同前往勘察适当的地点。塔塔里诺夫选中了位于俄罗斯馆附近的一块不大的高地，该地在库伦与买卖城的中间，距

^① 扎尔固齐，蒙语，官职名，系管理行政事务的官员。——译者

图拉河右岸不远。

11月25日清晨，使团登程继续前行，并于27日上午10时左右顺利到达恰克图。

伊格那提耶夫对中国朝廷的一次出使就此宣告结束。

人名对照表

Альберт 阿尔培特	Исаем 伊萨叶姆
Амгерст(Lord Amherst) 阿姆赫斯特	Казакевич 卡扎凯维奇
Андерсон(Lieutenant Anderson) 安德森	Казнаков 卡兹纳科夫
Баллюзек 巴柳泽克	Карпов 卡尔波夫
Бастер(Comte de Bastard) 巴士达	Киселев 基谢列夫
Батуманкуев 巴图曼库耶夫	Ковалевский 科瓦列夫斯基
Брабазон(Brabazen) 布拉巴宗	Корсаков 科尔萨科夫
Бруннов 勃伦诺夫	Крилок 克里洛克
Брюс(F. W. A. Bruce) 普鲁斯	Лея(Н. N. Lay) 李泰国
Будоговский 布多戈斯基	Лихачев 利哈契夫
Бульби(Bowlby) 博而拜	Линин 利申
Бурбулон (de Bourbonloulon) 布尔布隆	Лок(Н.В. Loch) 洛奇
Вамбуев 瓦姆布耶夫	Любимов 柳比莫夫
Вольф 沃尔夫	Макартней(Lord Macartney) 马夏尔尼
Гард 各理德	Мартынов 马尔蒂诺夫
Головкин 戈洛夫金	Меритенс(Baron de Mértens) 美理登
Гоп(J. Норе) 何伯	Мичел(John Mitchell) 密契尔
Грант, Хоп(J. Н. Grant) 克灵顿, 霍普	Монтобан(de Moniau ban) 蒙托班
Гро(J. V. Gros) 葛罗	Моррисон(J. R. Morrison) 马礼逊
Гурий 固礼	Муравьев 穆拉维约夫
Дадешкильяни 迪西克里安尼	Мусин-Пушкин 穆辛-普什金
Деламарр(Abbe Delamarre) 德拉马	Назимов 纳齐莫夫
Дюлюк(Abbe Deluc) 德刘克	Николаевч, Константин 尼古拉耶维奇, 康斯坦丁
Зейм 泽伊姆	Нэпир, Роберт(Robert Napier) 奈皮尔, 罗伯特
Зейферт 泽伊费尔特	Пальмерстон(Н. J. Т. Palmerston) 巴麦尊
Игнатьев 伊格那提耶夫	Паркс(Н. S. Parkes) 巴夏礼

Перовский 彼罗夫斯基
Пещуров 佩休罗夫
Попов 波波夫
Рагузинский, С. В. 拉古津斯基, 萨·弗·
Рид (W. V. Reed) 列卫康
Татаринов 塔塔里诺夫
Уалкер (Q. M. G. Walker) 瓦尔克
Уард (J. E. Ward) 华若翰
Уэд (T. F. Wade) 威妥玛
Хитрово 希特罗沃

Шарнер (Charner) 谢尼尔
Шимкозич 什姆科维奇
Шияшмарев 希什马廖夫
Шмитц 施米次
Эдкинс 爱金斯
Эльгин (Earl of Elgin) 额尔金
Abbata de-la Marrin 马兰
Esaugas de Lauture 劳特, 埃斯凯
腊克·敦
John Hay 海, 约翰